

D9.839/

X52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



## 卷首

譯者很抱歉，他沒有給本書想出一個更好的書名。現在固從陳衡哲先生的譯法，譯爲『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我也知道這是一個很笨拙的譯名，但是一時實在想不出一個更好的了。希望能看原文的讀者，還是記住『Humanity Uprooted』這兩個意義較爲生動的字吧。

再者：原書第三部『追求』(Quest)，因時間性較大，故略去未譯。

譯者一九三三，九月。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

# 目錄

卷首

杜威先生序

作者序

## 第一部：制度

- 一、宗教的沒落
- 二、宗教沒落的原因
- 三、新信仰代替了舊宗教
- 四、私產
- 五、男子的生活
- 六、性生活及新性道德

目錄

一——一六

一九——二六

三九——五九

四〇——五九

五九——七

七三——八六

七、家庭

八七—一〇二

八、愛

一〇三—一三〇

九、新家庭的試驗

一三一—一三五

## 第二部：階級心理的分析

十、農民

一三六—一四七

十一、無產者

一四八—一五九

十二、共產主義者

一六〇—一七七

十三、一般青年

一七八—一九一

十四、智識階級

一九二—二〇七

十五、哥薩克

二〇八—二三六

十六、猶太人

二三七—二四四

十七、婦女

二四五—二六七

## 杜威先生序

下面從『一般青年』一章中引下來的一段話，我覺得它本身就可以作為本書的一篇序言：至少可以向留意的讀者表現了興達斯先生那種對於蘇俄的特殊的看法，一種有生氣的精神。『當我有時告訴蘇俄青年我是一個作家時，他們便立刻要問我的政治信仰是什麼？他們真正的意思是問我是否反對階級鬥爭。他們不能了解一個對於政治極有興味的作家，會對政治毫無成見的。』這一段話的目的是要寫出蘇俄青年一般的態度。但事實上它是更清楚的寫出了興達斯先生對於蘇俄現狀的觀點。

傾向一邊，對於一個事物加以毀譽，因而構成了一個人對於一個社會現象的意見，這是人類同呼吸一樣普通的事。一個在溪邊閒遊的人，看見溪底兩塊小石子相近的向下沖流，他很難想不到那是一個競爭，并能置身於事外的。當這種競爭變成真實的，和人與人間的，並且牽動了旁觀者的教育，武斷，和理想的勢力和利益的時候，公正的觀察和敘述，乃幾乎成爲超乎人力的事了。

一個對於蘇俄很有興趣的作家，但對於蘇俄正在進行的現狀祇想不關心的看一看，或者可能的了解一點，這不祇是蘇俄青年引爲不可解的。全世界的人都以爲如果一個人對於蘇俄發生興味，他必須是擁護那個新時代，或反對它的人。他們不信一個隨便看看的旁觀者，對於這樣一個有關人類的情感，信仰，及命運的大戲劇的進展，會有什麼意義。爲了要看才看，爲了要別人知道你所看見的才寫——這是超出一般關心蘇俄的人的理想的事。對於他們，那不是可以隨便看看的一幕；那是一個每個人都應當加入的戰鬥。不偏不黨的本身，就值得叫人懷疑。我以爲興達斯這本書最值得注意的，是他那種對於革命中一切人類思想行爲的親切的同情——然而仍不失爲一種公正的觀察和敘述。沒有一處他肯擅自加一點毀譽；沒有一處他是代表了神的憤怒，也沒有一處是代表了神的祝福。

結果，如果讀者還沒有在他心中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成見，他一定可以從這本書中找出一個達到了解布雪維克俄羅斯的更公正的方法，這是在別本書中從未見過的。那些已經有了先入爲主的成見的人，也可以在這書中找出許多獨立的材料，來堅固他的成見。沒有一本書能像這本一樣。

供給你許多反對蘇俄的材料，如果你抱着這種目的去找。但那裏對於革命的種種事實，又有許多公正同情的記載，可以使最熱烈的革命家，燃燒起想象的火燄。然而如果有人因為我上面所說的話，而以爲這是一本『可左可右』的書，那又是澈底的誤解了。它對於好惡并沒有一點偏向。那裏祇是一幅圖畫——人類用了一切狂暴和熱情在奮鬥，要把一切舊的制度，根本推翻，在那新的土地上，另建設一個新的社會。在這舊的覆滅和新的暗示之中，觀點都被攪亂，是非很難一概而論，這是我們所能想象的事。但是也正因爲這一點，許多有特殊政治及經濟的傾向的作家，都失敗了。

我曾問我自己：爲什麼興達斯先生能夠跳出偏見的網子，寫出這樣客觀，這樣公正，這樣生動的文字來。我自己的答案是因爲他用了一個藝術家的眼光來觀察蘇俄的革命。這樣一個人類從未經歷過的偉大深刻的革命，它本身值得人們來觀察，敘述，這是不言自明的事。但是我覺得祇有一個天賦的藝術家的頭腦和眼睛，才能領略這樣一個情感與武斷交織着的革命現象。就這一點便是興達斯先生的成功。世上不乏對於蘇俄革命的政治經濟各方面做着客觀和科學的研究的人：一個科學家也能做到敘述的公正。但是沒有藝術家的眼光，那些便成爲死的數字和統計。我們在興達斯書中



所能找到的是用了一個經歷過革命的痛苦和快樂的人的情調所寫出來的革命。

每個讀者對於這樣一個信仰和人道的轉變，將在他心中構成一個他自己的印象——好像他和興達斯先生一同在蘇俄旅行，和親見一切事物一樣。它給讀者的祇是一個印象——大概的說，就是那種在制度，習慣，及風俗的傾覆中的蘇俄人民特有的氣質。我想一個共產主義者也許不得不反對我這種解釋。對於他，共產運動是有普遍性的——像數學及其他必須的科學一樣的普遍。然而，這種觀念也許又有俄國人民的特質。但無論如何，我總不相信一個人能夠了解蘇俄那種複雜錯綜的情形，除非把它放在俄羅斯的土地上，並與俄羅斯的歷史對照。

興達斯先生已經很虛心的充分吸收了俄羅斯的歷史，俄羅斯的文學，和他描劃最爲深刻的各種階級的心理。每一個事物都沒有離開它在人類社會中的背景。所以它是那樣正確，那樣真實，而帶着一種生動的實感。如能同情的讀這一本書，不啻是踏上了自由教育之路了。

John Dewey

## 作者自序

我生在一個俄國的農村裏，那個農村是那樣的『聾』，像俄國人常說的一樣（意思是說離文化中心那樣遠），直到我十四歲離開那裏到美國去時，還沒有看見過一輛火車或一盞電燈。在美國住了一個很長的時期，一九二三年我又回到俄國，在城市及鄉村中游歷了一年。此後我差不多每年都到俄國去，閒時便在西伯利亞，高加索，伏加河流域，烏克蘭，克里米，及極北的地方漫遊。無論什麼地方，都在演著那同樣的故事——人類是在一種思想及感情的激動之中。生活在蘇俄是一個這樣猛烈的經驗，這樣痛苦的嘗試，同時對於一個充滿了新信仰的人，又是一個這樣光榮的理想，一個旁觀的人很難不為所動的。他對於那騷擾，那熱烈，那憤怒，那希望，那失望，那瘋狂，甚或至於那死亡，多少總會有些反應。

不管它的結果是好是壞，蘇俄已經把這舊的世界，從根拔起；並且很願意看它逐漸萎敗，以至變為塵土。幾乎沒有一種制度——私產，宗教，道德，家庭，性愛——能夠避這革命的狂飈。

博學的胡適博士在上海告訴我蘇俄革命使他最感驚異的，就是他們那種想創造一個完全新基礎的文化的雄心。當然這也不見得什麼新鮮。日本就曾經很聰明的，很成功的這樣做過。但是日本有一個模型供她去模仿。西方的國家供給了她全套的圖說。蘇俄便不是如此。她所要創造的文化，世上還沒有見過。她沒有現成的模型，作為她的準繩。她要創造一個社會，在那裏沒有宗教，而有性愛的自由；家庭與愛不受絲毫外力的壓制；勞心和勞力的工人完全平等；個人的得救並不依賴他自己，而依賴那羣的力量。一代的男子都在這種思想中孕育着——宗教是一個醜惡的幻覺，財產是世界上最的罪惡，拜金的人，尤其是商人，是世界上最齷齪的人。

女子也都在這樣的理想中熏陶着——女子一定要經濟獨立，一定要和男子立在平等的基礎上，參加世上一切的事業——實業、教育、政治及一切國家的事業。不管我們對於婦女運動的想法如何，事實上這種重大的結果是總會發生的——婦女也被叫出來對於那建設新文化的偉業，供獻她們一份智慧和能力。

像我們這樣有着一個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背景，同時又有一點俄國語文的智識的人，有機

會來看一看這幾年中蘇俄社會的騷動和痛苦，會有一種異常的經驗：雖然是充滿了煩惱，倒也不缺乏那種可歌可泣的情緒。我深信世上沒有一個國家有比蘇俄更深的痛苦，但她的快樂，也是人類從未嘗過的。

在本書中我想對於這個推翻一切舊制度，改造一切人類生活準則的革命的結果，給讀者一個準確的印象。

本書有幾章曾經節略地在 *Asia, Century, Round Table* 等雜誌上發表過。編者允許我在本書再利用那些已刊過的材料，我願向他們致謝。

Maurice Hindus 紐約，五月一日，一九二九。

第二版小註：因為蘇俄近年來集產農業的發達，我對「農民」一章的最後一部份，應當加以修改。全書除文字及句法方面，尚有可斟酌之處外，其他還沒有什麼改變。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

第一部：  
制

度

## 一 宗教的沒落

在很久以前，有一次午夜裏我在莫斯科的街上走着，我沿着那灣曲的古治納茲基街（Kuzn-  
etskaya）走去，無目的轉入了一條支路，使我很驚異的，我忽然發現我已身在莊嚴的外交部的大廈  
前的空地上了。在這片空場的中心，有一個小小的公園，白天有許多小孩和他們的奶娘在那裏很快  
樂的玩着。但是現在這個公園裏，這片空場上，和附近的街上，都是人空寂寂的。我靠在公園的短牆上，  
心裏想着眼前的境界，覺得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像莫斯科一樣和人間一切苦惱隔絕的城市。布  
雪維克主義的革命，和這些字所包含的一切，在這一刻間都像故事一樣的渺茫了。但是一個從外國  
到俄國來的人，往往爲了她外部生活的安靜，而忘了她內部的紛擾；一件很小的事，立刻把我喚回到  
現實，使我感到這個俄國人正在演着的戲劇的嚴重性。『大爺，』我聽見一個小孩的聲音，『給我們  
十個戈彼買塊麵包吧！』

他是一個街上的流落者。我並沒有聽見他走近來。他好像是從地下忽然跳出來的，當他剛說完。

跟着又有幾個小孩跑過來立在他的旁邊，都赤着腳，衣服很襤褸，臉上都是煤灰，像從煙鹵裏爬出來的一樣。他們說，他們剛從火車上運到這個城市裏來，都餓極了。我叫他們跟着我，我們一同走着，想找一個莫斯科夜間常見的，叫賣香腸、麵包和煮蛋的女人。在一個破舊的門洞裏，我們找着一個這樣的女人，她正倚在籃子上睡着了。我把她所有的麵包和煮蛋都買了；這些小孩狼吞虎咽的吃着。他們漸漸的精神恢復了，話也越來越多了。他們以前從沒有到過莫斯科和別的城市。他們都是伏加河上各農村的孤兒，經過幾星期的步行，小船和火車的生活，最後到了莫斯科，希望有蘇維埃的機關可以收容他們。他們似乎對於他們的窮苦和孤獨并不憂慮。他們都是很忠厚的村兒。最後我又問起他們經常問少年人的一個問題，尤其是鄉村的少年。

『孩子們，』我說；『你們裏面有幾個是信仰上帝的？』『一個也沒有。』他們一致的回答。『你們誰也沒有到過教堂嗎？』『沒有。』他們偷偷的笑，好像對於這樣一個問題很覺得奇怪似的。『你們都是無神主義者嗎？』『大爺，你不是嗎？』『一個小孩反問我。』『爲什麼？』『我一定是呢？』『因爲』——在這個回答的聲中，含有最後的意味；這個說話的人雖然還是一個小孩，但是他覺得這已經是一



個無須爭辯的問題了。

『每個人都是無神主義者，』最高的一個說，分明是他們問的領袖；『除非是那些老太婆！』

『我猜你一定也是一個無神主義者，』一個紅髮的這樣打趣我說；『不過你不肯說出來罷了。』

他說着笑了，其他的小孩也跟着他笑。

『爲什麼你要這樣說呢？』我問他。

『因爲根本就沒有上帝，那就是原因，』領袖的那個小孩這樣回答，於是他們都笑了笑，笑得很滑稽的。

我在我國曾經到過很多處的育兒院。我也到過許多學校，並且往往得到當局的允許，讓我隨便向學生問話。我也曾和俄國的少年和青年黨員到野外去宴遊，也曾和黨部裏的許多青年，私人的或團體的談過話。這些青年人都是絕對的無神主義者，往往是很激烈的。但是他們都是受了宣傳的影響；他們所聽見的祇是廢棄宗教的聲浪。整天不斷的有人告訴他們，說宗教，無論什麼宗教，都是一種罪惡。可是這些小孩並沒有到過任何一個城市。他們從未受過任何革命團體間接或直接的影響。他

們也未上過學。他們也從未和青年共產黨員一塊玩過。然而他們的無神主義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他們不知道，也不管這些。他們只是這樣相信！

不久，我又和一個俄國學生到一個很邊僻的農區裏去作徒步旅行。這個地方還沒有工業文化的足跡，沒有電話，也沒有火車。這就是俄國人所稱的「聾」的鄉村；這恐怕是聾中的最聾的一個吧。我同我的遊伴很攸閒的從一個農村走到另一個，有一天，我們遇見了暴風雨，就向最近一所農民住的房子跑去。那是一所半類的木屋：一個草蓋的屋頂和兩個滿著塵土的小窗戶，像一個屍身上的兩個晦暗的眸子，看着那泥水汪洋的街心。一看就知道這是一所真正的貧民窟。

屋裏是一羣從七歲到十二歲的小孩。我們招呼他們，但是他們笑着擠在一堆，好像很怕羞似的。我拿出幾塊糖來分給他們，這是農家小孩的至寶，他們立刻漸漸的和我們熟悉起來，也肯說話了。在這所屋子裏沒有一個成年的人。這時正是夏天，成年的人都在田裏工作。只有一個女孩子，似乎比那些孩子都大些，赤着腳，一面看管着從屋頂掛下來的一個吊牀裏的哭着的嬰孩。

『孩子們，』我最後又奮勇的問，『你們中間，有人信仰上帝嗎？』

假使在舊日，當我還是小孩住在俄國的一個農村裏的時候；有人向一羣小孩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那他們一定要很驚惶的看著他，以爲他是瘋了，或是中了魔了。他們也許會抓住他們的小十字架，祈禱上帝來保護他們。在舊日，如果一個人敢向一羣小孩問這樣一句話，他一定會被這個村子裏的人驅逐出去，或許還把他捉到官中去。在舊日，「無神主義者」是對農民，無論青年或老年，的一種詛咒。在舊日，——其實僅僅在十年或十二年前！但是現在——多麼叫人難於相信呵！我的問題只是引起了善意的歡笑。

「他們都不信上帝，」那個女孩插進來說，「他們都是無神主義者。」

「你也是吧？」一個短髮黑眼的小孩也開口了。

「不是，我不是。」女孩趕忙辯護，「我像我母親，不像我父親。我信仰上帝，我也常到教堂去獻燭。」

那些男孩子都訕笑她。她似乎爲這種訕笑所刺激，更委曲的來解釋她的話：

「好罷，大爺，你去問我母親，我是不是在撒謊。她一會兒就來了，這樣大的雨，她不會再在田裏的。」

你看，我還帶着十字架呢——看！」她一面說着，一面用手撫摸着她頸間用紅線掛着的十字架。「你叫他們也給你看他們的十字架！」

「我們沒有。」那羣男孩很勝利的回答，跟着是一陣哄笑。

「你——信上帝嗎？」一個男孩大膽的反問我。

「不，根本就沒有上帝！」另一個！不等我回答就搶着說了。

「沒有人看見過上帝！」又一個這樣說。

我聽着他們的話，真不相信他們是農村裏的孩子。這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可是在我眼前的，的確是一羣粗魯的，赤足襤褸的孩子，他們侃侃的談論無神主義，覺得那是一個成功或是奇蹟一樣。我很想追究此中的原因，但是我越研究這個地方的社會生活，越是想不透這個原因。在這個農村裏并設有一個蘇維埃。管轄此地的蘇維埃是在十五哩外。沒有學校，也沒有俱樂部，更沒有黨部一類的組織，來把各種新思想灌輸給一般人民。更使人驚異的是，這村裏竟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或青年的黨員。但是，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這些新的信仰，竟深入兒童的心中，使這些不識字的村兒，同莫斯

科或其他城市裏的小孩一樣的高談闊論起來。革命好像在空氣裏過份的散佈了一種成分，這種成分使人，尤其是青年人，吸進去就會消滅了宗教的信心。無論在田地裏，酒店裏，市場上，甚或至於在教堂裏，我從沒有聽見青年人在很尊敬的談着教會，宗教，或上帝。只有那些女孩子們，還對於舊的信仰有些捨不得立刻割棄的樣子。

當我看見離別了十八年的故鄉，使我真有隔世之感。我和一個舊的隣居在路上坐車走着，處處可以看見宗教沒落的現象；這些現象和我童年的回憶一比較，真叫人難以置信。以前在每個路口上都有木的十字架——很高大，上面釘着耶穌的聖像——但是現在都沒有了。我問車夫這些十字架都搬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很安靜的回答說，已經爲農民當木柴燒了。他還說，有許多地方，農民把他們墳地上的十字架都拔下當柴燒。這當然是一種罪惡，『但是』他說，『我們農民很少有人再信什麼罪惡了。』他又說：『很多農民已經不信神了。』這些話使我一樣的驚異。

我在這個鄉村裏住得不久，就證實了那個車夫所說的話。舊日在村口上有一個小的神龕。是這個地方最莊嚴的建築。織塵不染的屋頂，上面一個綠的大十字架，有刺的短籬圍着一片青蔥的草地，

雞犬都不能進去。無論什麼地方有損壞，——短籬上掉了一個刺，或是竈屋短了一片木瓦，折了一個角柱——總是立刻就有人來修復的；農民路過此地，無論在馬上或是步行，也總要停下來很靜穆的鞠一個躬，口中喃喃的默祝。

現在這個神龕已經頹倒了。四圍的短籬也已不見，地下的草都爲豬連根掘起，地上留着一個個大的黑洞，好像屍身上的傷孔一樣難看。窗戶也已敗壞，樞柱斜掛着像折斷的臂。裏面的壁畫都已模糊，牆上都濕霉了；地下長着亂草，聖像上已經沒有白的綢幕，聖像受塵雨的侵蝕，變得破舊暗淡，十足表現了一種信仰的將死。其他附近鄉落的神龕，也全都是這樣破舊。我問農民爲什麼不再修理它們，他們抬一抬肩或搖一下頭對我說，他們太忙，太窮，所以沒有工夫再想到他們家以外的事了。這真不像一個曾經篤信上帝的人所說的話呢！

星期日很少人上教堂。他們都一羣羣的集在街上，一面談話，一面去翻車魚的殼。那個鎮上的教堂，本來是八個村子，六千人口所公有的。在舊日每逢星期日，總是擠滿了善男信女。現在也已門可羅雀了。星期日我到那裏去，數了一數去的人，一共才二十七個，都是老年人和小女孩子。我一直等到禮

拜做完，再也不見有人來了。

我又去看望那個牧師，我在兒童時代就認識他。他現在已經駝背曲腰，老態龍鍾了。他的眼睛裏佈滿了血絲，很長的灰白色的頭髮蓬起着，好像從未梳過似的。他看着真和他的教堂和附近村裏被棄的神龕一樣的淒涼。他在貧窮寂寞中生活着。他的田地已經爲蘇維埃政府收沒，一點都沒有剩下。他現在以出賣那些道具維持生活。蘇維埃政府時時趕他，農民也不起來援助他。他們對教會和他已變得絕對不關心了。這使他尤其傷心，他哭着說，他們平時永不再來教堂，在聖誕節和復活節也不過是來湊一湊熱鬧，並不是爲禮拜。

當然的，在俄國現在還有許多教堂開着，並且在聖誕節和復活節仍是充滿了香客。我也到過幾個村莊，那裏有許多老年人仍對教會虔誠的擁護着。我到過黎城 (Ryazan) 的一個農村，那裏會爲擁護教堂鬧過一個極大的風潮。本地的一個教師，因爲不滿於破舊的校舍，呈請當地的蘇維埃撥教堂的一部份給他做教室。當這個消息傳到那些老年人的耳內，他們就秘密的開了一個會議，決要殺死那個教師。他們決不願把教堂的一部份，作爲一個蘇維埃學校的校舍，來污損了教堂的尊嚴。這個

教師爲了逃脫性命，只好離開那個村莊。

在南方，許多新教的支派，像浸禮會 (Baptists) 及福音會 (Evangelicals)，因爲革命後并不禁止他們禮拜，他們招了很多新的教徒，多數是成年人。并且不時有一種新的教會發生，宣傳一種新的教義和新的儀式。同時一般江湖醫生，術士，及預言家，也有時在鄉村裏出現。普通農家的女孩子，大都願意在教堂裏結婚。估計大約只有十分之一的新娘，是願意不到教堂裏去的。實在的，我們不難舉出很多事實，來說明宗教在蘇俄仍是很盛行。

但是，俄國是那樣大，無數萬萬的農民，散佈在無數萬萬的農村裏。我們以爲重要的，并不在仍有很多人到教堂去做禮拜，而在以前一般熱心贊助的人，現在都不再做禮拜，祈禱和信念上帝了。宗教在蘇俄的危機，是根本信仰的動搖；有的人是受了革命的影響，有的人根本就對宗教很冷淡，以前受着嚴厲的訓練，不敢反叛，現在便爆發了。使一個忠實信仰者憂心的，并不在那裏仍有很多教堂開着門，仍有人去做禮拜，而是在有很多教堂已經不得已的停閉了，同時那無神主義的潮流，已深入一般少年的心中；甚而及於一般農村的少年——雖然大部仍僅限於男孩子們。值得一個誠懇的學者



的深思的，不是外面一般的現象，而是在底裏的一種根本的活動。無論什麼地方都有這種活動，使得宗教的信仰，日趨解體。

俄國宗教的沒落給我最深刻的印象的，莫過於當我到基府（Kiev）的時候；這是俄國一個最古舊，最美麗，最快樂的城市。光榮的基府！那一個俄國的農民沒有聽人說過這個聖地，這個俄國的康得堡（Cantebury）？就在那裏，拉地米皇的臣民歸依了基督。就在那裏，蓋起了第一個學校，圖書館，和東方教堂。就在那裏，出版了第一種教會的報紙。就在那裏，封了第一個先聖。就在那裏，許多聖人的遺物，都在有名的白雪斯基（Pechersky）廟裏保存着。

在舊日，無論那一個農民有災難，如一個女子久不懷孕，男子中了邪病，嬰孩不能說話，無論是什麼人力不能醫治的疾病，或是親友不能安慰的苦痛——那一個農民在他的苦難中，不願到這個聖地來，在神前燃一支燭，吻一吻那些聖者的遺物，飲一口聖泉的水，希望減少他們的痛苦。從俄國四方來朝聖的人男女老少，總是成千成百的——每年約有五千人——手上，背上，都駝着很重的行囊；每個人都帶來一腔仇恨或苦惱；每個人都充滿着信心；每個人都希望看見神跡。

基府，這是古俄羅斯的光榮之夢，和平者的希望，落魄者的天堂！東方教的精神和靈魂！

這個城，雖然經過了那可怕的內戰，看起來仍和從前一樣的可愛。她的一山一谷，高岸深泉，花園和聖墓，無一不仍包圍在陽光與花氣之中。那克萊茶尼克 (Kreshchatnik) 我覺得是俄國最神秘的街，比列寧格勒的納湖斯基 (Nevsky) 還神密；仍和從前一樣的美麗；到了夜間，各種的人出來走着，有穿得最講究，生的最漂亮的，尤其是女人。也有外表看着最快樂最輕快的人。基府是一個充滿了神密的力和美的城市，不是一種人力或幻想所能滅滅她的美麗的。

我趕忙的到了白雪斯基 ● 拉弗拉 (Pechersky Lavra) 這是最古的一片聖地，俄國有名的僧院，都集中在那裏。我先在四週徘徊了一下，隨後才走進門去。當我一踏進那個院子，立刻就有一種萬象寞落之感。地下雞鵝蹣跚的走着，啄着從邊道的磚縫中生出來的野草。那一排排的禪房，以前住着僧侶和香客的，現在都滿着平民；以前的宗教祝頌之詞，已經聽不見了，現在可以聽見的是那些莊嚴的革命歌。不知何處有一個手風琴伴一羣男子的聲音在奏着一個很輕快的調子——無產者居然在白雪斯基的聖地高歌歡唱起來了！很少的幾個人在那裏徘徊，這些不是香客，也不是乞丐，而是迷

途的觀賞風景的遊客。看不見一個農民；尤其令人驚異的是，僧侶也很少。

我經過一羣倚在短牆腳下，若有所思的僧人。他們都有很長的鬚，穿着繡袍，佩着光亮的十字，看來似乎是很堂皇的，可是在這堂皇之中，仍遮不住一種苦寂的神情。在這個革命的狂潮中，青年人和執政者對宗教都摧殘不遺餘力，自然他們是世上最寂寞的人了。我過去和他們說話。他們對我很熱烈，同時又很驚異一個遠方的來客，能和他們用他們的言語談話。別的僧人都從他們的小屋裏跑出來看我。他們不斷的問我，都是些什麼問題！即使他們都是永遠隱閉在山洞中的人，也不見得對於他們的小天地以外的事物，會這樣誤解的吧！從美洲到俄國有多遠？在海上旅行是真的安全嗎？在美國有蘇維埃政府嗎？美國人在教堂中供奉神像嗎？美國政府對於僧侶優待嗎？沒有終止的問着。

他們請我同他們一塊喫些下午的茶點——茶，黑麵包，和蘋果醬。這些都是他們自己做的。他們很抱歉，覺得款待很不週到。他們現在實在太窮，比一般貧農還苦。他們三餐見不到一點肉，雞蛋，和餅子。僅僅是塞飽肚子就算了。他們所有的田地，舖子，和客舍已經不是他們的了；遊客所給的香火之資，他們也難到手。他們的衣服鞋子破舊到萬分，也沒有新的可換。他們一點新的東西都得不到，甚至

於一把水壺，一雙短襪，一方手帕都沒有。他們平日靠賣臘燭，畫片，和其他宗教上的遺物來維持生活。這些東西也不是賣給農民或香客，而是賣給那些不關心的遊客，他們大部分是來想找些反對上帝的新的口實的。俄國今日已到這種地步——一片聖地已成了異端人的遊樂之所了！但是上帝不會捨棄他們的。也許他這樣教他們吃苦，正是在試驗他們的信心。他們也永遠不願拋棄他，即使是全俄國，甚至於全世界都反叛他。在他們訴苦的言語中，忽然聽到這樣帶着英雄氣味的話，倒也感到一種安慰。

兩個僧人自動的願意領我去看一看地下的聖洞。我們手中燃着燭，走入了那古舊的墜道。在那裏看見許多歷史上的陳跡。那裏不但有僧人，——失意的皇裔和戰士，也往往逃到那裏去隱居。一般高超的人，鑒於世間的多苦惱和誘惑，也往往逃在那裏去懺悔深思。許多人就這樣的隱居在那裏，一直到他們的死。我們一面走着，就看見許多開着的棺槨，裏面放着那些先聖的遺骨，上面用紅布覆蓋着。一個領我的僧人很憾慨的說：『在舊日成千的朝拜者到這裏來，跪在這些遺骨之旁，吻着上面的紅被，沉思默禱，往往留連在這裏，幾天不願離去。但是現在——』他不用再說下去了。四周淒涼的景色，

說得比他還真切多呢。

『你知道爲什麼這些農人會忽然不信上帝呢？』我問。

『呵，農民，』一個紅鬚短小的僧人回答，他的光亮的眼睛，閃着失望和仇恨的光，『簡直是畜生。他真是畜生。他就是我們國家的敗類，他比一切反叛上帝的人，布雪維克和紅軍都可惡。他什麼也不懂。他從來就沒有把上帝放在心上。朋友，那是實話。農民永遠就沒有真的把上帝放在他們的心上，因爲他們根本就不了解他。啊，這可惡的農人，人間的畜生！』

『是的，這兄弟說的很對。』一個較長的僧人說，他很高飄着黑鬚，較他的同伴顯然幽默的多，『農人根本就是目無神道的，不然——但是不信神的人豈能長久的統治俄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我不願再多說什麼了。』

幾小時後，我離開他們。當我在歸途中偶一回首，看那高的圓頂，在夜色中逐漸模糊，使我覺得夜非但已籠罩了這片聖地，并且也籠罩了她所代表的俄羅斯一切的宗教。

以後當我到俄國別處農村裏去，看見農民同樣的不關心宗教的現象，尤其是年青人；我就問我

自己和別人，到底爲什麼以前農民是基督信仰的台柱，而現在會變到這樣。以前農民曾在許多詩歌中被稱爲『聖俄羅斯之靈魂』、『受大苦難者』、『神秘的玄想者』等等，總之是一個具有聖人之心的人。爲什麼現在會變得這樣？一個基督信仰的主角，怎麼樣會變到這樣？

我知道有些人要回答什麼。我常聽見許多俄國或他國的信教的人這樣說。那是一個最簡單的回答——因爲布雪維克的宣傳。但是這樣的回答，未免把宣傳的力量，看得太神乎其神了。我們不能否認布雪維克普遍而精密的宣傳的力量，但是它爲什麼能壓倒幾千年來爲俄國東方教所把持的宗教宣傳呢？

布雪維克黨人很明白，很驕傲的承認，他們是仇視宗教，并欲剷除一切宗教信仰的；信教的人是不准入黨的；并且如果黨人有信教的趨向，或是僅僅受了他母親或妻子的影響，也一定要被開除黨籍的。

他們對待東方教徒很嚴厲。但是，因爲東方教會在歷史上的背景，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它在以前是舊政府的一部份，布雪維克現在自然要說它是反革命，而予以停閉了。教中的領袖又處處和蘇維

埃政府對峙，并勸人民不要服從它的命令，這更增加了黨人對教會的仇視。

羅馬教的教徒也是時時受虐待。但這也是爲了政治的動機。在俄國，羅馬教徒大都是波蘭人，因爲俄國人和波蘭人間的仇視，自然反響到蘇維埃領土上的波蘭教徒，尤其在靠近波蘭的邊界上。

除掉上述的對於東方教徒及羅馬教徒的種種虐待外，他們對於任何有組織的宗教，皆不歡迎。在下面的一章中，我將解釋他們對宗教仇視的理由。此處我只願說明一點，就是他們認爲宗教信仰與他們革命的目的，是根本背道而馳的，所以他們要極力減少這種自由，認爲只要不與他們所宣傳的『信仰自由』矛盾就行了。無論那種教會都不准從事於文化或社會事業。圖書館，俱樂部，醫院，施藥局，育兒所，合作社等公益事業，皆不得參加。這樣教會的職務，就限於純粹的信仰了。布雪維克這種政策是否能夠維持下去，只有讓時間來告訴我們。假設能夠維持下去，那要算一般新教派最感痛苦。他們很能利用革命的方法將社會事業織進他們的宗教生活去，所以在革命的初期，他們收了很多的信徒，尤其是一般年老的人。蘇維埃政府現在命令禁止對十八歲以下的兒童，在家庭以外施以宗教教育。這雖然沒有明文禁止兒童到教堂去，但是無形的把許多教區學校和星期學校都禁閉了。

這些禁令不能算爲宗教沒落的唯一的原因，因爲這種現象，除掉新教派以外，一直普及到下級的農民。布雪維克政府雖然曾把許多先聖的遺骨，公開展覽，但並不禁止人們去朝拜倍雷斯拉夫（Pereyaslavl），基府，波它伐（Poltava）及其他以前極繁盛的聖地。但爲什麼現在事實上沒有人再去朝拜那些地方呢？即使走在市場上拉着手風琴，或其他樂器的乞兒，也不再唱那些宗教的詩歌，而改唱些革命的歌調了。布雪維克政府並不對到教堂去的人徵稅或處罰，但是即使在鄉村裏的教堂，也不及以前一半人去做禮拜了。許多教堂都因爲經費來源斷絕而停閉。只消看一看基府的荒涼——在舊日那裏靠遊客的香火之資，養活着成千的僧侶，現在連十來個僧人都很難維持！

即使政府絕對的壓制宗教，也不能解釋這種日暮窮途的現象。歷史上不乏壓制宗教，而結果適得其反的例子。我們只消看一看基督教早期的聖父，和在西班牙及各地的猶太人，他們如何被逼迫着放棄他們原有的信仰。痛苦和刑罰只是使他們的信心更爲堅固。

我們要追求宗教在蘇俄沒落的真原因，必須研究蘇俄一般人民的生活，及他們的思想 and 信仰。



## 二 宗教沒落的原因

我有一次在莫斯科聽范登斯基大主教 (Vvedensky) 演說，他也許是俄國最有學問，最善言詞的一個教士了。他正談到東方教——舊日爲俄國國教——的缺陷及其他問題，他說：

『外表的希臘式的輝煌的儀式，是我們東方教最大的缺點。我們只顧外部的誇大，而忽略了內部的道德；只顧外表的奪目，而減少了內部的精神的完整。它有華飾，權力和財富，但就失掉了靈魂。直到現在我們才了解到我們東方教在精神上是怎樣的一個稚兒。這就是它日趨沒落的原因。』

歷史證實了這個教士所說的話。東方教的確是太尊重儀節和外觀了。當它在第十世紀之末從希臘傳入俄國時，同時帶來了一種外表的輝煌和一種新的道德，很有力的，使野心勃勃的拉地米皇也終於屈服了。但它不久就陷於一種靜止的狀態中，而變爲執政者手中的一種玩具。它不想去適應一個前進的文化，也不能在人們腦中激起新的問題和新的理想。它對科學，人道思想，及日高一日的社會運動的挑戰，毫不理會。它幾乎不承認它們的存在。它也從不和他的精神和智識上的敵黨論辯，

像羅馬教一樣。它用不着這樣做。因為一切外來的責難，都有政府爲它強硬的對付。所以它就永遠沒有像羅馬教一樣的得着一種精神的生命。事實上它已和實際生活，俄國人民的苦惱，及種種問題分離得很遠了。

同時教會的內部，也從未整頓過。教徒是絕對不許有懷疑或批評的。每年它總要發表一篇攻擊異己的文章，它以爲它自己是全世界，全人類，所有精神上的智慧和公道的全部。偶然的也許有一陣西方的疑難之風，吹入一兩個僧侶或世俗的腦中；在一兩個廟院或鄉村中，也許可以聽到些反對的聲音。但這些不久就會消滅的。事實上，東方教和所謂的「信舊派」(Old Believers)有很大的分裂，但是他們所注重的是些形式問題，如聖書上一字半句的正誤；如何用手來形成一個十字，用兩個手指或整個的手。世界上一切教外的思想，它都可以不聞不問。它永遠只有繁重拘板的儀節，而沒有精神的生命。從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時代，改爲國教後，它已失去一切的獨立性，而變成俄皇手中的一種武器。同詩也和外界的思想隔絕。怪不得託爾斯泰(Tolstoy)要說：

『我不能不仇視這種有害的宗教……它把錯誤的上帝的思想和法則，灌輸到下級民衆及少

年人的心中去，使他們日趨腐敗。』或者像有名的地龍博士（Dr. E. G. Dillon）有一次所說的，『俄國的教會，是古舊的膜拜文式的博物院。』

東方教會的這種情形，對於農民的精神生活有很深的影響。它所着重的不是活的情感，信仰的眞意，和禮拜的意義，而是那些神話，巫術，和儀式。它永遠不重實質，而重形式。不重信仰的精神，而重種種藝術。

有一次我到唐斯可寺（Donskoy）去觀光梯庚（Tikhon）長老冊封一個西伯利亞主教的典禮。儀式真是華縟繁重，賞耳悅目，像演劇一樣，美妙的音樂，鑲着寶石的神像，光耀奪目的僧袍，處處表現着東方教禮拜的特色。但是大部分信教的人——農民，從沒有想到這些繁文縟節與他們無味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東方教并且也不禁止農民迷信邪說。它容許那些巫女術士到鄉村裏去欺騙那些窮苦的農人。它看着他們喝酒，盜竊，暴殺，及犯其他的罪惡，而并不想法來拯救他們。

基督教并未成爲農民內生活的一部分，對他們也不是一種向上的鼓勵。他永不翻一翻聖經。多

半是因為他不認識字，不能讀。有一次我在伏加河上問一個農人，他是否喜歡『山中聖訓』。我好像問了他們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一樣。他們從來就沒有聽見過這樣一個字。除去少數例外，大多數農民關於宗教及上帝的智識，并不是由聖經中沉思得來，而是從那些尊重外表及形式的東方教堂中得來，結果使一般農民都覺得宗教只是外面的一樣儀式，與內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他雖然覺得它是不可少的一件東西，但是很遼遠，很模糊，在他身外而不在他的內心裏；是一些好看的盛典和儀節，但不是一個可以深思冥想，與造物者心馳神合的理想和表現。除少數例外，很少發生像福斯底克（Fosdyck）所謂的那種『個人的心理經驗』的。

所以農民的信仰的方式，真是呆板極了。它已變成一種也頗虔誠執行着的固定的儀節了。他照例的到教堂去，他照例的節食，在神像前獻燭，朝拜先聖和高僧，求醫求子，求鴻福。他永遠是想以表面的儀式為達到他希望的代價。他跋涉長途到那些聖地去，并不是想收到精神上的安慰，而是懷着一個固定的目的。他從不想到這是否合理或與宗教的道德相合。我們都知道農人竟有縱火搶殺而去求上帝保佑的。

這樣一個沒有靈魂的宗教觀念，自然敵不住那個掃蕩一切不理性的信仰和舉動的革命潮流了。它的微弱的信仰，不能把農民從革命所給與的種種矛盾，反常中解脫出來。教會在他腦中本來是神聖不可侵犯，起來反對它是要受最重的懲罰的。他總覺得教堂，長老，主教，等等的尊嚴，真是非人力所能損滅絲毫。可是，最神聖的梯庚長老被拘捕了，那些拘捕他的人，並沒有變成石頭，聖像上的金珠寶石都被剝去了，這些犯罪的手也沒有爛掉。先聖的墳墓被掘開了，但那些掘墓的人，並沒有死去。先聖也不過是一堆白骨，一點力量都沒有。大主教，小主教，神人，高僧，都被驅逐，禁閉，放逐，虐殺了，像普通囚犯一樣，與他們的仇人絲毫無損。這些平日農民所信賴，認為具有神力的人們，連他們自己也不能保全了。

世上根本就沒有所謂神跡；神仙也不能為力。一切儀文符咒，都是廢話。那萬惡的革命者，戰勝了教會，戰勝了巫術，戰勝了神跡，戰勝了先聖和大主教，甚至戰勝了農民所知道的惟一的神父！

東方教的儀式的神祕主義，使它的地位變得更壞。它平日沒有一種生命使它與革命的潮流掙扎，而安全渡過，更沒有在農民間培植下堅固的信心，作為自己的後盾。它只知道拿權力來威嚇他

們。拿符咒來蠱惑他們。但它沒有在他們心中喚起友情，喚起一致的精神，喚起相互的情感。

到此時農民當然走他們最易的路了。他同教會脫離關係，什麼害處也沒有。他的食量沒有減少。他仍舊睡得着，做得動工。他絲毫沒有感到悔恨或不快。生活像平時一樣安靜的進行着。並且在物質方面於他還有利益。他現在已無須再將一包一包的黑麥，一塊一塊的麵包，一捆一捆的麻，和一匹一匹的布往教堂裏送去。這種物質上的利益，農民是多麼斤斤較量的，也成爲他們對宗教驟然冷淡的一種動機。

讀者一定要懷疑在革命前許多書中所說的『神聖的俄羅斯』到那裏去了？他一定要問，像格拉漢 (Stephen Grahams) 一類用佛一般的心腸來同情於衆生的苦難；用高超信仰心，求着萬世的真理的農人，到那裏去了？

我也時時追問自己，當然在俄國各處鄉村遊歷時，我很抱歉，就從來沒有遇見這樣一個，像救世主一般的農人。理由很簡單——他根本就沒有在那些浪漫的理想者的想像以外存在過。『神聖俄羅斯』不過是一個欺人的傳說。一個像救世主一樣的農人，不過是一種寓言。即使是託爾斯泰那樣

反對現代文化，傾向返樸還真，讚美俄國農民簡單的生活的人，也未嘗寫過一個像聖人一樣精誠能感動山岳的人。即是屠格涅夫，契柯夫，烏斯潘斯基 (Gleb Uspensky)，契利柯夫 (Chirikov)，布寧 (Bunin) 及高爾基諸人，也從未遇見過這樣忍受一切，寬恕一切的農人。農民有時確有仁慈和堅耐——但並不是發於內心，而是發於強迫；他服從並不是由於內心精神的寬大，而是由於強力。但當他於手中的枷鎖解脫的時候，立刻又能變成怎樣的一個野獸！當他抓住權力時，他又能怎樣的暴殺！讀者只消回想以往農民參加的暴動——一六六九年斯登卡 (Stenka Razin) 革命，加太林第二時代的普加契夫 (Yemel'yan Pugatchev) 革命，十九世紀接續不斷的暴動，一九〇五年及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那時農民鎗斧在手，幾乎要把所有的地主階級都殺盡了，來消除他們多年的積恨。

所有說農民以『自苦』來求精神的超脫的話，都只是傳說。在農民的字典上，根本就沒有『精神的超脫』這樣一個字。他也不懂這個字的意義。他時是很熱心的。但所有其他的農民，所有文化單簡的人民，也無不如此。韃靼 (Tatar) 或甘吉士 (Kirgiz) 的農民，也是同樣的堅苦及和藹，有時較俄國農民還有過之。當他在草原上放畜牲口的時候，你去看他，他一定會殺掉他最肥的一隻羊來

款待你，會款待得使你覺得過不去。但是他不是基督徒，他更恨東方教；他是一個回教徒。

農民外表上雖然是虔誠和仁慈，但內心也許充滿了異端的思想。他根本就不了解信仰的真正意義。至於在農民間許多新教派的勃興，係對國教統治下的繁重的儀式主義的一種反抗。農民需要更熱，更有生命，更與他們精神上的需要適合一點的東西。說也奇怪，還只有這些新教派對於革命勢力，尚有一點反抗的力量。

當我寫着，不由的就想起許多見聞，足以表現一般農民根本缺乏一種一個基督信徒必不可少的尊敬和忠心的精神。有一次在一個農莊的村民大會中，足有幾千農民聚在那裏——我問是否有人在家裏還留着聖經？沒有一個人舉起手來。於是我又問是否有人以前有過聖經？祇有十幾個人舉手。

『我接着問：『你們把它怎樣處置了——是賣了麼？』

『不。』羣衆中有一個回答，『在內戰時我們從城裏什麼東西都得不到，甚至連包烟的紙都沒有，所以把聖經包烟吸了。』由於調查，我知道許多鄉村都這樣做過——把聖經包烟吸了！



又有一次，我經過一個村莊，我的注意爲一所破舊的大瓦房所吸引了。那鐵頁的房頂已經不見，門窗也已被人取下，牆頂的磚也少了幾層。那時天已黃昏，一個兵士持鎗鶴立在那裏。我問他爲什麼站在那裏，他回答說，假使要不是他站在那裏，農民一定一點一點的把這所房都零星偷盡了。他加重的說，這不是一所地主的房子，不然倒可以讓他們這樣報復；這是在革命前剛完成的一個教堂，因爲沒有人去才停閉的。我到別的鄉村，許多停閉的教堂，也都爲本地的農民拆毀，房頂的鐵片，門窗上的玻璃，鐵件，及木料，凡是於他們有用的東西，都被偷盜一空。總是經地方的蘇維埃派兵駐守以後，才算完結。在內戰時期，當蘇維埃政府的勢力還不足保護公共財產，僧侶都四散奔逃，不知有多少寺院都被農民搶掠了。我問他們爲什麼對於以前禮拜的地方這樣毫無戀惜，將來也許他們還有用它的時候；他們也不能解釋。他們只是說，這是一個公家的建築，既然無用，他們就樂得來利用一下。

又有一次我坐馬車到一個很遠的農村去，車夫在一個十字路口停下來飲馬。我注意到那水槽是用一塊很大很精緻的石碑填起來的。我仔細看一下，知道是一塊墓碑，顯然是一個地主的墓上的東西。農民好像絲毫於心無愧的移來用了。又有一次，一個老年的農民領我去看他的穀場，我看見地

下一個泥塘也是用兩塊墓碑填的。我問他從那裏得來的，他說是他的小孩們從鄰近一個家祠中移來的；那家的主人已經逃到國外去了。但是，我問了，這樣拿別人的墓碑不是犯罪嗎？他對我聳了聳肩——也許這是犯罪，他說，但是他的孩子們已經這樣做了；現在俄國孩子們是不信什麼叫犯罪了。

這些例子，篇幅不容我多舉，可以充分表現出農民對於基督教或東方教根本沒有深的信心。假設他真像斯拉夫理想主義者所描寫的聖人一樣，請問他敢於或願意「吸」聖經嗎？假設他真像斯蒂芬所描寫的有救世主一樣的靈魂的人，他肯把別人墳上的石碑，移來填水槽，和地下的泥塘嗎？他會有這種勇氣去拆毀停閉的教堂的木料？搬回家裏去用嗎？他能殺人放火還去禱告上天保佑他成功嗎？他能看着神像上的珠寶為人偷盜一空而漠不關心嗎？我們不能不承認俄國農民根本在心裏是一種異端的人，除非他是屬於那些新教派的。只有那些信新教的農人，因為他對聖經和基督教的使命，有他自己的了解，所以在革命後仍能保持他舊有的信仰。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把他這種信心，傳給他的子孫，使他們內心有一種力量，足以抵禦那無神主義的狂潮。

### 三 新信仰代替了舊宗教

蘇俄宗教崩潰的特點，特別不易使人忘記的，就是一般青年公開的信仰無神主義。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看見青年公開的侮謗神道，並且別的青年不久也會來附和着他，除非是少數的新教徒。我說除非是新教徒，因為新教徒在今日宗教信仰似乎堅固一點，至於將來會不會改變，那還是一個問題。

有些宗教領袖很樂觀的誹笑那種以無神主義爲蘇俄永久的情形的思想。他們說，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過去曾經過一切的壓迫，所以現在的布雪維克主義者也不能使它消滅。我回答這種論調時，我必須加重指出在歷史上基督教徒從未遇見過這樣有力的仇敵的事實——一個像布雪維克主義者那樣果敢，有能力，有智識的仇敵。我們祇管抹殺他們的戰鬥力是無用的。他們也并不依照其他反宗教者的步伐前進——完全不一樣的。例如，強暴和壓制，並不是他們戰略的一部分；他們知道用強暴的手段是容易引起失敗的。

爲什麼他們這樣強烈的反對宗教呢？我們祇說他們對於東方教的懷恨，是由於它對舊政府的馴服，對社會進步的阻害，及對革命者不斷的壓迫是不足的。這可以說是他們反對東方教的理由，但不能解釋他們仇視一切宗教的心理。

我們一定要回憶過去的歷史。他們生長在那種空氣中，使他們對宗教沒有養成一種同情心的可能。我們看一看俄國已往的革命運動。無數男女聯合起來，爲了想把黑暗的大衆從腐舊的暴政下救出來，他們研究，喫苦，祕密的計劃——都是爲了別人。他們爲了他們以外的一種信仰而生活。他們對於自己的安樂，完全沒有顧到。錢，光榮，事業——對於他們都不重要。今天他們在家裏；明天也許就逃避到一個石洞中去了。今天他們還在南府斯街 (Nevsky Prospect) 散步；明天也許就在西伯利亞的途中了。今天他還在愛人的懷抱中；明天也許被送到尼發河彼岸的培濁派無羅夫斯基監獄 (Petrovlovsky Fortress) 中去了。這些男女有的是熱情，有的是愛，有的是信心，有的是犧牲自己的精神。無論誰讀到加野葉夫 (Kalyayev) 吉舒尼 (Gershuni) 載禮博 (Thelabow) 博來希可夫 (Breshkovsha, ya) 芬尼哀 (Finger) 莎蘇立 (Zasulich) 及其他諸人的傳記，也會覺得他們

不僅是英雄，同時也是人類的善之花，高貴的精靈，基督教理想的實現者。

但是，他們心中這種革命的熱誠，並不是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所喚起的。他們的信仰或行爲，都是由於一種非宗教的來源。宗教並沒有給他們任何助力或鼓勵。你很難從他們的言論中，找出一點感謝宗教的話。也沒有一個革命領袖是以革命作爲一種宗教理想之表現的。雖然加野葉夫也曾做過幾首關於基督的詩，並且革命運動中，也往往有僧侶加入，但是革命運動本身，仍是由於宗教以外的影響而發生的。那些革命者並不是在爲上帝服務；他們自己也不承認他們在實現基督耶穌的意志。他們是在爲革命服務，爲黑暗的大衆服務。他們那種信仰的熱情，忘却自我和犧牲一切的精神，都并未受到宗教的影響。事實上俄國的革命運動是受了法國革命和德國唯物主義的影響，兩者都是於宗教不利的。布雪維克主義者在情感及精神方面，都承受了那舊的革命運動的遺產，自然對於無論什麼宗教都抱着一種仇視的態度了。馬克斯當然是他們精神上的祖宗了，然而也就是馬克斯第一個說：『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劑。』

布雪維克主義者現在并不諱言他們對宗教的仇視。不像其他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如麥克唐諾

(Ramsay Macdonald) 等人一樣，他們不承認宗教社會主義在目標和方法上有什麼共同之點；尤其是基督教。莫斯科人民司法委員會副委員長克雷西可夫 (Krasikov) 氏有一次對我說：『有人以為基督教和社會主義有相同之處，那真是荒謬絕倫。我們今日所憂慮的，不是基督教在蘇俄的日趨沒落而是它的復活。』

布雪維克 黨人排斥宗教的理由——尤其是基督教，因為它是一切宗教的領袖——是多方面的。因為他們是唯物主義者，所以他們反對一切的神秘主義和理想主義。他們覺得信仰上帝並沒有物質的根據，那不過是一種想象，一種欺人的神話。布加林 (Bukharin) 說：『從資本主義的社會，轉變到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將使一切宗教和迷信，都自歸滅亡。』

至於基督教，他們覺得有許多教義是反社會和反革命的。它教勸馴服於命運，能減少人們為改良生活而奮鬥的勇氣。它教人夢想着天堂的生活，而去忍受社會上一切的不平。它教人勸人為善，但它不能消滅世上弱肉強食的現象。它祇有理想，但沒改造社會的方法。它倡世界大同之說，但實際被利用作社會及種族之爭的武器。他們覺得它的一切金科玉律，都是可以推倒的；他們針鋒相對的創

立了階級鬥爭的理論。無論什麼現代化的宗教他們都不要。康德 (Kant) 說宗教就是「神聖」，「崇拜」和承認一切神命的責任；密爾 (J. Smith) 及赫斯克萊 (Huxley) 認尊重及愛慕理想的生活爲宗教；福斯笛克 (Fosdick) 認宗教一種超脫內心的愛和日常情感的經驗；馬滕奴 (Martineau) 博士以爲，宗教就是信仰有一個永久的神在統治着宇宙和人類道德的關係；福斯笛克 又認「人格」爲宗教的靈魂——布雪維克 主義者對這些都一樣的反對。他們在文字中「上帝」(God) 的第一字母，也不大寫。對他們，「宗教是人民的麻醉劑。」

他們反宗教的理論是這樣的——他們覺得宗教並不是一種內心的力量或衝動的結果，它不過是一種訓練，是由一種外面的勢力所造成的東西。他們說，假設小孩子生出來就不給他宗教教育，他們大了就會不信宗教，宗教也就自然的萎滅了。

蘇俄 宗教的危機，在本質上說起來，就是教會、家庭與共產黨間對於管理青年人的信仰的競爭。這是一個劇烈的競爭，它的結果將影響到外面的世界。共產黨的勢力是很雄厚的，他們有紅軍、學校、託兒所、體育場、電影、演講、報紙及其他間接或直接組織，如「十月革命主義者」、「拓荒者」及「共

產主義青年團」等，也有五百萬人，在物質來源上，能力上，勇氣上，他們都佔着優勢，他們想使革命和無神主義——與革命不可分開的一部分——成爲他們日常生活的一種勢力。我們在這裏要注意的就是蘇俄共產主義者不僅是有一個理論，叫青年人去擁護它，他們在那種理論之中，還含有一種冒險事業的精神；所以無神主義也便成爲一種青年的事業了。

他們不僅注重在破壞方面。這點便與所有歷史上的反宗教運動，大不相同了。他們知道除去一個由來已久，已成爲文化的一部份的制度，不是可以留下一個空隙，不久又爲這種制度變相的來佔據的。他們也知道宗教中有許多特點，可以引起人們愛美和自尊的觀念。可以滿足他對生命及宇宙的神祕的追求。所以他們要以他們自己的理想及制度，來滿足這些要求。他們要使宗教失去它存在的理由；使它在物質、精神及心理方面，對人類失去它的價值，他們相信用科學、藝術、道德、社會服務及一種新的信仰，可以使俄國永遠不要宗教。這些，簡單說起來，就是他們反對宗教的策略。

科學是他們想利用來割去一切宗教上謬誤的智識——如聖經上說上帝造萬物等——的一把利刀。科學就是追求一切生命的神祕，來源，範圍，及目的的寶匙。他覺得人們應該把他們的信仰放



在科學上，他們用了像在異端的國家傳教一樣的熱心，來為科學宣傳。他們的出版界充滿了科學的小冊子，它的文字很淺顯，但格調很熱烈，往往流通得極廣。祇要有一個機會，他們就對青年及較長的人講解實在的『科學』(Nauka)在俄國已成為一個神聖的字，和『冒險的新事業』(Adventure)含有同樣的意義。

他們對於道德的擁護，也不見得稍為冷淡。當然，在事實和理論上，這個字的意義，對他們已不像在西方一樣了。對於他們，一切道德，祇有在一個情形之下可以存在——就是世界上沒有弱肉強食的現象。所以，他們覺得商業上獲利是極不道德的事，因為據他們說，利潤是一種剝削的結果，所以用私產來生產或投資，也是不道德的事。在性生活中，他們雖然推翻了許多舊的道德，但對於放縱的生活，也是反對的。他們雖然不以吸煙，喝酒，及賭博為不道德，但也曾作過強烈的宣傳，來反對這些使人頹廢的事。黨員中還有一部分人反對跳舞。我個人曾有一個很有趣的經驗。有一次我和英國的新聞記者到列甯格勒的歐洲飯店去參加一個洗衣工人的跳舞會。有幾個我們認識的女孩子建議叫樂隊奏一個『狐步』(Fox-Trot)來歡迎外國的來賓，但是那主席，一個二十來歲，很英俊，沈默深思的

人，抱歎的拒絕了這個請求。他說，一個美國的『狐步』，對於一個有階級意識的無產者，是絕不相宜的。在『卡爾斯登舞』風靡全世界——中國也在內——的時候，祇有俄國沒有受到它的影響。

關於宗教的藝術，也是布雪維克主義者所要打倒的。農民在家裏掛着神像，並不祇是因為宗教上的意義，同時也為填補那空無所有的牆壁。教堂裏的壁畫，帷帘，袈裟，鍍金的十字，在在都為引起人的美感。燭光增加了不少的輝煌，歌聲更激動了不少人的情感。但是他們以為他們所要介紹來替代這些的東西，也許能更豐富的引起人美感。農人不必再用聖像來點綴他們的牆壁，他們可以張掛革命領袖的肖像，及各種圖畫，如說明喝酒，不識字，迷信及暴虐之害的；勸人愛小孩，愛生物，愛自然的，說明古時的生活和地球的地理的分期的，畫着城市及鄉村中的生活的，報告紅軍每日的消息的——這些圖畫往往意義及色彩都非常鮮明。在許多鄉村中，我看見農人的屋子裏張掛着這種圖畫。各省的蘇維埃及俱樂部中，雖然不很講究，但也都充滿了一種美術的空氣。

假使宗教禮拜儀式是有藝術價值的話，蘇維埃的非宗教的儀式，也可以有藝術價值的啊！教堂裏不是有很好的歌詠詩班團麼？蘇維埃也可以訓練這種歌詠團，不過他們不唱宗教的詩歌，而歌唱

些勞作，犧牲，及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勝利之歌。教堂對生育，結婚及喪葬不是都有一種戲劇似的儀式麼？蘇維埃也可以有這種儀式；不過在儀式之中，加上非宗教的色彩而已。他們覺得一個蘇維埃的結婚儀式，同樣可以給人一種昇華及自重的觀念。一個蘇維埃的入黨式，也許比教會的賜名禮還要熱鬧。一個蘇維埃的葬禮，——花紅標語，紅旗子，柩車上的紅蓋，軍樂隊，歌詠團，黨內同志及死者的朋友們的演說——可以使一個人莊嚴得什麼都不想。它充滿了俄國人民內心的，戲劇似的情緒，使心腸多硬的人，也會動心的。

鄉村及城市中的俱樂部，供給了人民許多教會從來未做到的社交機會。每個社會，每個工廠，都有一個自己的俱樂部，裏面佈滿了圖畫，鮮花，旗子，標語等，並且往往還有一個奏樂及演劇的舞台。農民及工人可以到那裏去會朋友，閒談，聽講演，討論問題，作公共遊戲，學習寫讀，聽音樂會，看電影及觀劇等。現在幾乎沒有一個工廠或農村沒有這樣一個俱樂部的，我曾在沒有鐵路的很偏僻的鄉村裏看過戲，雖然舞台佈置很簡陋，但是仍能使一個正確的批評家賞心悅目。我知道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業餘劇團是像蘇俄那樣發達，那樣普遍，或那樣為民衆所欣賞的。打倒一切灰暗，就是布雪維克主

義者反對宗教的武器，同時也是抓住一般青年人的方法。

布雪維克主義者以爲在革命的旗幟之下，社會服務可以增加人們新的興趣和新的快樂。在蘇俄每個人都是一個社會工作者（Obshchestvennik）。一個醫生，一個教師，一個工程師，一個農學家，一個鎖匠，一個廚娘——所有的人都應該知道社會服務的價值。社會服務就是他唯一的目標，唯一的方針——他每天工作的唯一的鼓勵。那是一個新的自我表現的方法，和一種有效果的精神的滿足。他不再祈禱，節食，獻燭，和隱居到一個廟院中去了。蘇俄的人以爲這些，除掉沒有什麼實際的利益以外，充其量也不過是求個人的幸福，和個人靈魂的超脫。他將要獻身於建設新社會——新工廠，新城市，新家庭，新學校，新娛樂，新理想。這些工作使他從個人的圈子裏跳出來，和他的社會聯在一起。他們覺得，唯有在這種活動中，才值得人把所有的時間，能力，和智力都放上去。祇有在這種偉大的事業中，才能給人一種驕傲，和自尊，因爲它是教人征服一切，而不是服從一切；是一種勝利，而不是一種恐懼。社會服務的確是打倒宗教勢力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最後，一個新的信仰——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新的文化，一個新的快樂，一個新的征服，一個新的

人——在這個世界和人羣中出現。用西方的眼光來看，這種革命的信仰也許是近乎理想，容易推翻的。但事實上，在那裏有這種熱情，並且有爲這種熱情犧牲一切的準備。我們祇消去看一次蘇俄革命者的遊行，或記念日的慶祝式，便知道他們對於這種新信仰的熱誠。這種信心，日久以後也許會變成一種空洞的儀式，和沒有靈魂的空論。世界上一切信仰都是這樣。但是在現在，無論如何，它總是一種現實，和一種超乎生命及一切事物的力量。

我承認這是一種新的反宗教運動，有計劃的，把所有宗教對於人生的功利，神祕，社會，及藝術的價值都破壞了。我想，那是一個宗教在別處從未遇見過的強敵；別的仇敵恐怕從未用科學，道德，藝術，社交，社會服務，這樣根本而又多方面的力量來對付過它的。

東方教並沒有準備和這個敵人應戰。新教徒也被弄得愁眉苦眼，有人問起他們的將來，他們只是抬一下肩。羅馬天主教也是失望之中。他們在俄國約有一百五十萬信徒，但蘇維埃政府收沒了他的財產，并禁止在家庭以外對十八歲以下的兒童施以宗教的教育，使他們受了莫大的打擊。

但是，那種反宗教的精神，現在仍是一天一天的在人民生活中深進呢。

## 四 私產

假設有一個俄國街頭的流落少年，同一個鎖匠作了朋友。他漸漸學會了他朋友的行業；他賺着很高的工資。他並不亂用，他買了一套新衣服和一隻手表。他搬到一個較爲安適的房子裏去住。他買了一架無線電收音機和一個手風琴，來消遣他的餘暇。他又起始積蓄。他分明是一個有毅力，有野心，勤懇的少年，在西方，尤其是美國，是會爲人稱道不置的。

然而，在一個青年革命者主辦的雜誌上，居然有人提出新社會是不是需要這種少年的問題。許多讀者的投函，都反對這個少年。並不是因爲他太勤懇，或有野心，而是因爲他太把生活包圍着他自己，祇顧他自己的快樂和生活的改良，這樣在他心中養成了一種佔有的慾望，和私產的愛慕。

這個事例，把蘇俄的革命心理，說明得較許多理論的書還要清楚。同時也明顯的告訴了你它對人類的價值。一個爲別人所嫉妬，所稱揚的人，一個爲許多別的青年所要模仿的人，在蘇俄革命者的眼裏，祇是一個有傷道德，值得詛咒的人。他們將用所有的力量來摧殘他，因爲他是一個私產制度的

崇拜者。

私產制度是一切制度中布雪維克最反對的一個。共產黨宣言說：『共產主義可以縮簡爲一句話：就是打倒私產制度。』這就是布雪維克的理想的核心，蘇俄革命的精義。他們惟一的目的，就是打倒這種制度，和在人們心中的私產意識。

他們所謂私產，係指生產方法而言。共產黨宣言說：『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人享受社會生產的權利。』那就是說，有幾種私產，個人仍可保留，例如個人的衣服，家庭，花園，和一片小小的田地等。他也可在地窖中藏些冬糧，——但祇能爲自己吃，不能賣錢。他們所要打倒的，就是那種能生利和積蓄的私產。共產宣言又說：『中產階級也必須打倒。』這就不祇是生產方法了。這個將包括分配的方法——售賣人，零售及批發商，以及與他們有關係的人。最理想的情形，須到『個人的財產，已不能再變成資產階級的資產和資本的時候。』布雪維克主義者所謂的「私產」就是這種意義，而本書中所謂的「私產」也就是這種意義。

蘇俄的革命者以爲這種私產制度，就是人類最大的不幸。一切戰爭，貧窮，賣淫，罪惡，慈善；一切貪

戀，凶惡，仇恨，不幸；一切種族間及國際間的衝突，都來自這個有毒的泉源，——私產制度。

世上雖然有許多派經濟及哲學者，仍在贊美着私產制度；雖然許多宗教團體仍在倡財產神聖之說；雖然人類的大多數仍在相信私產的佔有，是人格及事業的勵進者；但他們仍不能說出私產制度在現在這樣科學發達的時代，有什麼了不得的優點。蘇俄覺得它是世界上一個惡魔，無地不在下，紊亂及荒涼的種子，破壞人類的道德及幸福。不像一般社會改良家，政治哲學家，或宗教預言家一樣，他們不願很麻煩的來諷刺它，或教訓它。他們不願和它妥協。他們要打倒它，詛咒它，使它每一個回憶，都成爲一種罪惡。他們希望很容易的不必犧牲生命便將它打倒；但必要時他們也願意犧牲生命及一切。

攻擊私產制度，也不是什麼新鮮的事。自古就有許多思想家，帝皇，及預言者很恐懼，很悲觀的看出了它的罪惡。幾個大的宗教，對於拜金蓄財，也往往是攻擊不遺餘力的。釋迦及其信徒因爲反對蓄財，所以隻身到外面去飄泊，隨身祇帶一個乞食的鉢，剃刀，針，和一個水瓶。摩西對於財產也有許多名言。他說：『土地是不能永遠賣給你的，因爲他是我的；因爲你祇是一個客人，暫時留下和我住在一起。』



又說：『在七年之終，你一定要放棄你的債權。每個放債的人，那時不能因債務向他的隣居或兄弟要錢。』

關於私產，沒有人像希伯來預言者那樣說得深刻的：『人們爲了銀子，出賣正理的人；爲了一隻鞋子，出賣窮人。』耶穌基督也曾詛咒過蓄財的人。

我們在早期的基督教徒的言論中，可以找出許多與列寧或馬克斯祇是修詞上不同的論調。安勃盧斯 (Ambrose) 說：『私產並不是一種權利。世界根本是上帝的，我們都是他的子孫。異端者拿世界當他們的財產，真是侮藐了上帝。』任龍 (st. Jerome) 說的更爲激烈：『財產往往是一種偷盜的結果，不是他，就是他祖先曾犯過這種罪惡。』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 所說的幾乎就是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論：『那些有過多的財產的人，都是佔有了別人的東西。』

在佛教、猶太，及基督三教的影響之下，發生了許多廢棄財產，過着共產生活的宗教團體。如佛教的和尚，猶太的依生教徒 (Essenes) 基督教的廟院派，及其他許多支派，如在西加拿大的度柯本教 (Doukhoros 意謂精神的奮鬥者)，現在仍在和私產制度奮鬥，好像它是什麼了不得的罪惡一

般。

但是布雪維克主義者與他以前的許多反對私產制度者——包括十九世紀許多社會改良家——之間，有着一個天大的分別。那些宗教預言者，如釋迦及摩西，并不主張完全取消私產。無論如何，他們的理論總是不澈底的。因此才有度柯本教廢棄私產，而羅馬天主教擁護私產的現像。他們那種廢棄財產，實行共產的試驗，是出於自願，限於一地的。他們的動機是在壓制肉體的享樂，以取悅於神。物質的進步，無論是個人的或社會的，都為他們所輕視。這種共產主義是一種個人的理想，而不是一種社會政策；是一個烏託邦，而不是現實。

蘇俄的革命者便不是這樣了。他們不說那種不澈底的話。他們發誓要打倒私產制度，并且立刻就去實行；他們的目標不僅限於一時一地，並想永久普遍的消滅它。這就是世界革命的意義。列寧說：『整個的社會，將變成一個機關和一個工廠。』蘇俄并不容許個人自由的取捨；他們絕不給你選擇的機會，你一定要服從，否則便被打倒。假設你起來反抗，他們將毫不憐憫的，像對一個小蟲一樣的來對付你。他們不管什麼是上帝的意志；上帝在他們的世界中是沒有地位的。爲了精神的超脫而廢棄

肉體的事，他們也是認爲絕對荒謬的。他覺得肉體是一個有生命的現實。並不是一個什麼飄浮腐蝕的幻影。他們主張物質生活的進步，而不主張去阻礙它。他們的口號，不是廢棄物質享樂，而是物質享樂的平等，在目的，範圍，及方法上，布雪維克主義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空前的。這也就是它會變成這樣一個狂瀾的勢力的原因。

馬克斯曾經提醒過他的信徒，說，像俄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有着這樣多不識字的人，恐怕不能造成一個沒有私產的社會——一個共產的社會。但是列寧在發現世界無產階級對於世界革命的宣傳，沒有什麼反應之後，就給了馬克斯主義一個新的轉變（至少斯丹林（Stalin）及其信徒是這樣講）。他說，雖然像俄國這樣一個落後的國家，也同樣可以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列寧主義是成功了，現在蘇俄就在單獨建設一個新社會的假定之下前進，雖然是慢慢地，並且永遠免不掉有困難。爲容易達到新社會的理想，布雪維克主義者實行了「NEP」——新經濟政策——那是對私產制度的一種讓步；使它仍成爲一種權利，但已失去像以前的那些社會勢力及政治勢力。那是一個權宜的讓步，雖然它存在的久暫，布雪維克主義者也不敢說。但這并不能就說是

他們有放棄或減少剷除私產制度的決心的表示。在這一點上，希望沒有人會誤解。布雪維克主義者是不會改變他們的話的。他們最後的成功，是一切私產的消滅，這好像地球繞着太陽轉一樣，是不可避免的事。

這個最後的目標，馬克斯及安格爾在共產黨宣言中雖然已經說出，但在一九二八年夏莫斯科舉行的第六屆第三國際大會的議決中，更有劇烈的表現。

在「世界共產」一章中，他們在讀者的眼前展開了一幅共產社會的寫真。他們告訴我們，無政府狀態是不見了，弱肉強食的現象也消滅了。經濟生活完全根據需要，全盤的計劃。生產過剩的危機及人類許多痛苦，都可以免去。發展國外市場及勢力範圍成爲不必要的事，戰爭的主要原因，也因此消滅。勞動不再是一種工具，而成爲一種基本的需要。沒有藏垢納污的城市；沒有勞心勞力的分別；也沒有兩性間的不平。國家本身是一個階級的統治機關，此時也已不見，一切壓制都可以免去。人類已完全解放。把持教育的現象也已打破，教育成爲人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沒有民族的分界，也沒有國界。神祕主義死了，宗教滅亡了；一切武斷和迷信都消滅了。一個完全新的時代，和一個完全新的人，於是

出現。

這就是蘇俄共產主義者所希望的最後的理想。但他們覺得要達到這種理想，非消滅私產不可。現在他們雖然不得不讓它存在，但他們決定慢慢的使它消瘦。他們用社會、經濟、及政治的力量來限制它；無論什麼時候覺得必要，就可以把它致死。

他們那種經濟的限制，已經夠使私產制度屈服了。我們只消看一看納稅的情形。有許多稅，如執照稅，出廠稅等，集產事業不見得較私人少納多少。不過他們有許多其他的優待辦法，使他們的担負大為減輕。他們的所得稅約為百分之十，他們也須納所得過量稅，但他們在房租上往往有折扣。他們可以向國家銀行透支資本。他們又可以從國家機關先得到原料的分配。假設一個私商也能得到這些利益，他將認他自己為命運的驕子了！

所得稅一項，已經可以去了他收入的一大部份——常常會使他恐懼的說不出話來。我不願在這裏寫下許多蘇俄對私人營業徵稅的複雜的表格，讀者只知道他的結果，就可以明了它的大概了。在最初一千盧布內，所得稅並不高，祇有百分之三，但是以後逐漸增加，直到一萬盧布，所得稅是四分

之一；如到二萬四千盧布，所得稅是三分之一；如超過二萬四千盧布，所得稅是百分之五十四。這還僅是國家所收，此外地方政府還要抽約當國稅四分之一的所得稅。

他付了所得稅還不算，還要付那繁重的所得過量稅——那種複雜的公式，在這裏也不必列舉了。讀者祇要記住蘇俄各種事業應得的利率，是有法律的限制的。例如在伊凡奴伏慈納孫斯克，各種營業的法庭利率是：雜貨百分之十一，旅館百分之二五，酒店百分之二二，乾貨百分之十六。其他營業的利潤率也差不多是這樣。所有超過這種標準的收入，都叫過量利潤。假使過量利潤是一千盧布，納稅祇百分之六，但如果這一千盧布已佔全部利潤的百分之二十，則須納稅百分之十。過量利潤的數目愈增加，過量稅也愈重。到過量利潤達一萬盧布，並佔全利潤四分之一，過量稅是百分之四十；如果過量利潤超過全利潤的二分之一，則過量稅就是百分之五十了。但是這種過量利潤也是有限制的。他一定不得超過全利潤的百分之五十。不然，那個商人就要擔當投機的罪名——這是在蘇俄很重的一個罪名。許多人因為投機，財產全部或部分的被政府沒收，人被送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就這種納稅的不平等，私人營業已很難和國營事業競爭了。何況還有許多其他經濟的困難。第

一是他的居住問題。房租是因人而不同的。讓我們看一看莫斯科的辦法。普通每個人所應佔的面積是十六方碼。一個商人去租，每碼約在二十至四十盧布之間。如果他所租的房子面積超過十八方碼，每方碼他得多付較原價三倍以上的租金，即每一方碼須付六十至一百盧布。工人及政府人員如果要租超過十八方碼的住宅，也同樣要付三倍的租金，不過他們所付房金的原價，就較商人所付的小得多了。

他的子女如果要入學，也要付很高的學費——他的收入愈大，學費也愈高。如果他有一個兒子，已達入伍的年齡，但商人的兒子是不得入軍隊服務的，他就得給他納一筆軍役稅。國家銀行也不和他有信用的來往，而蘇俄所有銀行差不多都是國家銀行。百分之八十五的批發事業，是在政府手中，除非他是一個極精明，極狡猾的人，往往不像那些國營或合作的商店容易得到貨品。假使他稍有不遵法律之處，立刻就會受極重的懲罰——要看地方當局的氣餒如何，有時真是重極了。在許多地方，我曾親見商店因為夜間遲停閉五分鐘，即被罰交很重的罰金。有一次我在加站 (Kazan) 一個小城中餓着跑了好幾個鐘點，沒有一個商人敢賣一片麵包給我。那是午後的五點鐘，就是本地商店停閉

的時間；尤其是因爲不多幾天前有一個商店在停閉時間賣給一個旅客幾個雞蛋，便被罰了二十五個盧布，他們誰都不願再冒這個險了。又有一次，在一個農村裏，我看見一個巡警要處罰一個女商人，因爲她的顧主把許多葵瓜子的皮，擲滿了他舖子的一地。他處罰她的理由是，她沒有把房屋弄得像法律所要求的那樣清潔。可是那天，我又到那個農村裏的合作社去，看見一羣農民正在吃着葵瓜子（這是他們的習慣），瓜子皮吐了一地，同我在一起的那個當地蘇維埃的主席，和到那裏去視察的監察員並沒有對合作社的經理或那羣農民說一句責難的話。在許多地方一個小商人會感到法律對他是較對一般合作商人更加苛刻。

有了這樣的苛稅，房租，利潤的限制，法律不平的處罰，子女的學費，軍役免除稅等，一個小商人已經很難有什麼儲蓄了。祇有那最狡猾，最能幹的人，才能偷偷地積蓄一點錢。但這些他也祇能在他活的時候佔有，到他一旦死去，政府立刻加以很重的遺產稅，把他一生血汗所積的一點微產，打個粉碎。祇有衣服，傢俱，及其他個人日用的東西而不屬於奢侈品的，如一個表，一架鋼琴，一打金屬的食具，及價值不超過一百盧布的藝術品——死者的作品，或不出賣者，不在此例——才可以免稅。所有其他



的私產祇要在一千盧布以上的，都須納很重的遺產稅。財產價值愈高，稅也愈重。二千盧布的遺產，遺產稅是百分之一，但到一萬盧布便是百分之五十，而一萬盧布以上便是百分之九十了。

一個商人無論到什麼地方去，總會遇見政府的干涉和剝削。它要使他永遠那樣貧弱，不然怕對它會有危險。萊可夫（Рыков）蘇俄的內閣總理，不是有一次說麼？蘇俄的商人像一頭羊，祇要在他身上有一根毛，政府就要來給它剪去。布加林不是也曾拿蘇俄的商人比作產奶的牛麼？他說，我們可以毫不憐憫的擠它的奶，祇要不妨害它產奶的能力就行。

私產者在政治權利方面，還要受到許多剝削。一個商人是沒有參政的權利的，這在蘇俄是一種很大的不幸。這不但使他在政治方面沒有說話的權利，並且使他的地位變成一個在法律上沒有權利的人。他子女一定要等學校中有餘額，並且要付很高的學費，才能入學。『你爲什麼不送你的女孩上學？』我有一次問一個小城市裏的旅店主人。他回答我道：『因爲他們要我二百盧布學費，我怎麼付得起呢？』他那十四歲的女孩子便在一旁恐嚇他道：『如果你明年再不能送我上學，我就要從家裏跑出去，永遠不認你做父親了。』那父親一句話都答不出。他兩眼望着他的女兒，老淚盈眶。當她離

開他時，他湊近我輕輕道：『她一定會這樣做的。』

有一次我到一家一個老人和他十八歲的兒子共同開的茶館內。那個孩子是一個書獃子，因此我問他爲什麼不進大學。他告訴我，他曾經努力過一番，祇因他父親從前是一個富人，現在雖然窮了，仍舊沒有一切公民的權利，所以總是進不了大學。他祇有離開他父親，改一個名姓，才有辦法。他許多朋友都曾這樣作過。可是他不能願這樣做，因爲他父親已經老了，并且還是一個人。他寧願犧牲這一生，也不能捨開他的父親。

又有一次，一個女作家對我說：『我的兒子剛進中學。他是一個有野心的少年。他已經常在那裏談起大學和他將來的計劃了。他不知道，我因爲同革命界沒有什麼聯絡，至今沒有公民權，恐怕也沒有大學肯讓他去讀書。我沒有勇氣告訴他這些。當他知道他將來的命運時，他就得下一個絕大的決心。他不是和我脫離關係，便得和大學和他的事業永遠告別。』

對於資產階級兒女的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一般革命者的解釋是，因爲現在技術人員，教師，或工程師，是他們所最尊重的，所以所有的學額，須儘先讓他們的子女填補，其他對於新社會的信仰還有

懷疑的人，祇好放在後面一點。這是一個很有力的解釋，可是并不能使做父母的痛苦，及做子女的不幸，略爲減少。

最厲害的是蘇俄社會對於一般商人的歧視。即便是中古時代的教會，也從未像蘇俄革命者那樣藐視過商人。他們不再對從事商業的人用「商人」或「工業家」那樣的字了。他們叫他「耐潑曼」(Nepman) 意即在新經濟政策下求生活的人。——沒有到過蘇俄的人，決難想象這是一個怎樣卑鄙的名稱；「耐潑曼」——下賤的標誌，社會詛咒的目標！一個下賤的人，社會的豬狗！是舞台上的流氓，是電影中的無賴，也是日常生活中的棍徒！「耐潑曼」是一切罪惡之源！有一次，一個從前的富翁的女兒對我說：『我寧願做強盜，也不願做「耐潑曼」，因為做強盜最多也不過是槍斃了，比做一個「耐潑曼」永久受人的侮辱還好的多呢！』

我們看見許多蘇俄以前在商業界很有名望的人，放棄他們的商業，並不覺得驚異。他們逃避它，好像逃避死的陷阱一樣。他們不得不加入國營事業中去工作。他們平庸的生活着：住着一間小房子，拿着有限的薪金。但是他們有送他們子女去上學的特權，無論那個最好的學校，他們都可以送去；尤

其要緊的是，在社會上可以保持他們的自尊。他沒有被人誣為投機或犯法的危險。他們心裏可以不  
必時時憂慮進貨，透支，報告，監察等私營事業的困難。他們寧願生活得苦一點，而保持着他們的自尊；  
不願爲了幾個錢，任人踐踏。

在農村以外，私產制度有日趨沒落之勢。它不能和政府及合作運動的兩種大的勢力去抗爭。合  
作運動像一個巨人，它所到之處，無論什麼都能被它吞下去。將來也許有一天，它會因爲吞得太多，而  
不能消化。它的仇人就希望它有這樣的一天。但是現在，它仍很安穩的在向前進。差不多有百分之八  
十五以上的工業和批發事業，及較少的販賣事業，都在集產的組織之下。外國人辦的事業雖然不致  
受到社會的種種虐待，然而無論它是和蘇俄政府合辦的，或每年付以一定的年金，過了一定的年限，  
就自動的變爲蘇俄政府的產業了。當然，蘇俄當局覺得這樣非但國外投資者仍能收回成本，並且仍  
舊可以得到很厚的利潤。他們不令外國人永久或長時期的投資，除非有意外的變故，使他們改變他  
們現在的政策。

我并不是在這裏作蘇俄私營事業及國營事業的比較。那樣一個題目，本身就是一本書。在最近

的一百年中，這樣的書，恐怕會出版不祇一百本吧！現在俄國人自認他們集產事業的經濟，無論在生產或分配方面，都不是私營事業所能比較的。在這裏我祇願寫下他們反對私產制度的動機，方法，範圍，及其在國際上的意義。這些對於美國一定特別有興趣，因為那裏是私營事業成功最大的地方。

蘇俄的集產事業，如想獲得成功，一定要在經濟方面能勝過歐洲及美國的個人主義工業。俄國人自己也很明白這一點。脫洛茨基（Trotsky）說——在這一點上，其他革命者的意見與他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很知道歷史上的基本定則，凡是能在經濟方面更高的供養社會的制度，勝利一定是屬於它的。這個歷史的鬭爭，將決於——當然不是限於一時的——勞動生產效力的比較。』這是很明白的。脫洛茨基並且說：『勞動生產效力中應包括質的比較，不然祇成爲一種自欺的工具了。』換言之：蘇俄的集產主義，一定要在同樣的一個成本及能力的單位之下，能夠生產較多的物品，價格較低，質料較好。它一定得這樣，不然最後總有爲個人主義打倒的一天。

實在的，在那一切布雪維克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仇視和狂熱之下，私營事業及集產事業已經成爲一個事實上的競爭，一個純粹商業的問題。這是一個歷史的競爭，無論結果如何，總會使世界起一

個很大的變化。我說是一個競爭，事實上是一個戰爭；是一個自有基督教以來，從未發生過的最劇烈，同時也是最不明顯的戰爭。主觀的好惡，同情，願望，愛國心，雖然無人無時沒有，但是這與這個戰爭毫無關係。那是一個兩種像天氣一樣的客觀的力量間的戰爭，同時也是一個多方面的戰爭：在辦公室裏，在實驗室裏，在工廠裏，用腦子和筋力，用機器的力量和組合的能力，用煤，用鐵，用氣油——一切都和戰爭一樣，除去雙方都是在建設中，而不是在破壞中決勝。宣傳祇是一種工具，但不是一種重要的工具；雖然世界上的人都習慣的要說它是最主要的。但事實根本不是這樣。他好像一個雌蜂的嗡嗡的聲音，可以使你害怕，使你討厭，但是實際於你沒有什麼傷害。

在表面上看來，這種戰爭似乎是可笑的。蘇俄拿什麼來和世界經濟勢力的巨人，如德國克樂浦實業公司 (Krupp Industries) 福特汽車公司，世界汽車公司 (General Motors) 聯邦鋼鐵公司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國際農業公司 (International Harvester) 世界電氣公司 (General Electricity) 等去抗爭呢？蘇俄拿什麼去和那些有組織的分配機關，如西魯拔公司 (Sears-Roebuck Company) 孟哥穆萊華德公司 (Montgomery-ward company) 五

分錢及十分錢商店等去競爭呢？蘇俄在那一點上可以和美國商人的守時，可靠，簡速，和客氣相比呢？什麼都還沒有完成，祇是一片原料豐富的荒地，有很少幾個烟鹵點綴着；它的田野的恬靜，還從未爲機器的聲音所打破，它所有的財產，祇是一個胆大的機器化的理想。在過去的戰爭期間，有些地方曾經請了資產階級的幾個有名的工程師和經濟學家，去小規模的試驗過。這種理想的實質，並不是說集產事業可以產生更好的工程師，管理人員或工人來，而是說在集產制的統一計劃之下，可以節省許多私營事業的浪費。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像密凱爾（Wesley mitchell）所說的：『在細處說，私營事業是有計劃和方針的，但是從大處說，即沒有計劃，也沒有一定發展的方針。』個人經營的事業，像福特汽車公司，已經可以說沒有浪費了，然而從全國的經濟生活上看來，因爲經濟活動缺乏合作，仍舊可以找出許多能力，原料，及自然財富的浪費。威斯（Stuart chase）在他的「浪費的悲劇」一書中提醒我們說，美國因經濟活動缺乏整個的計劃，浪費的價值約當全美人力的百分之五十。福萊旦（David Friday）在討論同樣的題目時也說：

『我們在大戰期間，因爲充分的利用了我們的天然財富，工廠，機械，和人工，所以出產增加到百

分之二五至三十。假使我們讓出產事業回到戰前的水平線上去，出產立刻就會減少百分之二十。用現在的價格來比較，就是說要浪費同量的生產力，同時，國家每年要減少一百四十萬萬金元的收入。』胡佛 (Hoover) 總算是一個爲私產制度預言的辯護者了，但他也不得不承認在大戰期間，因爲國家對於全國經濟活動有統一的計劃，所以雖然『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力，已經加入軍隊，但我們還生產了比現在多百分之二十的貨品。』現在的問題是：蘇俄的集產主義，剷除了一切私產的鼓勵，和已有的生活及工作的習慣，根本是否有一種力量，使它達到所預想的結果。俄國人對他們自己最後的勝利，好像一個農人看他地下的種子的成熟一樣的信心。他們從歷史上，從自然的原質上，都可以看出他們將來的勝利。他們相信能夠成功，因爲他們那種機械化的理想的優越。

假使他們成功了，集產主義將在不同的方式之下，掃遍這個的世界，同時私產制度也就消滅了。不管阻礙有多大，犧牲有多大，機械化的理想，終有實現的一天。這是一個歷史上的定則，和其他任何的自然法則是一樣不可避免的。假使他們失敗了，那私產制度，無論形式上有多大的改變，將仍繼續存在，也許在蘇俄還會盛行起來呢！



## 五 男子的生活

男子是怎樣生活的呢？

物質報酬是不是男子做事業的重要動機？如果是的，爲什麼他們要加入軍隊呢？爲什麼他們都希望做一個上尉，上校，和將軍呢？爲什麼會有福克（Foch）興登堡，格蘭脫（Grand）惠林吞等人呢？爲什麼有人入政府機關作事？爲什麼有人做教師和教士呢？這些職業的物質報酬既不能供奢侈的揮霍，更不能有什麼積蓄。

爲什麼有人入政界做事呢？政治雖然往往是發財的捷徑，然而那種方法是違法的，并且在非封建的國家，還要受很大的懲罰的。我們只消看一看一般公務員的誠實的風氣，尤其是英德兩國，我們再看一看愛斯龜（Asquith）格萊（Grey）麥克唐諾及無數英國歷史上的英雄，這些人都是毫不想到物質的報酬，而爲祖國奮力的。再看一看羅斯福，惠爾孫，胡佛，許斯，不論你對他們的政策及政治理論怎樣想法，但你不能不承認他們對美國盡了他們最大的能力，而他們也并不念念於物質的報

酬的。

一個天才，需要金錢來引誘他成功嗎？爲什麼還有愛因斯坦（Einstein）？爲什麼會有林肯（Lincoln）？爲什麼會有培旁（Burbank）？爲什麼會有斯坦梅慈（Steinmetz）？爲什麼會有派司脫（Pasteur）？一個家奴的子孫？爲什麼會有斯賓諾塞（Spinoza）？一個爲人磨鏡片爲生的匠人？爲什麼還會有路德（Luther）、加利流（Galileo）等人，在過去的回憶中，像黑夜的明星那樣閃耀着，祇知追求真和美，而不顧一切窮困，訕笑，和死的恐嚇呢？

爲什麼有人到兩極去探險？爲什麼有人因爲登亞菲爾斯山（M. Everest）而傷身呢？他們爲什麼明知會戰死在沙場上而仍去加入軍隊呢？

祇有當我們回到商業的世界時，才能覺得物質的報酬與成功，是像水聲和瀑布一樣的不能分開的。在商業中，物質的報酬是一種推動力。美國假使沒有個人發財的機會，也許經濟的發展，也就不會這樣登峯造極。這是無可掩飾的事實：它因爲有一種個人機會的吸引，才能達到人類歷史上從未達到的經濟的成功。

對於一個商人，金錢就是一種鼓勵。它是一切權力，進步，成功，優越的標記。那也是一種創造，正像一幅畫對一個畫家，鉛字對一個作家一樣。他爲了金錢的鼓勵，才去冒險，奮鬥。追求着世界最多的金錢，他建設起大的機器，工廠，鐵路，城市——無處再比美國繁榮的了。這是毫不足奇異的，當一個美國商人到蘇俄去看見那些在蘇維埃的託辣斯鐵路，及工業中工作的人員，每日祇拿一個美國的汽車夫都看不上眼的工資，他會聳肩抬頭，武斷的說，集產事業，已將整個的失敗了。紡織業的蘇維埃主席說：『每次有美國人來訪我，無論他是一個大銀行家或是記者，他第一個問題，總是問我：我們爲什麼要這樣工作；我們這樣工作，爲的是什麼呢？』

真的，他們爲的是什麼呢？

當然不是爲金錢，因爲在那裏就沒有儲蓄錢的機會。沒有人——除非是暫留在蘇俄的外國人——會想到要積蓄一注巨款，假使他希望沒有麻煩的生活。同時在蘇俄，亦得不到任何一種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可以拿金錢換來的快樂。是爲權力麼？沒有再比有錢的人權力小的人了。他在政治方面，根本沒有他的存在。在社會方面，他是一個流氓。他說的話沒有人聽，他的勢力也沒有人理會。

他甚至於和人交接，都難免時時要挨罵。是爲地位麼？世界上沒有一種罪人是比俄國的富人再怕見人的了。是爲成功麼？這倒不見得不可能；不過困難太多，成功的機會太少了。是自尊麼？一個人時時被人豬狗一樣的踐踏，還能保持什麼自尊？是爲奢侈麼？這是范勃蘭（Thorstein Veblen）所說的資產社會的成功之徵。但是在蘇俄，沒有再比「擺闊」更危險的事了。是爲安全麼？這也不見得，因爲一個富人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觸犯了一條新法律，或者一條舊法律的新判例，立刻可以弄得家破人亡。沒收財產是蘇俄法度對資財者最普通的處罰。

不是爲權力；不是爲自尊；成功的機會很少；安全也不可能。一個以積蓄私財爲目的人，早晚會使他失望的。

然而蘇俄人民究竟爲什麼而生活的呢？

物質的利益，當然沒有完全消滅。『按照一個人的需要給他報酬。』這個共產社會的最後的理想，恐怕還是極遠的將來的事。現在的口號是：『按照一個人的能力，給他報酬。』這就是爲什麼蘇俄工業中，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作，是按件付工資的。工資的升降也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樣，不

過數目略小而已。技術工人與普通工人所賺的工資不等，此地的工人與另一地的工人所賺的工資也不等。每種事業中都有一定加薪的辦法，對於工作特別勤勉，或用材料特別經濟的工人，都有額外的報酬。開火車的工人，如果能在同樣的里程內少用些燃料，就可以得到一筆獎金。開汽車的工人，也是如此。有時這種獎金是一筆現款，有時是一個到國內或國外去的旅行。現在蘇俄所有工業的百分之二五的利潤，已作為這種獎金之用了。

經理，董事，發明者，以及一切領袖人物，所得的工資較普通工人——無論其技術如何——所得者為多。所以物質的動機可以說並沒有完全消滅。不過收入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在紡織業中，最高的行政人員在一九二八年，每月可以有七百盧布的薪金，約合三百五十金元。很少再有別的工業薪金較這個數目再高的了。祇有由蘇俄政府請來的外國專家，才能得到像在他們本國中最高的薪金。

蘇俄革命非但反對儲蓄，並且覺得在集產的社會中，這并不必要。儲蓄的本意，無非是為防意外。那是一個安全的基礎，是要達到一種目的的一個手段；然而人們現在已把它本身變成一個目的了。在一個集產的社會中，個人用不着再為他個人的安全擔心。社會可以給他職業，給他向上的機會，給

他一切失業，疾病，老年，意外的保障。它可以給兒童們教育的機會，使他們在社會中有相當的地位。個人可以不必再爲他個人及家族的安全而顧慮。他也不致於缺乏衣，食，住，及娛樂，正像不會缺乏水和空氣一樣。

這些保障目下在蘇俄雖尙未能十分穩固，——即使是無產者，也須是因爲工作而殘廢的，每月才能領到與其工資相等的津貼。這種保障之不足，蘇俄希望在新社會經濟繁榮後，可以逐漸補救。現在爲討論的便利起見，我們不防就承認蘇俄正在建設中的集產社會，將來能夠保障個人一切的安全。

但是讀者一定要問，許多心理學家告訴我們的人類內心的，像食慾，性慾，一樣的佔有慾，怎麼樣呢？俄國人反對這是一個實現集產主義的阻礙。在許多俄國大學及中學教科書中，佔有慾都被解釋爲『一種習慣，而不是一種內心的傾向……：……因爲它有時不存在；有時僅在野蠻的民族中有之。』因爲它祇是一種習慣，所以它不一定要用在資產社會中的方式來表現。他們以爲一個人的佔有慾，可以從個人方面，轉到社會方面去，祇要他知道這事是與他有益的。這種佔有慾並且還可

以從物質方面轉到完全精神及情感方面去——如讀書，聽講演，觀劇，看電影，聽音樂會，及參加運動會和一切新社會所能供給的娛樂。他們很明顯的反對，一個人的佔有慾是像食色一樣難以克制的。

蘇俄所利用的心理的動機，在現在生活中是一個新的方向。第一，當然是升轉及許多與之俱來的精神上的滿足——資望，責任，權力。各種事業間有競爭；各個人間也有名譽上的競爭。國家設計委員會每年都有一定的計劃，各種事業都把它做爲一個目標。又常有許多建設的紀念禮——大隊的游行，旗幟，歌唱。在一個新工廠，新橋，或一個新開的自流井的開幕時，都有熱鬧的市民大會。又有『工作的英雄』（一種榮稱）及紅旗的頒給，尤其是後者，能給受者無上的光榮，同時還有許多特權。他的名字會刊在報紙上及政府的公報上，並且往往被指出給參觀的人看。我會到過一個工廠，他們最先就把『工作的英雄』介紹給我，無限的驕傲，無限的尊敬。他們是社會的精華。他們住着最好的房子，他們的子女有求學的機會，他們有快樂的假期——一切所有的一切。在自私方面講，這些榮譽就是蘇俄最高的報酬了。

同時，蘇俄又多麼深刻的在人們心中，養成一種公有的觀念！有一次一個打包工廠的經理這樣

說：『最使我們高興的，就是看着我們自己的進步。無論什麼時候，我們新添一架機器——不一定在這個工廠裏，在別處也一樣——或新填一個工廠的基石，或新掘一條河，我會高興的發抖，因為我知道那不是爲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而是爲大衆，爲我，同時也是爲別人的。』這就是革命者希望每個工人所想的。他一切都是公有的，例如：『我們的工廠，』『我們的鋪子，』『我們的合作社，』『我們的俱樂部，』——我們的一切。他們同時也永遠記得：事業愈發達，他們物質上及其他的報酬也愈豐富。

蘇俄還想把社會服務的觀念，也變成經濟生活的動機之一種。這是一個新的觀念；我說它新，因為它在蘇俄的意義，和在別處的不同。它并不包含利他的思想；也沒有犧牲的精神在內。一個青年革命家這樣寫道：『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需要『犧牲，』但不是『犧牲的心理』……：犧牲應該有一個客觀的性質……：』脫洛茨基，當他還是羣衆的英雄時，他說：『用一種很高的理想來掩飾工人的革命，這簡直是侮辱它……：社會主義的革命，用不着什麼清高的理想來裝點它……：這樣一個破天荒的革命，需要什麼浪漫的點綴麼？』粗暴的口吻，但是充滿了蘇俄革命者特



有的尖銳和決斷。他不願把情感作用雜入社會服務的觀念中去。據他看來，它不是一種娛樂，而是義務；不是一種躲避，而是一種實現，不是爲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它不贊成託爾斯泰（Tolstoy）在『復活』中所表現的那種人道思想。他願意在社會服務的觀念中有一種鬪爭的思想，像一個運動家在預備競賽中所感到的一樣。當然，這些都還是些像俄國人所說的「原則」。但是這種原則，不久便能變成一種基本的動力，變成人性的一部份。

按照范勃萊（Veblen）的說法，人類的領袖，獵求，誇張，虛榮等本能，都是與工業文化俱來的；但蘇俄革命者不能了解這些。他們也承認人類有自私的本能，但他們不願過分的養成它們。所以在蘇俄，領袖至少是一件有危險性的事。沒有一個營業是以與它有關係的人名做名稱的。假設有的話，那一定是一個革命的英雄。像福特汽車公司，屋爾活百貨店（Woolworth Store）…等以主人的名字來作名稱的事業，可謂絕無僅有。一個經理的權力，無論他地位多高，也有許多限制。他往往須受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指揮。在他之上，也許有一個委員會，或一個董事會；他下面的工人，也可以隨時開會批評他的行爲，或到他上面的委員會中去控訴。他時時要受到限制，受到指揮。

這些心理的及物質的動機，對於蘇俄社會的影響怎樣呢？那些生在革命前的人，對於這些動機的反應，當然很小。舊的智識階級——工程師、經理、建築家——并不能為它們所動。他們所賺的錢有限，與普通工人沒有什麼顯著的分別；不能投資；還要諂媚羣衆；個人的權力又受限制——這一切都使他們不快。他們對於新社會每個工人所應有的公有及社會服務的觀念，都吸收得很少。然而他們亦為國家民族的觀念而驕傲——大家都是爲了俄羅斯——他們永遠愛的俄羅斯。因為經濟生活有統一的計劃，使他們大規模的計劃，有實現的機會，這多少也給他們一點安慰。他們幫着設計，看他們實現。他們是創造的人，創造的本能在他們的心中燃燒。但是——「我們沒有將來的——你明白麼？」有一次一個著名的建築師對我感嘆的說：他的意思是指個人的將來——他當然不會有什麼「將來」的；一個舊時代的智識階級，無論他怎樣好，也總是一個「門外的人」罷了。

即使是一般生在舊時代的無產者，也不見得對這些新的動機，有什麼格外熱烈的反應。不然，也不致於有全國普遍的喝酒、偷懶、對原料及機件不小心、偷盜等現象了。無產者往往高談他們的工廠，他們的工業，他們的合作社；但是實際行爲時，這些便都像是屬於他舊日的地主或資本家的了。在紡

織工業中，爲防偷盜，對工人常加搜查。別種工業也是這樣。我有一次在伊凡奴茲納孫斯克的一個工人食堂中用膳。每個食客進門時須領一個銅牌，拿這個銅牌才能換到食具。當他食畢將食具如數繳還，就可以要回那個銅牌，還給守門的人，隨後出門，否則他便要受搜查，看他有沒有在胸前或鞋統裏偷藏了一把刀或一把叉子……雖然有新的動機和新的希望，但是舊的習慣也總是很難泯滅的……

可是新的動機，本來也不是專爲那些生長在舊思想，舊習慣中的人——無論他是智識階級或無產者——而設的。那些青年人，那些對於舊時代的事，大都懂得之於傳聞的人，才是它們所要戰勝的。這些青年人從小就受着「私產是最大的犯罪」的思想的熏陶。我從未遇見一個大學生，自己說將來要創一種私人的事業的。蘇俄的大學生，除去少數例外，大都以服務新社會爲目標。他也不見得完全忘記物質的報酬，也不見得完全沒有安適及榮譽的要求。他也想向上，想得經理，董事，管理等較高的地位，但他不想宮殿似的住宅，不想私有的別墅，不想私有的遊艇及其他一切在資產社會中成功後可以得到的物質的享樂。他想得較高的工資，但不想得利潤。財產對於人是最罪惡的東西，是一

種失敗，不是一個成功。『一個人，假使佔有了全世界，但他已失去了他的靈魂，這於他有什麼益處呢？』在蘇俄對一個想發財的人，沒有別的話比這一句說的更恰當的了。財產非但是一種沾染，並且是一種病，一種罪惡——於人最有利的東西。

在歷史上這是第一次有這樣別緻的事發生——一代的人完全在忘去個人的佔有，個人的私財的思想中教育着。這樣一個境界，雖然動人心目，激人情思，但最後的問題是：人類的生活在這種狀態之下，經過一個很長的時期，會不會有什麼損失？人類假使想在身體、精神及靈魂方面，求得更高的命運，一定還要有天才和創造。一個蘇俄的革命青年長成之後，他的創造的精神和能力，是不是能和一個生長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青年相較呢？在像文學、藝術、音樂、科學等事業中——這些事業大都是需要個人的天才和創造，根本不能集產化的——不管物質報酬如何，一種創造慾就會使人前進。一個天才的成功，從來沒有聽說會被物質的條件或社會的冷淡所限的。

但是在物質生活的發達上講，物質的引誘，的確具有一種燃燒心靈的火力，使人類會達到最高的成就——便是蘇俄的革命者也是不勝妬羨的。那一個國家能比蘇俄更崇拜「福特」——不是崇拜

福特而是崇拜福特，那樣的事業家，創造者，和神異的人！在現在蘇俄的情狀之下，福特也像沙皇一樣的難以再現了。在一個私人經濟生活處處要受干涉的社會中，要想在實業或財政界出一個偉人，那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

蘇俄是不是能夠使他的人民一樣有創造性，有建設性，像資本主義社會把世界上所有可能的物質享受都放在福特，屋爾活，魯孫滑（Rosenwald），樂基翻樂（Rockefeller）等人腳下一樣呢？這就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個謎。共產主義者也許很容易的說，這個問題太無聊，正像資本主義者說他們愚蠢一樣。譏笑是不會證明出什麼結果來的。這個問題，現在已經超過了空言巧辯的時期；一切已成的試驗，也已超過了神話或理性的勸告的程度。『人爲什麼而生活。』這樣一個古舊的問題，從時間的開始，就弄得許多哲人先知，痛苦莫測，現在蘇俄要給它一個新的答案——這個答案會使全世界的人都感到震動，然而在這裏，也許可以找到一點我們從未找到過的真實性。現在這個答案還在雲影閃掩之中。要像在美人的臉上，白天一樣的看清那些黑點來，也許是幾代，或幾世紀以後的事。等到這個秘幕完全揭開之後，我們那時對於人性的了解，也許較今日已深入許多了。

## 六 性生活及新性道德

接觸俄國人生活的底面，你會發覺他們在關於兩性生活的種種習慣中，沒有一點拘束和猜疑，也許會使你很驚異的。你去聽關於性的講演，無論是什麼題目，聽衆總是男女參半。有時爲了宣傳花柳病的危險，會教一個假裝以花柳病傳染給他的妻子的男子到台上來。證人，醫生，護士等對於性的機能，性的心理，性的衛生，技術，都會用極明顯的語句，詳細的解釋，而聽衆往往仍是男女都有的。你在火車上買一張臥票，就很難預測你的同伴是男是女。我第一次到蘇俄乘火車時，發現我的同伴是一個女子，我以爲一定是弄錯了，所以立刻去找車上的查票人，不想那查票人用很驚異的眼光看着我，帶着一種幾乎是憐憫的意味，說，那個女人既買了下面的那個舖位，就得讓她住在那間房裏。那天夜間，當他在過道上遇見我時，他停住問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告訴他從美國來，他忍笑問我『美國人怕見生的女人嗎？』

在俄國的男女，無論老少，無論已婚未婚，白天晚間都可以到私人的房裏或旅館裏去互相訪問。

俄國的女孩子到一個男朋友的旅舍裏去，好像到教室，圖書館，劇場，或其他公共的地方去一樣的隨便。她們永沒有想到那是不應當的，或是容易引起別人的猜疑和非難的。在許多大學裏，男女生同住一個宿舍，雖然不在同一個房間內，但他們整天以茶點，麵包，及臘腸互相款待，一同讀書，或者坐在一塊討論些人生及革命的問題。我到過很多大學及俱樂部裏的青年人的茶會，從沒有看見過一個類似監護人那樣的老者。現代的俄國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有這種制度的存在。然而從維爾羅吉士（Will Rogers）到過俄國以後，俄國去浴場的人亦都要穿一身浴衣，像美國人在浴場去要披一件皮衣一樣。在俄國，男女無論何時何地，都在一處，很隨便，不會有什麼不安。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男女性的解放，在俄國并不是今日才有的現象。俄國人從始就沒有像西方許多地方一樣把很重的枷鎖加在女子身上，覺得非這樣不能保持女性的道德。雖然有一時期，貴族的婦女曾被關閉在屋頂的小樓中，但是彼得大帝，這個爲俄國做了很多驚人的事業的人，把這個小樓的門打開，把婦女從那裏解放出來；從此她們就見了天日。當然俄國亦有她的『家教』（Domostroy）——一本關於男子在家庭怎樣行使他的威權的書。這本書裏有很多極野蠻的法則，是無

論什麼地方的婦女所沒有遭遇過的。它給了男子統治一個家庭的大權；他可以用他的鞭子來叫女人屈服。

這本『家教』雖然使男子做了『一家之主』，但是並沒有把社會上男女的分界，劃得很清；尤其在一般民衆——農民之間。

這種現象的最大理由，恐怕是由於騎士及清教二種思想，在俄國不像在西方那樣盛行。騎士的潮流，雖然到過俄國，但沒有激動她。騎士式的思想和習俗會由到俄國的外國人，或旅外的俄人傳入俄國，尤其是從法蘭西的文學中；在俄國男女的關係上，添了一種新的芬芳，同時也添了一種『生硬』。但是這種騎士潮流的影響，只限於上層階級，並且也還沒有成爲一種風尚。所以在俄國社會上，無論那種人，對於女人都不抱着一種神秘的觀念。

除掉少數禁慾主義的教士以外，清教思想亦從未成爲俄國宗教的一部份。它祇是從日耳曼來的教士那裏，傳來一點微弱的聲浪。所以清教徒那種以性爲恐懼及罪惡的觀念，也從未深入俄國人的心中。因而男子並不覺得有和女子在社會上絕對分界的必要。他們與女子的分立，無論在理論方



面或事實方面，都不如西方各國那樣厲害。尤其是俄國一般智識階級，在他們中間，男女的關係，永遠是很密切，很簡單的。

在農民之間，尤其是如此；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受到騎士及清教二種思想的影響。自古以來，俄國農民的家庭，就住在一間大草房裏，男女都睡在一個暖坑，或倉屋的乾草上。現在還有許多地方，年青人夏天到牧場上去放馬，往往就一羣一羣的睡在草地上，靠得很近，愛人們就互相擁抱着。當一、二八年我到古奔（Kuban）的哥薩克殖民地去，聽說那裏還行着一種舊俗，就是一個男子向一個女子求婚，須常常去睡在那個女子身旁。當然，那個女子仍能保持她的貞潔。類似此種的風俗，往往會使一個西方人驚愕。但是這些風俗自古以來即在農民間行着，由此我們也可看出俄國大部份的人——農民——對性的態度之坦白，是沒有含着騎士派或清教徒的奇異，神秘，恐懼，罪惡等心理的。我們回想帝俄時代兩性關係之自由，便知道革命在性道德方面，影響并不算大。祇是當我們拿盎格魯塞克森國家的觀念及標準來比較，便覺得有些新奇了。

新性道德的中心，就是個人思想及行動的自由。這立刻就把舊的道德觀念趕個乾淨。俄國人是

不再要那些舊禮教和舊觀念了。他們不覺得道德是神聖不可侵犯和永久不變的。列寧說：『我們不信一種永久的道德。』『道德應該幫助人類社會向上，減少資本家的剝削。』這就是俄國人爲什麼把性行爲的責任，完全放在男女個人身上的理由。法律也不干預性生活，除非是誘姦，或者用其他強力的方法。在蘇俄法律中沒有成年及禁止販賣婦女爲娼的規定。『心理現象』在法律中是沒有地位的。但是性道德並沒有變成一種迷信。他們並沒有把性的本身，看做一種值得崇拜，或是具有什麼不可了解的神祕的東西。他們祇覺得它爲人的生活中所必需，但是對於錯誤的行爲，亦應當懲罰。

宗教中許多禁令和禁慾的思想，也同樣的都被打倒了。列寧說：『由於一種人類社會以外的力量所產生的道德，對於我們是不存在的——這不過是一種欺騙。』俄國人不願有上帝來命令他，或恐嚇他，使他依照他的話去做。保羅一句有名的話，『我願人人都像我一樣。』那就是說，像他一樣獨身和寡情，是俄國人所激烈反對的。他們提出列寧一句與保羅的名言相反的話：『與共產主義俱來者，是生命的快樂及活力，這些只能從最完滿的愛的生活中得來。』

他們覺得逃避這樣一個人類迫切的要求，並不是好的方法。他們不同情於那種以性慾爲達到

傳播種族之目的的工具的思想。

有些較爲年老的黨員，對於兩性關係，固執成見，還以爲大部份人民的觀念，也是如此，但是事實并不這樣。一般青年人以爲自然間之有兩性，其目的也許是專爲傳播種族，但是人的行爲都依照自然嗎？他飲，食，衣，戀愛，都依照自然去做嗎？在自然中，沒有理想，也沒有昇華。在自然，即動物的世界中，沒有性愛，祇有純粹生理的滿足。但是人類的性愛，是一種偉大的情感，他們覺得徒然置之不問是無益的。像列甯有一次所說的，『在性的生活中，生理和靈感是合而爲一的』，兩者是一般的重要。

性對於人類不祇是一種生理的滿足，也不祇是傳播種族的工具，雖然它仍難免有這兩種功用。性是人類自我的最高的一部份，正像喫飯，喝茶，讀書，聽音樂，觀劇一樣，沒有什麼值得羞恥，恐慌，隱蔽，及憤恨的地方。他們要把兩性關係從法律，道德，宗教及社會的武斷中，解放出來。

他們爲確立男女在性的方面，有絕對的平等自由之觀念，用了最大的力量來奮鬥。有人說這樣能使社會的道德，日趨低落，他們覺得這是毫無意義的。他們說，假使女子有了性的自由，就會像男子一樣的胡鬧，我們也應當讓她們這樣做，因爲她們有這種權利。讓一性任意享樂，同給一個階級許多

特權，是一樣的荒謬。兩者都是侵略，不過一個是勞力的，一個是性的；而侵略，他們覺得是最大的罪惡，是絕對與時代精神背道而馳的。『我們先要對我們自己革命，』俄國最近一部小說『水門汀』（Cement）中杜莎（Dusha），當她丈夫要用他男子的威權來壓迫她的意志時，她這樣說：『世上再沒有比我們的習慣更有力，生命更長的東西了。』她對她垂頭喪氣的丈夫這樣警告。他雖然是一個共產黨員，但對於一個女子對男子的新態度，還不能了解。她接着提醒他說：『嫉妬在你的心裏作祟，那是比暴虐更壞！』那尤其壞，如果是發於一種男性中心的思想。

現在俄國，女子在性的方面與男子享有同等的自由；舊的貞操觀念也像一堆積雪受着岩石的衝擊一樣的場瀉下去。貞潔，無論在理論或實際，道德或習俗方面，都已失去了他的意義和崇高。俄國人已經放棄了對於女子的強迫的貞操。他們覺得男子既然不受這種制裁，為什麼獨令女子屈服呢？他們願意讓這種性的行為，去受婦女們自己良心的判斷。有一次在火車上，我同一個德國科學家一同旅行。他對一羣圍繞着我們的青年發表他的意見，說蘇俄不願女性的貞操，是一種危險的學說，能夠使社會墮落。他強烈的反對，說女子是人類種族之母，所以應該較男子負較重的責任。那些青年人

都大聲反對，其中男性反對尤烈。他們覺得這個德國科學家的理論，同地主主義，皇政主義，及巫術一樣的古舊和野蠻。

俄國人也知道女子在生理上有許多較男子不利的地方。他們知道祇靠了他們自己的力量，不能把這些不利之點免去，但是祇要是現代科學所能做到的，他們願意儘量的幫助女子。現在生育節制和墮胎，法律都不禁止，不過他們并不鼓勵這些。他們是戰爭的憂心者，覺得四圍常有敵人伏着，等機會同他們開戰。他們不願意現在生育率減低，所以也不宣傳節制生育。但是節育的方法，無論誰都可得到；並且在幾個大城市裏，流行的很快，雖然黨政當局對此仍抱着憂慮的態度。他們覺得墮胎不過是一種必須的罪惡。他們雖然時時指出墮胎于健康的危險，但他們祇是勸女子不要找那些接生婆，而到較好的醫院裏去，那樣可以減少她們身體的危險至最少限度。

以在外面的世界所流行的道德觀念而論，蘇俄的新道德的確在歷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他們沒有不澈底的辦法；沒有逐步的嘗試；沒有漸進的改革。沒有像山額爾夫人 (Sanger) 所標榜那樣的節育的萬應藥；沒有像羅素夫人 (Mrs. Bertrand Russell) 所追求的那種半遮掩的自由，也

沒有那種徒費光陰的『伴侶婚姻』的運動。他們所有的是，男女的完全的自由；一切科學所能給予的福利，男女都同樣的可以享受，但以不危害個人的幸福，個人愛美的觀念及社會全體為限。

他們要每個人知道，社會及個人的幸福，都需要適當的自制。不規則的沉溺，能使人不康健。不康健非但能減少個人對於生活的享受——現實生活的享受，因為他們不承認現實以外還有什麼生活——并且還能使他對社會不能盡他最大的才能。此外還可以使一個人變得自私，對社會利益逐漸冷淡；社會意識，逐漸減輕，列寧說：『無產者不需要使人興奮和癡呆的麻醉，他不要性的享樂，也不要酒的沉迷。』兩者都是對個人及社會有害的東西。

個人并不需要完全抹殺性的美感。反之，俄國的革命者倒一天一天的在注重美術的價值。他們說，一個人性愛的情緒愈高尚，他就離禽獸的世界愈遠，對生命的享受也愈豐富。列寧曾說過，『一個普通的人，在普通情形之下，他願意在很多人喝過的酒杯裏喝酒嗎？』這句話的暗示是很清楚的。列寧雖然不願過于誇張美術的價值及享樂，但他事實上很贊許一種美的精細的性生活。他說，亂交能把性的行為變得像『在泥塘裏喝水』一樣的鄙俗和無味。

蘇俄尤其注重個人行為對於社會的影響。人民衛生委員長司馬西科 (Semashko) 曾說過：「孩子們，結合或分離全由你們，但是你們不要忘記了你們的孩子，假使你真忘了——好罷，我們會拉着你的耳朵到人民法庭去的。」法律對於做父母的責任是要嚴厲執行的。但是這種法律祇是一時權宜之計，那是爲了現在國家及新社會的窮困，不得不如此；到將來蘇俄經濟繁榮的時候，政府一定要設很多的育兒院，父母願意把子女寄託在那裏的，都可以那樣做。那時對於子女的經濟負擔，個人就可不管了。可是現在父母如果經濟狀況不好，很可以不生育，因爲節育和墮胎都是法律所許的事。說到最後，雖然有個人康健，社會責任，子女，美感，等顧慮，但個人仍舊是他自己的主人。祇要他的行為不與社會衝突，他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人，假設有一男一女願意一同到伏加河上或高加索山中去度他們的愛的生活，一星期，一日，一年，甚至無論多久，都是他們自己的事。法律和輿論都不會來干涉，也沒有別人可以來干涉。那是和正式夫婦度蜜月一樣受人尊敬的事。

在這樣一個新性道德的急流中，所有歷史上的束縛，都被打倒；舊的心理，宗教，法律，信仰，習慣等都被打破。男和女，無論在那方面都站在一個水平線上；節育和墮胎爲法律所許，根據合理及現實的

動機，要建立一種新的道德精神；這些很自然的在開始的時候，一定會有一番紛亂。在革命的初期，新的自由開放了縱慾的門，尤其是正當戰爭的兵燹之餘——歐戰，革命，及災荒，這些都是容易破壞存在的習俗和思想的。

許多青年都走入了放縱的歧途。他們已經沒有上帝的恐嚇，沒有父母的管束，沒有教師的督促，也沒有輿論的指責。他們祇是由着自己的衝動做去。他們沒有想到個人及社會所受的影響。他們沒有時間來想這些；他們是太興奮太亡命了。今天他們活着，也許明天就會死；今天有飯喫，明天也許就得挨餓；今天有家，明天也許就得流落。在那種恐怖時期，個人的行為已無所謂好壞，大家祇是在一時的情感中，追求着快樂的生活。

同時，反叛一切的精神，已經昇到白熱，——一般青年人非但把它看作一種工作，并且還把它看作一種冒險的事業。青年人要打破一切舊時代的遺制，其中當然包括性的保守。有許多女孩子因為不能滿足男子的『革命的』要求，被認為不忠實，而遭鞭撻。他們認為性交是同『喝一杯水』一樣簡單的事，較年長的黨員雖然很不以此為然，但是他們正忙着在戰場上同敵人廝殺。列寧曾很震怒



的說：『一杯水（指性交之易）的理論，把我們的青年都變成瘋子了……這是反馬克斯主義及反社會的。』

直到政治及社會經濟狀況漸趨穩定，這種紊亂的狂潮，才算下去。青年漸漸變得深思，并且時時有人在為當頭的危機作着警告的呼聲。他們用各種宣傳的方法，使健康，美感，社會責任等成為青年修身的原則；他們尤其注重劇戲及電影的宣傳。可是一切舊的觀念及習慣已經打破，而新性道德的基本哲學也已根深蒂固，不易動搖。個人自由乃成為新性道德的基礎。

我們如果想對這樣一個性行為的革命，給它一個相當的評價，我們必須先要記得俄國人的許多特質。俄國人在性的方面是沒有受過多少壓制的人民，他們也不很感到性慾的急迫。在通常的情況之下，假使他們在精神及物質兩方面都沒有受到很大的波動，像革命所給與他們的一樣，性對於他們，只是一種必需的，但并不是唯一的生活的目的。他們永不以性為一種遊戲——即使有，也不厲害。他們更沒有把性生活作為他們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或表現情感的唯一方式。

這種對於性的冷淡的態度，革命者也很想維持下去。他們廢止了性的買賣，把所有的娼寮都封

閉了，這些在帝俄時代是和每個農村外面的燒酒店一樣普遍的；他們對於祕密賣淫也極力禁止。從研究中，我們知道娼妓的兩種主要的主題，大學生和無產者，現在已經不以宿娼爲他們解決性慾衝動的方法了。

他們也禁止在商業中利用性的吸引力。在商店的窗中及娛樂場中，已看不見一點性的暗示。在俄國的電影中，也是如此。如果一個片廠拿一個性的故事來做一個片子的主要情節，一定會被人封閉。并且蘇俄的民衆，根本也不會爲這些所動。蘇俄的報紙及雜誌上，從來不刊一點愛情的故事。新的戲劇和樂劇，也從不以性愛爲體裁。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消夏劇場看「露絲瑪麗」(Rose Marie)這與美國的譯本完全不是一樣的東西，正像一個鄉女和一個賽美會中的美人相比一樣。在全劇的表演中，一點美感都沒有。在新的文學中，除掉革命也沒有再比描寫性愛更動人的情節了；但是它不能帶一點誘惑的色彩。在莫斯科有兩個夜總會，平常人很少，都是爲外國的僑民而設的。在那裏也沒有看見過半裸體的舞蹈。在酒店及劇場中，也不能像在柏林的街上一樣，看見許多不同姿勢的淫蕩的女體畫象。革命者覺得拿女子身體來做商業廣告，是對婦女的一種莫大的侮辱。在俄國無論何

處，絕對看不見一個公開或秘密的出售淫畫的商人。——他們是不會有的，因為俄國人民並不需要用別種替代的方法來滿足他們性慾的一部份。

我們更應記得蘇俄女子對於性的態度。她們對於性並不畏縮。她們隨便的談論，像談音樂，戲劇，天氣一樣。習俗在她們的心目中，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但是她們在性生活中並不輕蕩。在革命的初期中，曾有一時期使她們失去了精神及情感的平衡，但不久就很快的恢復了。她現在並不願隨便的和任何一個男子相愛。當然也有例外，但這不是我現在所要說的。外國人幻想俄國性生活的自由，以為每個俄國女人都可以隨便和男子相愛。但不久他便會明白，這是並不這樣簡單的——與此正相反，俄國女人表面上雖然很坦白，很隨便，但是也很難和一個男子發生愛情。當她已為一個男子的情感所顛倒的時候，她也很容易就把身體給他了。在帝俄時代不是有很多女革命家委身於反革命的將士，專爲了探聽軍事的秘密嗎？

我們現在不問蘇俄婦女情感是怎樣熱烈，一般人民對性慾怎樣冷淡，及「自制」已怎樣成爲新教育的一部份；我們仍不免要懷疑將來俄國人會不會走到完全獸性的世界裏去。個人自由是他

們的新口號，但是會不會有一天，女子經濟能力已完全與男子獨立平等；因為科學的發達，她們可以隨意節制她們的生育，同時國家為她們設了很多的育兒院——這樣會不會使她們也同男子一樣的縱慾？俄國人很確切的相信，他們用教育及社會制裁的力量，可以使女子有一種很深的社會意識，不致於胡鬧的去追求性的享樂。不過這究竟是一種假定。

也許像諷理思 (Havelock Ellis) 有一次和我討論蘇俄兩性問題所說的一樣，在蘇俄發生一種正相反的結果，那就是說，女子並不放縱，而男子却變為格外拘謹了。他也不能肯定的說，多妻主義的傾向是男性先天的一部份——也許這不過是在一種壓制的習俗下的必然的結果。他說這世界正須要像蘇俄這樣的試驗，來解決許多不可解的兩性行為呢。

假設在蘇俄性交自由的狀態之下，結果證明男子及女子都沒有傾向亂交的趨勢；或者情形較用禮教的力量所維繫的還要良好，那我們將要在人類的愛的生活中，創立一種新的一夫一妻制。這種一夫一妻制自然是最理想的，因為它完全發之於內心，而不是受外界的力量所壓制的。這樣恐怕可以成爲一種新的力量，把全世界的性道德觀念，都改變了。

假設，這種試驗的結果，祇是增加了兩性的亂交，那蘇俄人民一定會立刻取消兩性間的個人自由，而加重上述種種的訓練的工作。他們一定會有效的利用社會的制裁力，像他們對付喝酒的人一樣。他們一定會擴充社會娛樂的範圍，使性愛提高，成爲一種情感的表現。他們也許會用強力來壓制自由主義，因爲由他們看來，那又是一種資產階級沒落的象徵了。

## 七 家庭

蘇俄的新性道德似乎與家庭制度及婚姻制度是絕對衝突的，至少外國的人這樣覺得。每使個人的行爲絕對自由，蘇俄的革命者已危害了婚姻的最高目的——性生活。但是現代文化好像處處有這種現象。不過祇是這種原因，還不足使家庭制度完全破壞。在蘇俄，因爲生活別方面有了重大的變化，家庭制度乃也受了歷史上破天荒的打擊。那種多少年來維繫家庭的力量乃發生了空前的動搖。

蘇俄執政者對家庭制度並沒有像宗教及私產那樣的加以限制。當然也有些革命者主張根本

廢止家庭制度。但是他們並不是執政者，他們只是在後台唱着他們對於性及家庭的高調。蘇俄真正的當政者覺得，在這種國家經濟貧困，正在恢復的時候，家庭是維持社會安定不可少的制度。他們也知道家庭制度對於他們最終目的的危險。那那種個人主義的傾向，顯然是與新社會的集產的精神不可并立的。但是，在現在，它仍有很多有價值的功用。許多人主張拿別的東西來代替家庭，但這究竟還是在一種試驗期中。此外，那些共產主義的先輩對家庭制度，並沒有過分的反對，所以蘇俄革命當局並不願意它立刻崩潰，但也並不設法來維持它的存在。

就在上述的情況之下，蘇俄的家庭問題乃成爲在其他各國所不能想象的一個問題了。在美國家庭是大家所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書籍雜誌中不斷的討論着。但是這個問題仍在討論中，懷疑仍圍繞着大家。並且社會的各方面——政府，報紙，教士，學校，以及電影，都擁護家庭制度，不遺餘力。他們覺得家庭是精神文化的基礎，是一個神聖的制度，是一種大的精神收穫。

在蘇俄情形便不同了。雖然一般人討論仍在熱烈，但是對於目下應採的方向，已經沒有人再爭辯了。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已定的計劃。他們覺得家庭應該是一種自動的結合。他們相信即使是在這

樣一個過渡貧困的時期，家庭制度之存在，也必須以它本身內部的力量爲根據；不然，祇好眼看它崩潰，別無辦法。當我和一個革命者討論時，他說：『假使家庭也像殘廢的人一樣，必須靠外面的力量才能站住，那不如叫它沒落去好了。』

現在雖然在許多大城裏，尤其是莫斯科，離婚的比率很高。有幾個月與結婚率相等，在一九二八年的三月中竟超過之；家庭在形式上雖有改變，但根本的勢力並沒有消滅。在農村裏雖不免仍有動搖，但是家庭制度已經根深蒂固了；並且，蘇俄究竟是一個農村的國家！這種使家庭生活仍歸安定的勢力，是無可抹殺的。第一，人民之間有一種惰力，使他們走入行爲的常軌。並且家庭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尤其在農民之間，他們覺得家庭以外的生活，都是貧困的，罪惡的。在農村中更有經濟的壓力，雖然，集產農場有使家庭觀念逐漸衰弱的趨勢。

最根本的，還是在俄國人民的性格。革命的潮流雖然猛烈，但是並沒有能把他根本的性格改變了。他和從前一樣的，仍有一個鼻子。他的情感和本能並沒有能爲人工的，有組織的城市文化引入歧路。他行爲及思想的習慣，仍是那樣簡單。除少數大城市外，他並不感到有變態的性生活的存在。他是

一個粗魯的動物，生理的要求很強，但他滿足它們的方法也很自然。像西方國家中那種因情愛的變態而引起的家庭的解體的種種原因，他根本沒有。

同時他又是一個富於情感和樂羣的人。他不像英美人那樣的自足自滿。世界上沒有再比他那樣不慣於孤獨的人了。他喜歡別人，需要朋友。那就是他總是那樣可親，那樣不拘形跡！那樣好客的理由。那就是他把家庭看作一種社交及精神上的安慰的泉源的理由。

并且，他也是世界上最愛小孩的人。雖然俄國農民以虐待子女著名；殺嬰的事在城市及鄉村裏也是日有所見；而我仍舊要這樣說。當農民談起愛小孩來，他們總是充滿了熱情的。有一次我和一個鄉村裏的醫生在一塊，我們正在喫着早餐，一個隣居的中年人和他的妻子忽然跑進屋來，從他們的胸前放下許多蘋果，梨，及雞蛋，——是送這個醫生的禮物，他們眼裏充滿了熱淚——那女人已經禁不住瘋狂似的哭了——懇求他立刻到他們家中去，救他們那病着的兩週歲的女孩子。『我那小寶，』那女人哭着說：『救救她罷，我那小安琪兒，不要叫她死罷！呵，假使她死了，我還怎麼活呢？……』那男子雖然沒有讀過書，但是他的話，充分表現着一種父母之愛，充滿了激動和詩意，是我從未聽



見過的；可惜一經翻譯，便把它的美麗和沉哀都失去了。『假使沒有一個小孩，朋友，假使連一個小孩都沒有，你將呆鈍的像一個沒有靈魂的人。』這並不是一句例外的感情的話，而是這個民族的真性靈的表現。共產黨雖然有他們的世界觀和比較強硬的心腸，但也不能超出例外。我看見已經不祇一次了，有許多共產黨在理論上反對家庭制度，而看見他自己的孩子跑過來，便不由的要跳起來把他舉得高高的，吻個不歇。

現在的問題是：在這些維繫家庭的力量，惰力，習慣，及俄國人愛羣，愛小孩的天性，能不能抵抗那些破壞的勢力？那些勢力分明一天一天的在增加他們的動力。

例如私產制度，就是維繫家庭生活的一種原素。用不着同意於安格爾（Engels）的馬克斯社會主義者才知道一夫一妻家庭制度的發生，是『由於財產集中於一人的手中——男子的手中——並由於個人要把財產傳給子孫的自私』才知道私產制度維繫家庭制度的力量。在一世紀之前，各國家庭便已成爲社會生產的單位——至今也還是財產集中的單位。父母兄弟，姊妹，對於家庭的財產，洋房，汽車，投資，存款等，都有一份利益。試看平均美國每個做父親的人，那一個不拚命賺錢，使

他的家庭很安適，很闊綽；使他的妻子和兒女有很享樂的生活，以財產的關係，使他的家庭有勢力，有名氣。不要說是一夫一妻的家庭，即便是在中國那種多妻或種族的家庭，也莫不是以私產制度為基礎的。但是現在在俄國，私產制度已經根本動搖，尤其是在大城市中。新社會的最大的努力，即在打倒這種制度。這好像是把俄國家庭制度的柱石，拔去了一根。

宗教的崩潰，也是家庭制度的一個打擊。我們不管馬克斯社會主義者所說的現代的家庭係起於私產制度，是否恰當，但沒有人反對我們說因為宗教，尤其是猶太教及基督教，才使它發揚光大，才使它成為上帝意志的表現，人類性靈所開的香火。從來國家也沒有像教會那樣熱心擁護家族制度的；世界最大的教會，羅馬天主教，直至今日，還為家庭的崩潰而奮鬥着。

但是在蘇俄宗教本身已近沒落。聖經的訓示和宗教的禁例，在人民生活上已不能發生效力，尤其是在一般青年人中，家庭生活自然也包括在內了。『尊敬你的父親和母親，』革命者也這樣說，假使他們對於新社會有信仰，并也願意實行的話。如果不然，他儘可以遠遠的離開他們，像離開瘟疫一樣。『上帝放在一起的人就真沒有人能分開了麼？』可笑！革命者憤激了。他覺得男和女的分散，不

是上帝或其他任何人所能干預的事。『一直到我們死才分離，』廢話！革命者大聲的嘆；生命是太寶貴了，不適宜的結合，時刻可以摧殘你的生機，豈容等到死時再說？他禁止教士再來干預一個家庭的命運，同時打破了婚姻神聖及離婚是一種罪惡的觀念。蘇俄革命者攻擊私產制度已經把家庭制度的物質基礎打破。反對宗教，於是又打跑了它一個精神上最老的擁護者。

婦女地位的改變，當然也與家庭生活有很大的關係。現在蘇俄婦女的生活，較舊日無論何時，有許多地方較世界任何國家的女子都自由。這在下面的一章中，我還要討論到，現在我所要加重說明的，就是她們至少在法律上，已把多少年來所有人爲的不平等掃除了。貞操已不再是光榮的標記；它的失去，也不再是一切侮辱及痛苦之源了，雖然舊的習俗仍在個人的意識裏。女子用不着再爲了爭名譽，爭光榮，或爭飯喫，而受許多困苦。她們時時鼓勵着向經濟獨立的路上去。在蘇俄從沒有人說某種職業，妨害了家庭生活，而總是說家庭生活妨害了某種職業。女子經濟能獨立，對社會的生產力有供獻，就是社會最高的理想，也是個人最高的光榮。女子經濟獨立的程度，一天一天在增加，這使她們逐漸變得能夠自立；不至爲了維持家庭生活，而受許多痛苦。

我們再看看一般青年人對家庭是什麼態度多麼荒謬啊！假使我們拿美國的情形來比較。我們這裏雖然有許多獨身者，但一般青年人總是以家庭的理想，爲他們社會生活的最後的遺宿。青年人到處都看見許多男子和女子，讀書，計劃，投資，成功，失敗，犧牲，……在他們的腦中，只是爲了最後有一個家，來分担他們的成功，同享他們的富貴。雖然命運善變，但他們那種最後的思想，總是不易打破的。工業及城市生活的發達，公寓生活，精緻的售貨店，影劇場，及許多其他大的娛樂場，使家庭生活受了重大的打擊，但是家庭在許多人心中，仍舊還是一個最有力的理想。

在蘇俄便不是這樣——一點都不是這樣了。當我告訴一羣西伯利亞的學生說，在美國每個青年人都以家庭爲他們生活的目標，他們不高興的看着我。這種想法，對他們似乎覺得太淺薄——太使人類的人格變得狹窄，沒有生命。他們當然是這樣想。俄國的青年，尤其是在農村以外的，從小就受着革命的熏陶。他的思想，大部份受着家庭以外的各種勢力的影響。在幼稚園，學校，及「十月革命者」，「拓荒者」，「共產主義青年團」等組織裏，他們已養成了以促進新社會爲目的的人生觀。他們也并不輕視家庭制度；他們并不覺得家庭也像私產和宗教一樣是歷史上遺傳下來的廢物。他們

祇是習慣地覺得，他偉大的事業，偉大的光榮，只有在那最大的，包羅一切的，最高貴的家庭——集產的社會中可以找到。他們從小就被教導着經濟的，同時社會的，精神的，依賴着那些家庭以外的許多組織，如俱樂部，工廠，體育會，工會等。這些都是新社會理想的創造者，和實行者。決沒有人把家庭當作最後的理想，生命最終的目的。所以一般青年人對於家庭觀念及責任心也非常輕。

在新社會的理想的背景中，還有一件事能損害現在的家庭制度的，那就是家庭工作的社會化。家庭對於革命者是一個經濟及社會的畸形體。他們覺得如果有一個公共的飯廳，用有訓練的廚師替大家做飯，不較令各家自行燒煮來得經濟嗎？如果有一個公共的洗衣廠，用機器及有經驗的工人替大家洗衣，不較令各家自行漿洗來得經濟嗎？如果有一個公共的育兒所，用受過教育的護士為大家看護，不較令每個往往對於撫育兒童一點智識都沒有的母親，朝夜做兒女的奴隸好嗎？他們以為這些工作的社會化，能使婦女從家庭的重擔下解放出來，修養她們的智識和人格，為新社會盡些義務。列寧說：『我們的民族永遠不會自由，假使有一半人仍做着廚下的奴隸！』

這種理想其實也並不見得完全是新的。在美國最新式的公寓裏，有許多蘇俄的理想已經實現

了。兒童公育的運動，在這裏也同樣的已有相當的成績，不過目下僅限於最富及最窮的兩種階級：最富的人能夠自行設備一個撫育兒童的地方；最窮的人則有慈善的育兒院或救濟院。但是在蘇俄，這是全體民衆的一個目標，是全國一致的一個希望。

現在對一個西方人或美國人提起蘇俄兒童公育的運動，也許會使他害怕。這大部份是由於許多報紙文章及講演，說蘇俄在強迫兒童和他們的父母永久地隔離。這當然是不真確的。蘇俄革命者從來不用強迫的手段，除非做父母的已經忽略了他們的責任；政府爲保護兒童起見，才加以強制。他們的理想是使兒童和他們的母親都一樣的得到利益。他們以爲這種計劃，非但須得到父母的同意，并且還需要他們的合作；尤其是母親。育兒所一定要設在離她很近的地方，也許就在她住的同一條街上。在那些新建的房屋中，公育兒童的地方，就設在另一間房子，或院子裏。母親和父親同他們的小孩，仍時時有接觸的機會——可以同他玩，撫摩他，不時抱到家裏去，幫助他身體及精神兩方面的發展。他們覺得在育兒所中，兒童所得到的利益和保護，恐怕平常祇有最富的人家才能辦到。在那裏，飲食，沐浴，衣服，都是按照最新科學的理論。病時立刻有兒科專家來醫診。在那裏，小孩不致於過飽，不

致受責罵，受拘束。最要緊的是和一切罪惡離絕，尤其是喝酒；這種惡習已深入一般羣衆，工人較農民更壞。……很奇怪，蘇俄一切計劃中，祇有兒童公育最少有人注意。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些新教徒；他們覺得在這方面很可以和政府競爭一下，所以他們立了許多育兒所，來做與無神論者鬭爭的工具。

全國兒童公育的運動，自然是一種很慢的發展。須依國家經濟的繁榮爲定。這對整個的家庭工作社會化的計劃，也是如此。可是有些地方，這種社會化確已有驚人的成績了。例如在基府 (Kiev) 我參觀一個爲失業工人所設的鞋廠。那是由失業工人自行創辦，而政府予以津貼的。我被領着參觀工作室，辦公室，俱樂部，食堂等等，不久我就發現那不僅是一所工廠，那簡直是一個小的世界，一個一應俱全的小的社會。它有自己的壁報，是在這個城市中所看見的最大，和最鮮明的一個，刊着工廠裏的新聞，和那些職員的祕史，及工作批評。它有一個學校和圖書館，不但收容工人，并且還收容工人的家庭；學校中有衛生，家政，文學，政治，國際關係等科目。它有一個避暑的別墅，并且在城裏一個公園裏還有一個運動場；它自己組織旅行團及運動會。它正在計劃要建一所小劇院，來給工人們演劇和

映電影。它本身完全是一個小的社會，很顯著的代行了許多舊式家庭的工作。

當然并不是蘇俄每個工廠裏私人生活的社會化，都已到了這樣高的程度。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整個社會化的計劃，已成爲工廠管理的根本原則了。在許多大城中，俄國紡織業中心的伊凡奴伏滋納孫斯克，煤業中心的沙克塔（Shakta）都很快的蓋起公共的食堂，洗衣廠，俱樂部，公園，託兒所，劇場……等，把工人們從家庭中吸引到一個較大的社會裏去。當你看見伏滋納孫斯克的大廚房及每到吃飯時，用小車載着保暖的食盒分配到各家去的情形，你會立刻感到他們推進社會化的熱誠來。

在蘇俄的新建築中，每家的房子都是很小的——普通是二間至三間，最多四間。只要政府不變，在蘇俄是不會再蓋大的住宅；一個家，也決不會變得像一個城堡似的大了。俄國人說，大的家已經沒有用，因爲有許多家庭方面的生活，已經移到外面去了。

結婚的法律，也像新性道德一樣，沒有一點強迫的成分在內，除非是離婚後生活費，尤其是小孩子的生活費，那是在過渡時期不得已的辦法。所以我們可以說，在蘇俄的結婚生活中，至少有一種自



由戀愛的精神存在着；我們這樣說，俄國人是十分高興的。兩個人可以隨意的同居不必經過什麼儀式；甚至不登記都可以。政府不干涉他們，朋友也不會譏笑他們。在莫斯科我遇見很多對夫婦，黨員或非黨員，大都是這樣自由的結合。他們並不隱瞞，也並不覺得有一點羞辱的意思。他們非但覺得這是最正當的辦法，並且還覺得祇有這樣，才能表現出情感的真實和男女互相的尊重。無論何時，當我對於這種結合表示懷疑時，總是引起善意的訕笑。尤其是婦女。有一次我大胆的向一個青年的婦人，——她已經有兩小孩，和一個工程師同居着；——對於這種結合方式的普遍，批評了一下，她唯一的回答就是：『是的，你說的話，像一個野蠻人說的一樣。』她並不是在罵我，因為她是受過很高的教育的婦人。對於她，除掉這種結合以外，再也想不起有什麼別的合理的結合方式了。當一個人聽見像她這類話時，才會感到在社會哲學方面，蘇俄已離開普通人羣有多遠了。

離婚當然也像結婚那樣簡單。假使結婚時沒有登記，那兩人可以隨時分手，無須什麼手續。假使當時曾經登記，也不過是再到登記處去寫上便了。無論丈夫或妻子，無須得對方的同意，就可以離婚。在莫斯科我曾遇見一個年青的太太，她告訴我她離婚的情形。她曾經和一個她不愛的人結婚。因為

他追逐她很利害，并且有一次恐嚇她，說如果她再拒絕他，他便要殺死她和他自己，所以她才答應。他們便這樣登記了。他非常快樂，可是她并不感到一點快樂。結婚後幾天，他到高加索山旅行，她便到登記處去要求離婚了。她解釋說，不久登記處『一定會用書面通知他，告訴他我已不是他的妻子了。』

在蘇俄一切的離婚，大概都是那樣簡單。無須法律的理由，也用不着什麼請求書。管理離婚登記的祇要一個小學畢業生便夠了。他并不多問什麼？他不管離婚的理由在那裏？他也不從中和解。假設他這樣做，他就超越他的職權了。他祇是一個小書記。他祇把姓名，住址，日期等填在離婚登記冊上，像其他的書記抄錄煤油和鮮魚的價格一樣。形式非常簡單，但那是事實。等着去登記的人站一條直線，和到麵包房買一塊麵包，雜貨店買一碼布一樣高興，一樣悠閒。我曾看過好幾個大城的登記處。在那裏看不出有什麼衝突，或重的大意義；而那簡單的手續，却是現代最大的一個革命。

如果結婚以後，有小孩，法律就要干涉了。也并不是不許離婚——那是被視為干涉個人自由的事——不過是規定兒童的撫育責任罷了。這裏我一定要說明一下，在蘇俄是沒有『私生子』的。父母有了小孩，一定得撫養他們。普通是由母親撫養，父親給生活費，——他薪金的三分之一，——一直

等小孩到十八歲，如果不祇一個小孩，津貼也不得超過他薪金的一半。

有時也有正相反的辦法；由父親撫育子女，母親給生活費。我曾經知道在莫斯科有過一次這樣的事。那母親是一個工程師。兩個人都要爭着撫養那個九歲的小孩。但是因為那父親是共產黨員，法庭就判決令他撫養那個孩子；而那母親收入較富，就令她出生活費——她收入的三分之一——一直到小孩的十八歲。

假設沒有小孩，離婚時男女身體都很好，那雙方都無須付生活補助費。如果妻子已不能工作，她可以得她丈夫收入的三分之一，但不得過一年。如果丈夫不能工作，他也可以得他妻子收入的三分之一，也以一年為限。

現在我們要問：家庭在蘇俄的命運究竟怎樣？一個外國人一定會覺得它的命運是立在一種不利的地位。一切主觀或客觀的破壞的勢力是那樣大，那樣恆久。私產制度已經破壞，宗教勢力也已沒落，舊的性道德及家庭觀念已經打破，節育及墮胎已為法律所許；女子經濟已漸獨立，兒童對於家庭的責任心也日趨淡泊；家庭的工作已大部社會化……這一切新的社會勢力，一天天的增加，它們的

動力，那就是說，一切法律經濟，心理，宗教，習慣，社會……對於家庭的維繫，都在日趨衰落之中，一個人很難再想出還有什麼力量，可以把一個家庭硬硬的維持在一起？當然還有愛的力量——男女的愛及子女的愛。許多在城市中的女人都說父愛是一天天在增加。那一定是從前的智識階級或中產階級，他們現在已經沒有感情的寄託，所以便寄託在兒女的身上了。

但是究竟兒女是否仍像從前一樣有維繫家庭的力量，這還是一個同題。會不會因為他們已多數依賴社會生活，如教育，娛樂，物質的享受，及將來之準備等，而對於父母逐漸變得冷淡，而父母對於他們的愛，也因此減少？世界上的兒童，沒有在家庭中生活的時間較蘇俄少的。父母之愛的本能，當然不致消滅，它仍能喚起兒童的天真的柔愛，而成爲一種維繫家庭的力量，不過不見得仍像從前那樣有力罷了。男女之愛於是成爲唯一維繫家庭的力量。但是男女之愛在蘇俄又是怎樣呢。

## 八 愛

世界上所有的所謂智識階級，尤以美國爲多，莫不爲羅曼的戀愛生活的命運所煩擾的。的確的，

在別的地方，不會有那麼多人關心這個問題。小說家和批評家在文學雜誌上表現了對於這種『偉大光榮的愛之幻想』的幻滅的悲哀。他們祇看見前面的黑暗，覺得一線光明都沒有。安得列·莫洛 (Andres Maurois) 哀悼的說，『許多人都願意看羅曼的愛，這樣快的死去了。』

一個美國作家克拉藍 (Joseph Wood Krutch) 說得更好一點，他說：『愛，現在已經很快的降低到祇是一種生理的行爲了；在生理行爲以外，再也找不出一點別的意義。』不過一個有歷史眼光的人，決不致於這樣悲觀。我們知道愛之發生，是在人類原始及有文化的時期之間，在這時期之中，人類逐漸進步，逐漸離開了禽獸的生活。愛也像藝術一樣，就是在這樣進化中的產物。假使我們的愛是在往原始的路上跑，那等於說我們是在破壞自有文化以來的所有的智識的遺留，因為愛就是在此中生長的。

很多作者如漢明衛 (Ernest Hemingway) 羅蘭士 (D. H. Lawrence) 及赫克斯萊 (Aldous Huxley) 等，又玩視戀愛；他們覺得那不過是人類生理要求的附帶品，很應該打破的。即便是羅素 (Bertrand Russell) 也不免發出同樣的呼聲。他說，『宗教，悲劇，愛，都已萎敗……』

…因爲我們對於人類肉體的重視已經減少。』

祇有露理斯單獨的對於愛的信仰，沒有改變。有一次他和作者見面時說：『愛已深入人的心中，恐怕是永遠打不破的。』

但是，沒有一個現代作家像凱塞林（Keyserling）那樣對愛的命運抱着深憂的了。他字字句句都表現着一種失望和悲哀。他覺得，『愛已經在她的死床上了……在歐洲愛已經成爲不流行的東西……此後恐怕永遠不會存在了。』爲什麼呢？現代的婦女已和男子一樣……在有些國家，女子已經變成糾糾雄夫，他的意思是，已變成平胸的人了。像男孩子一樣的短髮；體態的改變；戴着眼鏡；一切女性特有的柔美，都爲風吹日晒，破壞無遺；對於運動的熱——這一切都使女性的外表改變了……獨立的女性更捉住了時代精神……這樣使女子素來被稱爲『愛之動物』的許多特性，都歸幻滅了。』

在這樣的思想中，會使我們覺得如果要保持以前的愛或她的光榮，非要把婦女從自由解放之路推回去不可。至於怎樣完成這種神跡；怎樣拭去婦女已經得到的那種自謀解放的自尊心和勇敢

——對這個問題，凱塞林很聰明的沉默了。不過他很明顯的告訴我們，「法蘭西是最後愛還存在的地方；」同時他很明顯的少說了一句，就是法蘭西也是最後女子服從男子的地方。我們不得不想到，假設有一天法爾西婦女蘇俄也像美國的婦女一樣開始覺悟到男子從中古以來給她們的不平，她們對那純潔至上的愛又將怎樣呢？

那些爲「戀愛至上」的過去而嘆息的人們，應該要醒悟他們已經不是生活在一個閒暇，愛美，和無限制的個人主義的時代；在那種時代中，有財產有智識的人完全可以麻醉在他們的情感中，因爲除此之外，更沒有別的事值得他們注意了。在那種和平的時期，尤其是婦女，她們生活着就是爲了愛的實現。她們談着愛，想着愛，永遠的夢着愛；她們沒有別的事可以夢想，也沒有別的事可以使她們興奮。

但是這種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科學，民治，和普遍的教育，摧殘了這個時代的生命。婦女們已經發現了新的娛樂，新的刺激，新的責任，和新的希望。她們打開了從來未經嘗試過的人格表現的門路。她們開始對於她們自己的智識，發生自信，並且立刻用它來增進她們自己的地位和幸福；這也已有

了相當的成績。這些再加上我們今日所得到的性的心理及生理的智識，使我們不得不對愛及許多舊的習慣，最新下一番估價。

這種重新估定一切的事——因為我們智識的進步，知道是不可避免的，正好像因為一個新的自然律的發現，工業技藝也不須改變一樣——使許多人往往以勇於接受違反舊來的思想及行為為驕傲，但他們對於它的許多習慣的改變，仍舊覺得非常恐懼和悲哀。對於他們，愛是一種絕對柔弱聖潔的東西——太柔弱了，一觸就會沾污它的。他們也像宗教的根本主義者一樣，覺得懷疑愛的價值，就是破壞了價值的本身。

在這種愛的幻滅的呼聲中，男性的呼聲特別顯著，這是一個偶然的事實呢？這會不會祇是男性從他們向來自以為尊貴的地位中退出來的一種反抗呢？

無論我們對這個問題存着什麼意見，但是戀愛在蘇俄的情形，總是會使全世界驚異的，因為同是一種勢力，對於凱塞林莫洛等人以為是『愛的死滅』者，對於蘇俄的革命者又會發生一種另外的意義，也許是『愛之再生』了。他們以為，如果愛在人類生活中有一種正當的功用，它一定能適合



他們所造成的環境，這種環境就是凱塞林目爲『愛之窒息』的。

這兩種世界觀的衝突，是十分清楚，和不能調和的。

當你稍爲深入蘇俄的生活及文學，你就會發現一派反對羅曼的戀愛生活的惡聲；在這種惡聲之旁，赫克斯萊的憤世嫉俗的呼聲，成爲無價值的滑稽了。例如羅曼諾夫 (Pante Ieimon Ram-nov) 寫了一篇可與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及阿齊巴曷夫 (Aartzybashev) 的『沙雷』 (Sanine) 并列的短篇小說，叫『無花的樹』 (Without Flowers) 這小說中的女主角是一個大學生，她一個很親密的同學很傷感的寫道：『在我們之間已沒有愛了，我們所有的祇是性的關係。女孩子很隨便地和『同志』們結合，一個月，一星期，有時僅一夜……那些把愛看作超乎純粹生理要求以上的人，別人一定拿他當瘋人看。』在別一種小說裏，一個革命的學生科羅科林 (Khor Okhorin) 更有力的說出了這種情感：『愛祇是資產階級阻礙他人進行的一種跳舞，那是吃飽了飯的人們的消遣。』

也許讀者會以爲這些反面的意見，祇是過分自信，過分憤俗的小說家的虛構。我現在願意引幾

個俄國青年大學生，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在這裏。有一個說：『愛是大家所反對的，他們覺得這很無聊，很幼稚。』百分之二十八的學生，承認在性生活中羅曼的感情是很好的，但並不是非此不可。百分之三十六甚至反對那是好的；像有一個學生所說的：『我多數朋友都相信在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那個女子須清潔和健康。』有一個說得更明顯些：『總而言之，我根本不很注意什麼羅曼的感情，祇要那個女人很好，能夠滿足我的要求。我所要的祇是那一點東西，在那裏有什麼羅曼之可言呢？』一個革命的講師，回答一個愛在生活中究竟是否存在的問題，他說：『愛決不是一種獨立的情感，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經驗，它祇是存在於老處女，或稚年的女學生的幻想中的東西……共產黨員所有的祇是一種生理的要求——不是一種情感，祇是一種不可缺的生理的需要。』

這種話真坦白，也真夠有趣味和堅決了。可是我們從這些話中，很容易得到一種誤解，以為這就是一種一般羣衆的心理，或新時代社會方策之一部分，其實都不是的，雖然表面上很熱鬧，實際仍祇限於男性，尤其是僅限於一般在思想方面善於幻想的大學生們。蘇俄的婦女，從來也沒有加入過這種運動。她們大部分離得很遠，有的對於這種運動感覺到新鮮，有的感到煩惱；不見得都很快樂。那些小說

作家，明顯的告訴我們。一般青年對於愛的反叛，但他們很小心，祇寫到男子，他們書中的女子，仍沒有一點改變，仍舊是理想着愛的生活，希望着享受愛的生活。

在羅曼諾夫的小說中，悲哀着愛之死滅的女性，本身就是羅曼思的代表，落日，樹影，音樂，花，詩，尤其是愛，都能使她迴腸蕩氣。她正像屠格涅夫小說中的女人一樣，有一個羅曼的靈魂。在別一本小說『月亮在右邊』(The moon on the Right)中，女英雄唐雅(Tanya)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結了二十多次婚，她失望得快要自殺了，最後得到一個強壯純樸的少年農人的愛，她終於得到了補償……在另外一篇小說『犬居』(A Dog's Square)中，作者寫了一羣女性，最後都承認了真愛的價值。即便是凡拉(Vera Volkova)一個醫藥生，平日對於男同學向來是善於應付的，有一次也喊了出來：『是的，我投降了，爲了情感，爲了愛……』她的朋友安娜(Anna)在她革命的事業中是不顧一切的；平時總不信任，想有什麼價值，最後終於懺悔了她以往許多悲劇的惡行，和行爲的空虛。華約(Varya)是一個工廠裏的女孩子，她對於人生和愛，都知道得很少，但終於也爲英俊偉大的科羅科林的愛情所動。她沒有力量去抗拒他，當她最後如他所願之時，他唯一的夢想就是希望將來

她會有一個兒子，像她的愛人一樣偉大，勇敢聰明，能幹……其實，蘇俄新小說和新戲劇的作家，很少有一個不在他的女主角的圍周，織下一重羅曼的色彩的。

現在那種反常的狀態，從歷史的觀點看來，也不見有什麼重大的意義。在歷史上并不見得沒有先例。也許是因爲人民的特性，及它社會的特殊現象，俄國正像胡佛所說的，永遠是在一種情感的循環中起落，在這種循環中，性愛的理想化也會被懷疑，侮視，及壓制過。在所謂「虛無主義」的時代，一般人都注重功利，輕視美術的價值，羅曼的愛自也在擯棄之列。屠格涅夫書中的虛無主義者，巴查樂夫（Bazarov）這樣說：『你同一個女人結交，自然希望能了解她，但如果不能——這也不要緊——她不會在你脚下裂開的。』幾年後沙寧在小說中出現，她比巴查樂夫更勇敢的玩弄了愛。但是虛無主義及沙雷主義并不能把愛從人心中完全驅出去。

現在的狂潮，當然是俄國未經過的最大的一個，這也是很自然的。它是同革命俱來的，在這個革命中，俄國人民積聚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狂暴的情感，這情感不是失望，而是驕傲——反抗一切，打倒一切的驕傲。它使俄國一般青年對舊的世界抱着疑恨，覺得破壞一切舊的東西——領帶，窗簾，女

人的帽子，乾淨的襯衫，及愛——是一種英雄的行爲，是一種美德。但是不久革命的破壞時期過去了，對於古舊的東西，不免又要重新給它一種估價。無產階級自己也結起領帶，掛起窗簾，穿起乾淨的襯衫——總之對於個人的外表，也逐漸小心起來了。換言之，美感又在蘇俄抬起頭來，跟着對於愛的態度也就改變了。

不管革命的呼聲多高，不管新興文學怎樣忙着打了「打倒小資產階級式的情感」的旗號在公衆前遊行，那有思想的革命者，已經感到一味破壞之不當了。他要去求先輩們的指導，而他發現有許多已做的事情，是與他們的意見不同的。列寧說，「性愛是生理的要求再加上情感。」安格爾和貝爾（August Bebel）也曾贊揚過性愛之力和美。甚至像科龍泰夫人（Madame Kolontay）那樣反對『職蜂主義』——男子的泛愛主義，像職蜂從這朵花又飛到那一朵一樣——的人也承認：『愛在純粹的生理現象以外，還有一種社會及心理的意義。』

這樣在蘇俄革命者的心中，又恢復了愛；不過他已有了一種全新的意義。他不願把它本身當作一種目的，當作生命最後的目的。他祇是對於所謂「愛的宗教」有一種反感，但他也承認愛情有

使生活變得豐富，使人更勇往直前的力量。他不願在愛裏滲雜一點別的成分，無論是宗教的，社會的，甚或是詩歌的。他願意讓它自由的發展，用它自己的力量，與婦女的意志，生理學及心理學的進步，并行不悖。他相信祇有和一切舊的思想習慣分離，愛情才能從腐化及壓制中解救出來——才能有一種新的面目，和新的精神；才能完成它在人生中最高的功用。他要把革命的精神，也像對性道德，私產制度，及國際關係一樣，灌到性愛中去。

第一，他覺得打倒私產制度，就是有益於愛情的事。這個他倒不見得是信口胡說。莫洛曾提醒我們說：『在古的時候，婦女祇愛最能保障她身體安全的那個男子。到了近代，她們所愛的祇是有錢的人——最能保障她經濟的安全的男子。』在一種私產制度之下，金錢的引誘，遮過了情愛的發展。我們不是常讀到一個女人爲了地位和安樂而犧牲愛情，或是一個男子爲了要取得一個富有遺產的妻子，而壓制了他情感的生活嗎？做父母的也往往注重財產。我們不是常常看見，尤其在歐洲，父母對兒女用着近乎強迫的勸告麼？在小說，戲劇，影劇中，也充滿了因爲金錢而變節的戀愛故事。但是蘇俄的革命者以爲如果一旦財富的積蓄成爲不可能的事，那些功利的動機也就無形消滅了。那時男

女的結合，才能完全由於真正的愛情。

革命者覺得此外還有一點好處，那就是早婚。蘇俄的確是一個早婚的國家。以前在鄉村裏，男女都在二十歲以前結婚，現在則無論那種階級的人，都很年輕就結婚了。他們沒有理由要等着。他們不需要積下一筆錢來防意外的不幸。即使他們積下一筆錢，於他們也沒有什麼多大的好處，這我在前面一章中已經說過了；在蘇俄現行制度之下，積蓄是一件幾乎不可能，並且充滿了危險性的事。『生理年齡』及『經濟年齡』間的壁壘打開後，蘇俄的男女，都在很早就完婚了；男女情竇初開，性的要求也最急迫，他們以為在那時結婚，是特別有益的事。

因為蘇俄婦女經濟的獨立，進步的很快，戀愛在蘇俄又發生另外一個特點。一個女子因為物質方面無需男子的供給，所以她不必忍受那種沒有愛情，充滿了怨恨的結合。當他自己生活的時候，她可以毫不猶豫的同她丈夫離開，另外去找一個新的伴侶，新的生命。一個男子也不必因為怕他妻子離婚後吃苦，自己良心上要受譴責，而不願離婚，男女的結合，完全以愛情為根據，不為經濟的依賴而維繫着，尤其是像蘇俄那種在習慣和法律上，離婚都沒有許多困難的國家。

因為離婚沒有困難，革命者以為愛在蘇俄又有了一個另外的成功。它使一切由於性格及身體的不健全而發生的失望，都可以避免。在這方面他倒不缺乏理論的根據。『試驗結婚』、『伴侶婚姻』等等運動是什麼？不就是為要補救這種愛的驚變嗎？羅素夫人，愛倫凱（Ellen Key）林德賽（Judge Lindsey）等人的理論是什麼？不就是幫助個人在還沒有陷入不幸之前，先作一度愛的嘗試嗎？在蘇俄節育及自由離婚的制度之下，一切的結合都是試驗結婚，都是伴侶婚姻。在現在的蘇俄，決不會有別種結合的方式。這當然是有傷『婚姻神聖』的觀念的，但是蘇俄革命者不能容許那種理論上的空論，來干涉個人的生活。有一次，一個革命者在熱烈的辯論中這樣說：『結婚是為人，不是人為結婚。』他們覺得除非在這種結合的方式之中，性愛的自由和平等，是不能保持的。

還有同上面有密切的關係的一點，是革命者從未提起，而已引起蘇俄及其他的科學家的注意的。那就是靄理斯所謂『女子性愛的權利』。最近有很多科學家和大膽的婦女運動者告訴我們，婦女因為在那種不能為力的環境中，很少能夠充分的享受她們的性愛的權利的。他們以為許多現代文化中的不幸，和情感的變異，完全是由於這種原因。靄理斯很直截的告訴我們這種困難：



『今日已有的道德和理想，都是屬於男子的，兩者都同樣的抹殺了婦女的感覺和行爲。世界上沒有一個園地我們看着是比『愛』更爲完全的婦女的，然而世界上也從沒有一個園地婦女是這樣無權過問的。她們深刻的感覺，她們溫文的態度，她們的母性，她們的愛，她們情感的感受性——都被男子利用來築成了一個於她們不利的道德的世界……在性愛的方面，婦女所希望的是男子能把她引到情感最高之點；在性愛的行爲中，雙方能得到相互的興趣，相互的快樂……她們這種沉默的要求，是很自然的……現在婦女的願望並沒有公開的叫出來，最後恐怕還是要她們自己來努力。』但是在蘇俄的制度之下，婦女無需公開的宣傳就可以達到她們這種目的。她們可以不聲不響的，然而有效的來實現他們的願望和要求。其實，世界的婦女已開始在那樣做，尤其是在美國。在蘇俄那種自由選擇，自由離婚的情況下，男子不得不同意他們的身體，和學習新的適應方法，否則就被淘汰了。這些就是我常聽見俄國許多醫學專家所唱的理论。在莫斯科一個有名的婦女精神病學家對我說：『婦女不必再爲取樂於男子而摧殘她們的愛的的生活。在我們這種情況下，性愛至少在生理方面已不是男子一種專有的權利和享樂了。』』

假使革命者不願多談這些純粹性愛的問題，教一個科學家來批評它在新社會中的價值，他一定不會輕輕放過性教育的問題。蘇俄革命者已把性的神祕之幕揭開。他用各種方法向人民灌輸性的智識：講演，電影，壁畫，戲劇，書，小冊子，——在車站的小攤上及小酒店裏都可以買到，學校中也有性教育。用這種方法，他想最後把青年們對於無知而發生的關於性的錯誤的思想及變態的習慣，都掃滅了。

蘇俄革命者以為性愛的生活中，沒有比男女間友誼的精神更有價值的東西了。他用最大的力量，把他們間的一切隔膜，都打破了。蘇俄的男女，從小在學校中就在一起，比世界任何國家都自由。他們一塊讀書，一塊在公園裏玩，一塊到俱樂部和劇場裏去。他們一同游泳，一同運動，一同打鬧。他們受着同樣以社會革命為目的的教育；受着同樣的思想和感情的熏陶。當他們長大起來，他們同在商店，工廠，及公事房裏工作。

蘇俄革命者相信在這種新的兩性關係之下，兩性的特權已被消滅，兩性間的衝突可以減少；彼此有合理的了解，愛情更可以堅固。他覺得男女間不管性的吸引力有多大，如果沒有一種友誼的精

神，一個一致的社會目的，及一種在生命中互助的願望；換言之，除非兩性間有一種共同的興趣和信仰，愛情不久就會消滅；從情感的不洽，而成爲一種厭惡。兩性間友誼的精神愈深，愛情便愈堅固。在新文學、影劇及戲劇中都着重於寫出這種友愛的精神。好像革命者要在兩性之愛中，另闢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境地一樣。

這許多新的勢力——私產的推翻，婦女的獨立，性愛的自由，離婚的自由，性教育，兩性間社交機會之增多，給了以戀愛爲生命中最高的快樂和光榮的男子許多苦惱；這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這些人以爲在西方愛的幻象的逐漸趨於破滅，也是由於蘇俄的理想和實施。

這些人的戀愛觀，當然是在一種騎士思想中養成的。依照莫洛的話，騎士式戀愛的要點，「就是女子的神秘化。」這種作用祇有使男女時常隔離，使他們對於彼此的生活情形隔闕，才能發生的。但是騎士是流行在一個已經絕跡的時代，我們很可以問一問：一襲舊的愛的衣服，是否還能適合現代人的身體和精神呢？不是女子的神秘化和兩性的隔離對於愛情是必要的呢？有一時代，一般反對男女同學的人預言說，如果男女在坐在同一個教室中，念着同樣的書，整天地彼此在一塊，結果兩性

間的吸引會減少，愛也就消滅了。當女子作參政運動的時候，又有人高聲的叫，如果男女都同樣的參加政治——那是男子做的事——女子將不能吸引男子，同時也不能再爲男子所吸引了。事實上，無論何時祇要女人想要撞進生活較寬的男子的範圍裏去，立刻可以聽見這種誣她們摧殘了愛的反對的呼聲。

這種男子的戀愛觀，分析到最簡單的時候，就是說——男子可以隨意做一切放縱的事，祇要他的幸運和錢囊允許，而於他愛人或被愛的資格，是沒有損害的。但是女人，祇要超出一點傳統思想和習慣爲她們所指定的範圍，立刻就破壞她們喚起愛情的能力的危險了。這樣一種歧視女性的理論，恐怕凱塞林也要以爲悖理吧。

要找這種「男女共同生活可以『壞愛感』」的騎士派思想的反證，我們祇消看一看俄國的歷史和文學。我在前面一章中已經說過，俄國從未爲騎士思想所深入；它祇是簡接的從外面傳到一點極淡的色彩。例如在俄國智識階級中，婦女從未被關在一個她們自己的小天地中，獻身於一個唯一的目的——誘惑男子，夢想着他們的愛，像在騎士時代一樣。在蘇俄的革命運動中，男女往往很密切

的結合起來——在一塊兒工作，一塊兒劃策；整天的見面，無論是在高興、煩惱、成功、失敗，或一切困難和弱點暴露的時候。可是我們在歷史上許多革命者的生活中，仍能找出許多熱烈的情史。在俄國文學中沒有『羅曼斯』嗎？在普斯金（Pushkin）的『烏葉夫基奴與尼金』（Yevgeny Onshkin）中沒有至高的情感嗎？在屠格涅夫的小說中沒有愛情嗎？然而你看在他們的小說中，男和女是怎樣密切的交往着。

我們再看一看俄國的農民，或者再看一看哥薩克，這個老年勇敢的戰士。他從來沒有聽見過騎士的故事。他也從來沒有像中古的騎士一樣爲了一個女人的光榮去戰鬥。哥薩克的女人是俄國最驕傲，最獨立的人。他也從沒有在他和她們之間，隔起一個社會的壁壘。然而他在俄國的文字中，創造了最美麗的愛之詩歌——充滿了高尚的情感。

事實是，只要人類有性的本能和想象的能力，世界上就有情感的昇華，就有愛。在愛情中也像在別的方面一樣，人性是有一個不定的定型的。並不見得因爲凱塞林及莫洛一般人習慣的對於某一種標準下的女人，容易發生感情的反應，我們便說新時代的男子不能對一種新標準下的女子發生

感情的反應。這句話當然也可以倒過來說。有新的環境，就有新的反應，有新的情味，便有新的吸力。有一時代，俄國以高臀大脚的女人爲美，女子都飽食終日，一點事都不做，爲的是胖了可以使男子生愛。後來又有一時期以身體輕盈，臉色蒼白的女子爲最羅曼，一般女子甚至有喝墨水以求臉色憔悴的。這都祇是感情的反應，沒有什麼不變的定則在內。總之，愛和趣味及習慣是不可分的，但是趣味和習慣祇管改變，祇要人類性的本能和想象力不消滅，愛便永遠的存在。

不管我們的意見如何，事實上這個世界，尤其是美國，是在向這個凱塞林所謂「愛之死滅」的方向走去。婦女向着地位更平等，經濟更獨立，社交更公開的方向前進；離婚變得更爲容易；性的神秘性更見減少；那種阻礙，女子在結婚生活以外去找性經驗的道德，也一天天的失去它的力量。

換言之，這個世界正也向着蘇俄所走的方向前進。蘇俄也許離開舊的思想習慣太快，太不顧男子的情感了；但那就是革命的本色。它不能太顧慮一般人的情感。并且，因爲俄國受騎士思想的影響很小，所以人民情感的動搖也不像在西方那樣利害。無論如何，蘇俄現在是正在她社會的大試驗室中試驗着一個新的戀愛觀念，一個愛的新意義——這唯一維繫着家庭的生命的東西。

## 九 新家庭的試驗

因為性生活及結婚的自由，黑暗的事在蘇俄也是層出不窮。在每日報紙上的新聞欄和共產黨及蘇維埃的會議記錄中，在在可以看見。有幾個城市中，曾有男子告訴我他們切身的經驗。女孩子們有了小孩，總是把責任推到她們的主人身上去，因為如果她們勝訴，就可以得到較高的津貼；那原來犯罪的人，也許祇是一個無產者。因為這種原因，男子都願雇用年歲較老的婦人。他也許是密探部的密探，但他們往往仍不能擺脫這種騙局。

有時一個女子告一個男子，要他扶養他所生的小孩，這個男子便拿出許多證據，說和她交結的并不祇是他一人，所以不能說他就是這個小孩的父親。法庭也無可奈何，祇好令那幾個有關係的男子共同扶養那個孩子，無形中承認這個小孩有幾個父親。常常還有女人專引誘薪金高的男子同居，以求得豐富的津貼；當她們同時有幾個這樣的男子入彀以後，她們的收入便很可觀，而不必再憂慮什麼了。也有許多男子結婚離婚像買一套新衣服一樣的隨便。我在南方曾遇見這樣一個人，他自己

懺悔說，他已結婚十二次了，而他的年齡還沒有到三十一歲。去年有一個城市裏的男子，因為不能給他三個已離婚的妻子津貼金而被控。當他到法庭時，他很坦白的說，他已經辭去他的工作了；因為每個離婚的妻子要他三分之一的收入，他自己已沒有餘剩了。他問，為什麼他還要工作呢？他并不知道法律規定他自己至少可以有一半的收入，無論他有幾個女人和小孩需要他的津貼。

實在的，因為要改造性道德及家庭關係，而不顧一切舊的思想道德，舊的畏懼和羞辱，舊的壓制和禁條，使得蘇俄人民生活的表面起了許多紛擾。悲劇和喜劇相繼而來，往往使人性變得更為黑暗。在歷史上還有許多事實，使得這種情形更壞。革命跟着大戰而發，破壞人民生活內部的安定，更為利害；尤其是在革命之後，又跟着一個大的災荒。這些壓力是太大了。還有一個人性的問題——俄國人民多少年來都是在黑暗與無知中生活着，直到現在才有一點自信心和社會的責任心，一切新的理想和新的痛苦，新的自由和新的放縱，便在此時發生。誰能說那些壞的現象是由於俄國人民一種根性的野蠻呢？尤其是農人，一個粗暴的原始人；他能哭泣歡跳，使你希望，使你同情；也能瘋狂似的殺人，使你恐懼，使你失望。



現在舊家庭的根基已經動搖。雖然在鄉村中舊勢力仍舊存在，可是那又能維持到幾時呢？將來怎樣？我不是說很遠的將來，像共產主義者所夢想的一樣，那時家庭至好亦不過成爲新社會中一個小的細胞，獨立的能力是非常薄弱的。那樣一個時代也許永不會來。不管我們信不信共產主義，但事實上蘇俄家庭制度已經起了一種新的變化。結婚已經沒有什麼神聖的意味，也不再是什麼重要的事。在法律上講，結婚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將來施行強迫登記，也不見得會有多大的進步。結合和離異沒有什麼阻礙，這種情形是不會有什麼改變的。

假設家庭在蘇俄還要存在，它必須要顧婚姻制度的破壞，和我在上面一章所說的許多惡勢力。它一定要以純粹的男女之愛來維繫它的生命，這種維繫的力量，共產主義者覺得如果一旦私產完全取消之後，一定還會堅固。他們說，到那時男女選偶，就不至爲了經濟的條件，而埋沒真的愛情了。有了完全選偶的自由，和他們那種社會制裁及教育的制度，男女就不必像現在一樣，再生活在一個各別的世界裏了。他們將得到一種這個世界上從未見過的合理的愛的方式。因爲他們將不僅爲生理的要求而結合，在生理之外，還有曆史的，社會的，智識的，及個人的種種同情，在這種戀愛中，

感雖然也許減少，但是一種友愛的精神却增加了。因為男女經費的獨立，一切由於金錢的問題而生的許多爭執，皆可消滅。同時，又因為家庭工作及育兒已經有社會分担，許多因此而生的煩惱，也可減少。換言之，他們以為在他們的社會中，兩性關係會變得更為密切。雖然男女祇要有衝動，有喜變的情感，便難免有喜新厭舊的事，但蘇俄並不重視這點。他們覺得儘可以讓男女自由的離合，祇要女子和小孩不至受到經濟，社會，及其他的痛苦。至於其他的事情，無論什麼，總比強迫的，不自願的結合好罷？

至於目前，家庭制度雖已失去許多舊有的勢力，但仍沒有到完全潰倒的地方。即使是離婚的數目，也不見得怎樣大，除掉在莫斯科等少數城市中，那裏因為政治的緊張，物價的高漲，和房屋的缺少，往往弄得人民頭腦昏亂，離婚率乃有高漲之勢。根據我從中央統計局所找來的材料，歐洲俄羅斯共有居民一萬一千五百萬人，那裏離婚率算是很高的，然而在一九二六年也祇有結婚數的百分之

• 六。這個數目當然不包括未登記的結婚和離婚。

並且，在蘇俄的離婚，并不見得就是家庭的散亡。因為離婚的人往往立刻就又結婚，而成立新的家庭了。許多科學家用很真確的事實和數字，有時用很美麗的文字，告訴我們，說人類社會雖然在不

斷的變動，家庭的形式也可以變動，但是家庭的本身總是存在的。霍布浩斯（L. T. Hobhouse）說：『愛和家是有一種本能的基礎的；那就是說，它是根據於一種神經的遺傳的趨勢的。』龔理斯在他最近討論家庭問題時也說：『它的存在可以說是和人類的生理組織交織着的。』

在表面上看來，這些理論似乎沒有可以爭辯的餘地。祇要男女有互相愛慕，互相接近的本能，他們就會結合在一起，而成立一種家庭的形式。並且，在愛裏就包含一種私念——一個私人的住處，和一種與外界隔離的生活。有時一個人會想和如醉如狂的羣衆離開，回到他自己的小屋中安息一會；自己靜靜的想一會，或和他最親密的人一吐心曲。同時，做父母的天性，也將不斷的在他心中作祟。這些內心的趨向使他有時覺得需要一個與外暫時隔離的生活——家庭生活。

所以蘇俄的家庭祇是一對戀人的結合，在一個地方互相給予了愛情所能給予的快樂。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家。那祇是一所小的房子——大的家庭，在蘇俄的新社會中已是不可能的了。丈夫和妻子可以永久在一起，也可以時常分開。他們的子女可以在夜間或白日他們有閒暇的時候回來，也可以，祇是偶然的接回家來看看。他們有完全行爲的自由，祇受相互的感情和願望的限制。在他們整

個的關係上說，他們是祇受主觀的情感的限制，而不受客觀的條件的拘束的。

這樣就是蘇俄未來的家庭。現在農村以外，尤其是工業社會的家庭，已經在這種變化的過程中了。它不再是一個出世隱身的地方，也不是一個小的王國，或一個有它自己的快樂和悲哀，和社會隔着一重堅壁的小的世界了。它已失去它的實際的重要，社會的功用，和精神上的價值。家庭在蘇俄還存在着，但是它已變為舊家庭的一個陰影和骨架了。

## 第二部：階級心理的分析

## 十 農民

革命後我第一次到俄國，到了不久，有一次在伏加河上一個鄉村裏過星期六。那是一個落後的農村，四周有漚泥的小河圍着，同外面的世界和一切的革命思想和情感隔開。星期日本地的蘇維埃主席召集了一個民衆大會。他遍告全村，說有一個外國人到會，請他們都來，那天雖然有雨和泥，鄉村裏的人也都來了：有的走着，有的坐着車，男女老少都有。那主席很驕傲的詳述我對於本村地方管理的贊美和一切將來的計劃。他是一個很熱烈的演說家；聽衆很有興趣的聽着，像俄國人普通對於一個好的演說家一樣。

忽然在羣衆的一邊發出一個深沉的聲音，像霹靂一樣的驚人。『空話，空話，祇是空話！』那是一個老年的農民。他赤足光頭，飄著很長的鬍子，穿一件很污穢的汗衫；他把手舉得很高，好像這樣可以把四周不清楚的反對的聲音壓下去似的。『一切都祇是爲了給外國人看，』他大聲的嚷。『不要再裝假了，客人，你看看我！』他把拳頭一拍他的胸。『我就是事實的代表——這個禽獸一般的世界的赤裸

裸的事實的代表。』四周起了一片反對他的聲音，但他不管那些。『我今年已經六十五歲了。蘇維埃也曾給我土地，但是對我有什麼用處？我能吃地嗎？我沒有馬——沒有馬我要地做什麼？』那主席和他幾個同事都想設法使他安靜下去，但他仍不斷的往下說。『在舊日』他提高了嗓子嚷：『我們有沙皇，有地主，有剝削我們的人，但我的馬死了仍可以買一匹新的，鞋破了也可以買一雙新的，祇要我有錢，買多少布也沒有人管。現在我們已經沒有沙皇，沒有地主，沒有剝削我們的人了，然而——沒有馬，沒有鞋，沒有布，什麼都沒有。客人，你要記住這個！』

我呆呆地望着那個農人，那個無可奈何的主席，和那紛擾的羣衆。一個農人居然敢在蘇俄對無產獨裁者發出這樣一種侮辱和反抗的聲音，這真是叫人難以置信的事。我記得很清楚，在舊日他是怎樣一個可憐的動物。他見了官是多麼害怕，看見穿制服，或穿城市中的衣服的人，他就會很小心的小鞠躬。見了無論什麼地位較高的人，他就會很輕捷的脫下帽子。這個不洗澡，長頭髮，骨格很大的農夫，他很怕羞；他在訴苦的時候，說話仍極謹慎，怕觸怒了那代表政府的官吏。當他看見那官吏臉上稍有一點不悅之色，他立刻會退後幾步，向他道歉，求恕。他心中也許痛恨那個官吏，但是當他和他見面時，

他就祇有卑謙，祇有馴服。

但是現在在這樣一個偏僻的鄉村裏，我親眼看見一個滿泥滿身的農夫向官吏一點都不客氣的狂呼暴哮，好像責罵他們兒子，或鞭打他的馬一樣！這好像是太英雄，太不可信了。

起初我想這不過是一個例外，是一個人，在失望及盛怒之餘的亡命的舉動。但是以後在別處鄉村裏的經驗，把我這種假設完全推翻。我所到的地方，情形都是一樣。在火車上，在路上，在市場上，在蘇埃的辦公室裏，處處可以聽見農民那種憤怒及失望的哀音。這個永遠年輕的農夫，他本身好像就是一個真理；至少在蘇俄，他本身，就是一個最可怕最有意義的事實。

對於農民態度的改變，我們已不能抹殺它的意義。這意義中包含很多東西，最重要的一個，就是他們在革命以前所沒有的一種自覺。很明顯地，革命把服從他心中趕出，而在他心中裝進了一種驕傲，一種自重，和一種他在舊日從未感到過的尊嚴。是的，農人現在已經自覺到他是一個人，不是像舊日被稱爲「怨爾」(Souls)那樣的非人的東西，是一個有他自己的靈魂及人格的個人。

他現在變得這樣，也是必然的事。革命已使他成爲農村的英雄。他和無產的工人一樣，已被一般



人日爲一種新時代中的光榮。一步步有人提醒他，說他是和別人一樣的人——並且還不祇於此——他是比統治者更高的人。他，一個勞動者及生產者，是人中的王，土中的鹽，（意謂世間因此種人之存在而改善。見馬太福音）人類的花朵；祇有他才配享受一切的快樂和幸福。他吸收這四周的諂媚和贊揚，像雨水落在乾的土地上一樣。

同時，在歷史上他是第一個真正的戰勝者。他戰勝了地主，佔有了所有的土地。河渠，森林，湖塘，草地，牧場，麥田——一切都從地主手中奪了過來；地主們以前是那樣有錢有勢，而現在已經逃亡得不知去向了，他甚至連一點影子都沒有留下，來遮蔽這光明的大地，使這個新時代的人再回想到他以前的勢力和光榮。農人變成了農村的主人。雖然黨政當局想把他放進一個新的社會模型中去——譴責他，壓榨他，給他加上許多新的担負，但是他終究已經是土地的主人了。土地完全是他的，沒有人會再來和他爭奪。也沒有人伏在暗處想來剝奪他新得到的財產。這是對於一個舊敵的完全的勝利；這種勝利，增加了他對他自己的尊重。

這種農民自尊的心理，發生了許多很重要的結果。它殺滅了他向來對於政府的畏懼。他不再用

恐懼及乞哀的眼光來看政府。那已經不是一種怎麼看不見的，在上的，超乎人類的力量的東西。現在的政府是和他的生活，他的鄉村，他的每種担負和需要都很接近的一種組織；對他壓力是會相當的讓步的。他現在可以伸出手來接觸它，搖撼它甚而至於鞭打它。

政體的改變，使他對政府更感到接近和密切，它外表的莊嚴已經不見，現在變成一個最簡單，最不講形式的組織，像一個鄉村的合作社，或市政大會一樣。政府的人員已經不再穿華麗的衣服，或令人畏懼的制服；也很少有人再佩鎗，除非是警察。在農村裏，他們和農民一樣的話，一樣的生活。他們大部分是農人。他們的衣飾舉動，並沒有什麼特別使人驚畏的地方。他們不用穿得像公爵一樣的莊嚴整潔，無論他是地方蘇維埃的主席，或是省裏地位更高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他們現在都是公民（Grazhdanin）和其他的農民，及其他的常人完全一樣。政府現在已不再高居天上，而是在我們的人間，而至於是在我們每個人的脚下。祇要到一個鄉村的蘇維埃去看那種隨便和簡單的情形，聽一聽農民對官吏說話的粗暴，我們便能了解到農民舊日對官吏那種神祕的畏懼的心理，已經沒有了。

一面對於權威已經沒有畏懼；一方對於個人的人格，又有了自覺，今日蘇俄的農民乃成爲要求最多的人民。他現在要享受很久以前政府就允許他的『革命的果實』。在許多方面，他的生活程度，自新政權安定以後，已經提高。但是農民現在不像從前那樣踴躍的再把雞蛋，牛油，火腿，起士等拿到市場去賣，這使黨政領袖們很感到困難。市場上現在已經沒有那種誘力來使他出賣那些東西。他不能得到現金，因爲現金的流通已被禁止，而紙幣對他又有什麼興趣——至小現在他們對紙幣還沒有興趣，雖然它也已經過了很多次風潮了。此外又因爲農產品和工廠製造品間的價值的無定，往往使他得不償失。他爲什麼還要出賣那些東西呢？

同時，他現在也沒有積蓄的必要。在舊日他常常一個一個戈的積蓄起來，爲的是可以再買一塊新的田地。田地是他生命的最大的奢望。但是現在他不能再買田地了。根本就沒有人出賣。他當然還可以多買一匹馬或牛，可是那樣他便有被稱爲『富農』(Kulak)而遭收稅人的剝削的危險。所以他現在不盡量的出賣他的農產品，而盡量的自己享用。除掉有時收成不好以外，農民現在在蘇俄是吃得最好的階級。

在另一點上，農民的生活也已改善。他娛樂的機會較以前增加了許多。例如演劇，在革命前農村裏從未見過的事，但是現在已經極爲普遍了。在鄉村裏，祇要有一所學校，大約便有一個劇場，在離文化中心很遠的農村裏，我也看見過許多有演劇設備的俱樂部。有一次我在一個鄉村裏看農民扮演高爾基（Gorki）的『日之子』（Children of the Sun），那是一個很成功的扮演。業餘演劇就是革命對農村一個很顯著的供獻。同時在公共的地方，又有電影及無線電的設備。此外還有俱樂部，圖書室，遊行，野宴，運動會等。

但是一般農民對於吃飽了飯偶然笑一笑，已經不能滿足。他要皮鞋——在他的歷史中從未要過這個。他已經厭棄他的草鞋。他眼睛只看着城市裏做的衣服，那是鄉間向來目爲無上尊榮的。他又  
要布料——在革命前他也從未這樣要過，他要重新蓋他的房子，重修他的倉屋，重造他的大車，他已經看見許多新式農具的圖畫，又聽許多人講過新農具的利益，所以他也要這些。他是物質主義及享樂主義者；他希望充實他個人的生活。他要那樣做，但是不能。

蘇維埃的工廠不能出產那麼多的東西來滿足他的慾望。并且因了經濟的緊縮，政府對於這些

東西，進口也很少。它允許農民最後可以使他滿足。它求他耐心的等着，等到新工廠都建設起來的時候就好了。它幾乎是懇求他，叫他忘去現在的痛苦，一直等到工業化的計劃實現之後。但是農人從來不想將來。「將來」對於他好像就是空虛。政府曾許他許多廉價的貨物——釘子，鋼鐵，乾貨，農具等。他希望現在至少也有部分的實現。他不知道，同時也不願了解，那缺貨的原因——這些貨物在帝俄時代祇要他有錢就可以買到。現在無論什麼東西都待等待，有時在雪雨泥濘中等了好幾個鐘點，結果一個店員走出來說，合作社的東西已經賣完，一尺布，一個釘子，都沒有了。於是他不得不大怒了。

時間與農民的自覺，一天天的併進，他的慾望也一天天的增加。這是必然的事。蘇俄的場面好像正是爲這樣一個結果而設的。共產主義者自己所扶植的勢力，造成了這樣一個局面。例如無產者的獨裁雖然狂暴，但是在政治上也給農民許多表示意見的機會。事實上共產主義者是在用了各種方法來喚起農民政治的自覺。用講演電影廣告牌，賽會，演劇，——最緊要的是預選的方法，使農民了解，并養成參政的能力。

有一時期，農村選舉——無論是合作社或蘇維埃的選舉——內幕異常黑暗。他們對農民提出

他們預定的候選人，祇在大會中間一問誰反對便算當選了。農民對於這種選舉方法，不知道怎樣是好。他祇是厭惡選舉，而躲避它。共產主義者也無可奈何。有些人很恐慌，他們覺得農民已又陷入於舊日的冷淡，又恢復了舊日對於政府的仇視，那是很危險的。他們記得列寧的話：假設一般民衆仍不知道運用他們政治的權利，革命便宣告失敗了。所以他們改變了方針，從一九二四年起，他們就允許農民自己提出候選人，並參加激烈的討論。他們當然仍舊極謹慎。他們仍不免用壓力——不過多半是間接的，如組織貧農和與他們為敵的一部分農民鬥爭。過於熱心的共產主義者有時仍不免用他專制的老方法。我曾到過許多這樣的農村。但如果農民對於這種欺騙提出控告，那一次的選舉即告無效，另舉行一次新的選舉，而那些「同志」們有時也會受到很重的懲罰。

沒有一個地方比在農民大會（Skhod）中更能看出一般農民的政治和人格的自覺的萌芽的。在那裏，農民的外貌和心情的明暗，都像在鏡中一樣的明顯的映出。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制度！這個和農民社會一樣古舊的農民大會，在舊日是一個烏合之衆，沒有主席，說話也沒有一定的限制，人們可以隨意的說話，有時一個人說，有時很多人說，有時全體在同時說。它往往在一場嘩鬧中散場，

用石一般的拳頭來解決那爭執不下的問題。女子是不許參加的。在現在的農民大會中，照例的鬻張已經沒有了，並且有一個主席在那裏維持次序，女子也一樣的可以去參加。

在意義方面說，農民大會在農村裏比其他的制度都重要。那是農民心理的晴雨表。在那裏農民無論老少，用他們簡單的方式，表現了他們的樸素的感情。我們在那裏聽見那些強烈放肆的言語，就會忘記政府的密探機關曾在城市中造下那樣慘淡的光景。在那裏，農民揭開他的思想和靈魂，叫全世界來觀察；評判和警戒。那裏我們看見一個新人——一個強大而具有未經試驗過的力量的人——的出現，他有新的熱情，新的希望，新的驕傲，尤其是一個要使他自已為別人所重視的決心。

一個農民的講壇，學校，法庭，和思想及觀點的爭鬧之場——這就是農民大會。

與政治的自覺并進的是農民的求知慾。他好像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渴望過要知道世界的一切，和他自己與它的關係。我清楚的記得，無論我到亞洲或歐洲俄羅斯的那一個農村裏去，立刻就會為農民所包圍，尤其是青年人，他們為好奇心所動，不斷的問我些關於外面的生活，工作，思想等問題。我到什麼地方去，他們總成羣的跟着，好像對於我說的話，每個字都想捉住一樣。

世界大戰和革命在農民的頭腦中輸進許多新的思想，使他求知的好奇心更爲激進。各種新的智識——生理衛生，農業科學，地質學，馬克斯主義——像水一樣的灌入農村。報紙和書籍也常常流通到鄉間去。當兵的從軍隊裏回來，往往帶來許多他們的經歷，新鮮的故事，和智識。悅目動心的廣告牌到處皆是。電影及講演者也像池中的魚一樣，自由的在鄉間漫遊。農村的代表不斷地到城市中或首都去遊覽。他們往往爲政府，工會，或工廠招待到博物院，大學，工廠，劇場，展覽會，公園，賽會及其他遊戲場中去參觀并且到處有人領導和講解。到他們回去時，他們自有一番敘述，連同許多新的智識，都給了他們的隣舍。在農村裏新的學校也逐漸開設。無論設備怎樣不周，教員怎樣不好，它究竟供給了一半農村的兒童教育。農村的兒童多半是求知慾很大的。有很多鄉村少年很刻苦的讀書，希望將來可以進大學。現在大學之門是爲農民開着，學生的五分之一都是農民，這本身就是俄國歷史上一件聞所未聞的事。真的，農民是正在發展他們的智識，將來也許有一天會從那裏出現一個農民的領袖，也未可知。假設有一天農民握着政權，誰敢說俄國又會有什麼變化？例如他們能容忍三百萬工人把持他們一萬萬二千三百萬人的選舉的現象嗎？



一切新的思想，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及道德的，在農村裏也非常發達。我所謂「道德的」，并不是專指情感方面而言，雖然在這方面也有顯著的改變。農民間無論男女，很少是清教徒，所以對於「性」往往是很開明的。雖然男子希望新嫁娘的真操，也像希望裝奩一樣，但是這種道德觀念，從未像城市中人一樣的深入他們的心中。一般輿論對於男子也像對女子一樣的嚴厲。在廣義的道德方面，包括男子日常的行為，及他和他人或外界的關係，變化最爲重要。

不幸農民在這種道德方面的，確極需改革。他輕德好酒，從來沒有把「說實話」看作一種德行。他說謊，爲了逃避重稅，逃避罰金，逃避鞭打，逃避監禁。他對官吏說謊，對地主說謊，對鄰居也說謊。他賣東西的時候說謊，買東西的時候也說謊。他向一個女人求愛時說謊，和她結婚時也說謊。假設他能在市場欺騙一個顧主，那是很好的事。他的良心不會受到一點譴責。市場是屬於和他隔離得很遠的外面的世界的，那是他的仇敵，他永遠用一種懷疑和苛刻的眼光看它的。我有一次告訴一羣大學生，說美國人常常把信件及包裹放在信箱外面，但是沒有人來偷。他們簡直有些不信。對於他們，人類會這樣誠實，那簡直是不可信的事。一個大學生看到丹麥人把牛奶桶放在路邊不會遺失的事，在一個報

紙上寫道，他在少年時候讀了很多虛構的故事；這個丹麥的故事，大約也像「珠文」(Julius Verne)及「梅利得船長」(Captain Maine Read)的故事一樣的真實吧！

有一次我和一個烏克蘭最大的國營糖場的經理同坐一輛車。我們經過許多農村，看見在果園，菜園，及瓜棚旁都有小的草蓬。裏面住着看守的人——尤其在夜間——怕人偷盜菜果。我的同伴問我在美國的菜園及果園中，是不是也必須用人犬看守。我告訴他，據我所知道的，並不是這樣，他很爲驚異。他幾乎不相信我。他問我，那怎麼可能呢？鄰居不會把你的菜果都偷盡了？在美國，人民真的這樣誠實嗎？後來我到了他的家中，他召集所有的工人及職員，把我介紹給他們；好像一個發現了什麼重大東西的人一樣，他告訴他們，美國的農人用不着看守他們的菜園及果園，人們不會互相偷盜。他們也半信半疑的。那怎麼可能呢？美國的農人爲什麼那樣誠實呢？爲什麼俄國人是這樣的慣賊呢？獸一般的俄羅斯人！

在俄國火車上旅行，看守行李是我最大的問題。把行李放在座位上，即使是買一份報，或向車站上的小販買一點食物的時間，也是不很安全的事。我沒有坐過一次火車或船，或到過一個車站，那裏

是沒有發生盜案的。每次睡在船上，我總拿一個練子把我的打字機及衣箱鎖在我的臂上，以便有人偷盜，立刻可以驚覺……

農民根本就沒養成一種尊重他人的權利及財產的觀念。他雖然仁慈，大方，活潑，愛歌唱，但同時在他心中也有一種邪惡。他不是一個強盜，但是一個慣偷的賊。很奇怪，他自己對這樣的批評，也并不反對。我常常聽見農民在公衆前自責——這在舊日的俄國是一種習慣——說農人，他們自己是人中的禽獸！

革命的領袖，正在設法使農民棄絕這些舊的罪惡。他們想在他心中養成一種新的道德。他們對他宣講那些說實話，誠實，尊重他人的權利等等個人的道德。現在蘇俄法律，禁止父母鞭打子女，或丈夫鞭打妻子。一個農民到一個蘇維埃的辦公室中，也許言語很粗暴，或在地上吐痰，但立刻就有人跳起來和他們講一番這些行爲的不正當的大道理。一次一次的，當我看見在蘇維埃的辦公室中，青年的農民領袖對農民解釋他們舉動的錯誤時，我好像身在幼稚園中一樣：在那裏，成年的男子和女子，不教他們世界革命，馬克斯主義，英國之奸詐外交等等，而祇教他們些基本的做人的道理。

自革命以來，對於農民沒有像集產農業那樣更重大的事了。這個名詞自有它理論的根據，但是這種運動，却不是純粹理論的。那是一個像暴風雨一樣的現實；它改變農民思想及生活的方法，搖動農民社會及古俄羅斯文化的組織，實在布雪維克一切事業之上。它對一切基本制度——宗教道德，家庭，個人間的關係，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男和女的關係，甚而至於蘇俄與世界的關係——的影響，是不能計算的。

這種運動的突飛猛進，實在驚人。在一九二八年夏天許多作家在莫斯科農場（Moscow Peasant Home）開會，他們正要動身到各農村中去研究集產農業，我也去參加。那時祇有百分之二的農民加入集產的組織，這個會的用意，是要鼓起一般作家的熱心，從他們的文章中，可以引起一般民衆的贊助。動人的演說，確定的預算，都引不起真正的熱情。許多作家和我談起集產農業的前途，都表現一種懷疑。住在莫斯科農場的農人，有時跑進來看我們開會，祇是訕笑，好像着一個醜小鴨的狂舞一樣。

可是在一九二九年的七月，已經有一百多萬農戶加入集產農場。一九三〇年的二月，加入集產

組織的農戶，已佔三分之一。這個運動像野火一樣的延燒，逐漸擴張它的範圍。

讀者不要因為它發展之速，便以為這是出於農民的自願。假設這種計劃叫農民自己去決定，他一定會歡呼地把它埋葬了。他根本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喜歡耕他自己的田，養他自己的馬，養他自己的牛，用他自己的方法生活。但是集產農場就是個人主義的廢除。所以大部分農民並不歡迎它。我會和一個很成功的集產農場附近的農民談過，他們說如果不受強制，他們仍不願放棄他們的私田。當一九二九年夏天集產運動正在一日千里的發展的時候，我聽見很多懷疑，恐懼，及失望的話，和失敗的預言。年老一點的農民都很悲憤。在他們眼中，集產農田就是世界的末日，這個制度是這樣新鮮，這與他們的經驗，習慣，目的，理想及所能聽到的或發見的完全相反。

我們完全客觀的觀察，覺得這個制度雖然在歷史上還是創例，然而在經濟上說，仍不乏優越之點。它是根據政治理論而產生的，然而它的長成却是由於經濟的必要。革命以後地主及富農的田產都被分割。平時沒有田地的人，現在有了田地，田地少的人，現在也有增加。一般人民，尤其是女子，受了新潮流的影響，都不願與翁姑同居，這使土地的分割，更為厲害了。在一九一七年及一九二九年之間，

田戶自一千七百萬增至二千五百萬，每戶平均的畝數則自十四畝降至十二畝。

這種土地的零星分割，在蘇俄有很重大的影響。八百萬畝的佳壤，現在都變成不生產的土地——爲新田戶築屋之用。在俄國田間還須隔以阡陌；一個經濟學家計算，這種土地的生產已夠供給城市一半以上的人口了。農畜如豬，牛，馬等，在現在絕對的小田制之下，交通又不方便，改種也自不易。其他耕種方面如輪流種植，機械，選種，人工肥地等科學方法，也不易大規模的推行。同時又因爲蘇維埃政府實行徵收餘糧的辦法以後，不能充分供給農村工廠製造品，并禁止以糧食售與私家商人，所以一般農民大都縮小他們耕種的地畝和家畜。據蘇俄政府公報（*Izvestia*）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的記載，一九二六年及一九二九年之間，牛減少二千萬頭，豬一千五百萬頭，羊七百萬頭，所以肉和麵包——這是我國人民主要的食品——的生產，大見減少。穀的出口已經停止。城市中所能得到的食物，一天天的減少。饑餓的陰影已經籠罩了整個的城市。

因爲要救濟這種危機，共產政府像在內戰時期一樣的開始向農民強制徵糧；不過現在付以一定的代價。農民大爲驚慌。在開始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政府不是允許他們決不會再強制的徵收糧食

了嗎？這又是什麼事呢？所謂城市與農村的聯合是怎麼回事呢？他反對，強烈的反對。他趕緊派代表到莫斯科去向加林甯（Kalinin）萊可夫（Rykov）等人請願。他又給他在軍隊中的兒子寫信，痛述徵糧的壞處，叫他使軍事當局也注意到這些。蘇俄立刻又呈出一種紛亂的現象。共產政府祇得趕快停止徵糧，并向農民担保以後不至有同樣之事發生。

但是根本的困難，并未解決，政府手中的糧食已夠維持到下次收割的時候。可是到那時又怎麼辦呢？怎樣能使農民多多的耕種，并願將餘糧按定價售與政府呢？祇是喚起他的社會意識是無用的。他對於這些話，祇覺得好笑。他祇是一味的憤怒和反抗。他覺得他已經受盡委屈了。共產主義者有什麼方法使他和緩就範圍呢？他是革命的中堅。時間已經不容再有延擱。城市中一定得有麵包，才能生活。不得不有一種急轉直下的辦法，所以在第十五次共產黨大會中，就議決以集產組織來解決這個難題。

這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冒險的賭博！像我們當時在俄國的人，都凝神靜氣的看着它的發展。大部份人民對這個計劃，并不信任。他們很怕農民——這個強固頑舊的個人主義者這個兼有舊時私產

的慾望和新的獨立的精神的人！他能很容易的屈服嗎？假使不屈服，又怎樣呢？軍隊中大部分都是農民，那時又該怎樣呢？當然，如果反對的勢力太大，共產主義者往往是可以讓步的，但是這樣，他們那些理想的社會計劃，及偉大的全國工業化的計劃，又將怎樣去實現呢？革命應該向前還是退後呢？蘇俄那時爲謠言及高漲的情感騰沸着。

可是共產主義者往往是言行一致的。這是一個生死關頭的問題。不容他們有什麼猶豫。中間沒有時間可以耽擱。他們立刻用他們最大的能力向農村去進行。農民當然很悲憤。有的地方他們把政府派去組織集產農場的人殺了，把蘇維埃的房屋放火燒了。但是除掉這些偶然的反抗以外，倒還沒有什麼大規模的羣衆革命。政府仍用它最初的方法，先剷除反抗的勢力。一個政府派遣的組織人到了一個農村，他就先召集一個民衆大會。因爲願意聽外方來的人說些新東西，往往有很多人來到會。——但是如果他們預先知道這個會是爲推行集產農場而召集的，他們一定就不來了。有一次我在一個農村裏，看見一個組織人召集了七次民衆大會，都沒有一個成年人到會。後來用盡策略，才把那些農民引來。



這往往是這樣的。當農民召集之後，組織人就開始「出賣」他集產農業的理論。他對他們說，如果他們肯把他們的能力和財產，都加入這種組織，政府可以幫助他們，給他們耕地的機器，種子，專家，新的房子，新的麥場，浴室，育兒院，託兒所，肥壯的牲畜，無線電，醫院，俱樂部，學校，……等等。辯論有時延長到幾天，或幾個月。最後請他們自動的加入。最初的幾個人是最難招募的，但當農民想清了他們前途必然的結果，他們便漸漸地樂於加入了。在這一切新的法令及政策之下，他不難了解到各方面都是於私人耕種不利的。無論什麼時候，他稍感富裕，徵稅人的斧子便會很重的斫下。事實上他無時不受到警告：如果他反對政府的政策，不將糧食運到市場上去賣；如果他把糧食以高價賣與私商；如果他有任何剝削的行爲，如僱用工人——除非在病中，或特殊不幸的情形之下——超過某一定數目；如果他出借糧食和錢給鄰居以取利，或租一塊地給別人；或其他任何可以稱爲剝削的舉動——在蘇俄這是一個最活動的字——他就不要再得到一點憐憫，法律會來打倒他，收沒他的財產，剝奪他子女上學，及在工廠裏作工的權利。

我在許多農村裏都看見這種陷入於黑暗的境况中的「富農」；他們財產被剝奪，政權被剝奪，

還要受社會上的輕視。他們在這個世界中是寂寞的人；羞恥的記號，好像就在他們的額上插着。沒有朋友敢和他們表同情；也沒有一種權力能恢復他們已往的財產和社會地位。他們叫喚和反抗。然而他們的眼淚和詛咒於他們并沒有一點益處。共產主義者根本不願意有成功的私農，假使一個農民變成了富農，無疑的他一定得把他剷除。也許是一個很好的經理人，或事業家，但祇要他把他的天才用在爲他個人的利益和個人的事業上，他便成爲一種危險，一個必須掃除的仇敵。

共產主義者這種集產運動不嫌進行得太猛烈了嗎？他們不是已經冒了引起農村的仇視的危險嗎？富農階級不會聯合起來反抗政府嗎？蘇維埃政府在經濟方面能夠充分供給農民機器，種子，牲畜嗎？它那裏去找那些領袖人才——機師，工程師，農業專家，社會工作者，政治領袖等呢？并且，集產農業的目的，是要把農民也變成『無產者』。（雖然共產主義者要堅持祇把他變成一個『自由的勞動者』）他此後的經濟及社會地位，將完全與城市中的無產者一樣。他因爲這種新的組織，政治權力逐漸增加；他會不會有一天在政治上與城市工人立於對抗的地位，并打破無產者獨裁的局面？這些有趣的問題常常值得一個旁觀者的深思。但是共產主義者并不感到困難。他們是祇顧目的，不顧

困難的。集產農業給他們一個農業化的機會，并且一勞永逸的解決了糧食缺乏的問題。此外，集產計劃的實行，可以消滅了農村的私產制度，宗教，舊式家庭，及許多舊文化的壁壘。它掃清了走向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的道路。

最近蘇俄對於集產運動的緩進，是由於共產主義者已看到激變的危險。他們決定用漸進的方法，給農民相當的時間及機會來跟上這個大的運動。但是他們並沒有放棄他們的目標和計劃。他們不過是想小心些進行，并且還要顧到社會的結果。事實上，他不能放棄集產的計劃猶之乎他不能放棄蘇維埃政體一樣。使幾百萬已經加入集產的農戶再回到私人耕種的地步，那簡直是自殺。

現在蘇俄的農民是正在一種懷疑及希望的交戰之中。

## 十一 無產者

我們先看一看革命前的無產階級是什麼情形。最多我們祇可以說大部分時間他是離開鄉村的。他往往是一半的農人，冬天到城市裏去工作，夏天又回到田間去。他吸慣了城市的氣息，但他并不

愛它。他是在城市裏，但是他并不是城市的人。他的需要，沒有人顧到；他是僻街陋巷的居住者，文化的棄兒，文化社會——歌場，舞榭，藝術劇院，博物院，及大學中，沒有他的份兒。因為和城市的接觸，使他變得比農民更爲個人的，更爲世界的，更爲堅決；并且往往有機會使他識字。

他是一個興味，思想，態度，都極簡單的人，并且也不很勤儉。祇消看他在一個店舖或工廠裏工作，你就會想到爲什麼俄國會有這樣的俗語，『工作歡迎傻子，工作不是狼，它不會再逃到森林裏去的。』他沒有日耳曼及瑞典工人那種深刻的責任心，及誠實的觀念。他得嬉戲，便嬉戲；敢偷閒，便偷閒。燒酒是他最大的娛樂。你傍晚到貧民區的小酒店，或街上去看一看，在一個星期日或放假日，你隨處都可以看見醉倒的人。他們往往較農民手頭有現錢，同時離酒店及政府所設的燒酒店又近，所以無產者也比農民喝得兇。喝酒對於他，簡直和疾病對於一個農人一樣。

他往往是一個亡命徒。他不求別人的寬容，也不寬容別人。他見了打架，永不畏縮。他打的時候，在腰部以上，他打你；在腰部以下，他抓你，咬你，踢你，非打到你出血受傷，完全屈服才歇。他乘着怒氣做去，不受任何的限制。他挨打，也像打人一樣的爽快。他伏在地上，臉抓破了，衣服也扯破了，一點氣力都沒

有了，然而他仍不肯認敗或求饒。他是一個受慣刑罰的直布羅陀人。

無產不是他的理想，然而却是他終身的命運。他從來不想放棄他的職業，自己另創一個事業。他也沒有這種機會。假使他積下一注錢，他一定在附近鄉村中買一塊田地，或一所房子。與歐洲的無產者相較，他是最不希望將來變成他自己的主人翁的一個。他的職業，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也跳不出他職業的範圍。

他是一個沒有政治經驗的人。他生活在那樣的重負之下，使他沒有機會去得政治經驗，及發展他政治的能力。非但是缺乏教育，他已往在社會上的地位，也使他不能在政治生活中出人頭地，他能做一個小城市中的警察，或類似的事情，但很難做更高的事了。在革命的宣傳中，他比農民更了解政治的重要，但是他的經驗，并不比農民多，並且他也有像農民一樣的對一切政府的本能的仇視。

他，很清楚的，是一個沒有歷史背景，沒有文化，沒有家世，沒有政治經驗，沒有一種社會習慣，而祇有些不值得贊美的個人習慣的人。可是現在他是蘇俄的主人翁！表面上是共產黨統治，但是共產黨中有一半以上是無產的勞動者。黨雖然是他的領袖，然而也是他的奴僕。他之對黨，猶之乎燃料之於

機器，陽光之於植物，沒有他是不行的。

就拿政治方面來說，他已居於很高的地位。這可以使蘇俄成爲現世紀的一個神跡，也可以成爲一個笑話。我從來沒有遇見一個重要的蘇維埃主席——與美國的市長或州長相等——而不是從無產者或工廠的勞動者出身的。在司法界，工業界，教育界，及合作事業中——處處無產者都掌握着他舊日所夢想不到的大權。「無產者」一字，幾乎就代表了一切正善及真實。無產專政，無產教育，無產意識，無產藝術，無產文化，無產法律，——這些名詞，處處會來打動一個旅行者的聽聞。不是基督教的，也不是俄羅斯的，而是無產階級的權力，光榮，優勝，——一切都是他的。

讀者一定要懷疑，蘇俄爲什麼要把這樣一個言語舉動粗暴，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擡得這樣高呢？爲什麼要把他作爲新社會的基本及理想人物呢？因爲，共產主義者以爲祇有他才具有建設集產社會的各種特性。他是天生的革命者。他是沒有私產——就有也很少——的人；他對於資產階級社會，沒有什麼依戀；他對私產制度的文化也沒有什麼既得的權利；他沒有發展佔有一切物質東西的慾望。此外，他又是一個天生的唯物主義者。他整天和「物」接觸，他在「物」的世界中生活着。他眼看

礦石，粘土，木頭，石塊，經過科學的方法及科學的工具，就變成了機器，及其他實用的東西。他用他的手，他的筋肉，他的靈魂，來接觸物的現實。對於他，抓住唯物的人生哲學，自然是較爲容易的事——而那種唯物的人生觀，就是集產社會的基石。

同時他又是一個生產者。馬克斯主義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切財富皆生於勞動，所以勞動者有分配它的權利。他工作的性質，也使他容易發生共產的思想。他的職業，根本就是一種共產的職業。不像農民或普通的手藝人，他並不是一個人就做完一件東西，很多別人和他合作，才能完成他的工作。他是那大規模的生產計劃中的一個參與者；他的工作，是鏈子上的一個環；而他自己，也變成這個社會的鏈子中的一個環了。

他既是一個沒有私產，完全依賴工資生活的人，他和他的同伴之間，就有一種共同的利害觀念，使他的階級意識，特別強烈。他易於聯合，組織起來，一致與有產階級抗爭；他能在一個共同的目標及命運之下奮鬥；所以他是一個天然的階級鬭爭的戰士，理想社會的建設者。他智識的落後的確是他改造社會的阻礙，然而他的環境改變之後，有機會讀書，有機會表現他的能力，有機會負起責任來，他

就會慢慢的改進的。他將要改變他自己的面目，并改變全人類的面目。這就是共產主義者的理論。

目下他在蘇俄比任何種人的物質享受都高。雖然日用必需品時常仍有缺乏，然而他的生活程度，從戰前起即已有明顯的提高。那不是一個美國人的生活程度。五分錢及十分錢的商店，就能使美國的無產者滿足了。然而俄國的無產者，對此并不注意。我們如果拿俄國工人及美國工人的生活程度來比較，那是很不適當的。我們祇有拿它和革命前一比，才能見出它在革命後的暴漲。

在伊凡奴伏慈納斯克城中我曾問過一羣無產階級的婦人，她們革命後生活上最大的改進是什麼？她們毫不躊躇的同聲答道：最大的進步，就是不必再留外面的人到家裏寄宿。她們加重的說，這些寄宿的人是舊日婦女最大的痛苦，他們兩三個人輪流的睡在凳子上，桌子上，地板上，每月付一兩個盧布。現在無產者仍可招人寄宿，然而不像以前那樣人多了。

這種情形當然不是每個工業區都是一樣的。有些地方，客棧裏每個空地方都擠滿了人，兩三個人輪流睡一張舖，沒有被褥，在世界最壞的空氣中睡覺。在蘇俄的工業城市中，滿佈着污穢的街巷，——那是多麼污穢啊！然而改革的運動已在開始。此外，有一大部分的無產者，已經搬到蘇俄最好的房



子中去住——以前資產者的家，或新建的工人宿舍。擁擠當然仍舊免不掉，尤其是在城市中。許多很大的家庭，住在一間房子裏，幾家合用一個廚房及廁所。然而擁擠對於蘇俄無產者並不是什麼新的現象。他感到新鮮的是那些自來水、電燈、和私人的浴室（雖然有時幾家合用一個）。我們到伊凡奴伏慈納斯克，拔古，沙爾加，斯丹林格勒，及附近莫斯科的許多工業中心去，就可以看見現代式的城市。是正在建築中：現代式的街市，現代式的房子，大的窗戶，寬大的房間，自來水，陰溝……：……：往往每家都有浴室，電燈，及暖氣管——這些就是無產者的城市。蘇俄革命後許多新蓋的房子，都是爲無產者住的。在住的方面，沒有比無產者更優越的人了。

星期六的傍晚，或放假日，在公園裏可以看見許多無產者在那裏玩，穿着現代式的衣服，帶領子的襯衫，胸前飄着領帶。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令人驚異的一幕。當我到烏拉山（Ural m.）的斯凡特樂夫斯克（Sverdlovsk）城中一個小公園中散步，草地和走道上都是無產者，穿着現代歐洲式的衣服，短統的皮鞋，——即使穿着靴子，也是把褲子放在外面了。

我不由的很有趣的想起，僅僅在幾年之前，無產者還把現代式的衣服——尤其是領子與領帶

——看作資產階級的一種嗜好。在那個可怕的時期中，有多少人因為結領帶而被監禁，而被刑罰。真的，那就是一個不帶領帶的人，對帶領帶的人的革命。在舊日，無產者在星期日穿着長靴和一件輕便的外衣，把褲子塞在靴統裏，已經很滿足了。現在非但他對領帶的仇視，已經消滅，並且這已成爲他們的風尚——我疑心這甚或是成爲他們的一種驕傲。

此外他又有多少別的特權。當我在耶古茲克 (Irkutsk)——這個西伯利亞的老城——的時候，有一天我請丹麥電話公司的一個丹麥人和我到本地的小河中去划船。我們到了雇船的地方，一個看管的人，問我們是不是工會的會員。我們告訴她不是。她很抱歉的說，不能租船給我們。可是她覺得因爲我們是外國人，如果肯到工會去請求一下，一定可以允准的。我們不願再回到城裏去麻煩，所以祇好放棄這種飄泛於無產者的遊艇中的快樂，眼看成羣結隊的工人，飄着紅旗，按着手風琴，高歌歡唱的，很快樂的向河中流去。

我們到無論那一個工業城市中去，就可發現，非但是遊艇，其他公園，娛樂場；有時劇場，電影院，也莫不由工會管理。無產者可以從那裏得到入門券，別的人就不要想享受這些。

在教育中，無產者也享着優先權。無產者祇要程度及格，他就不必憂慮大學中有無空額。甚至於連學費都不必擔心。如果中央政府的津貼名額已滿，工會也可以供給，使他不致因經濟困難而輟學。他大學畢業之後，也無須顧慮職業。他用不着爲找職業而荒廢一天的光陰。他會很自然的投進一個與他所學相近的國家事業中去，祇要他有些才能，立刻就會升到較高的地位。

醫藥設備是蘇俄最講究的，他可以隨便去要。醫院也是蘇俄設備最全的，他也可以免費去看病。社會保險給了他殘廢時生活的保障。每種事業都付百分之十七的工資，作爲疾病、殘廢、老年等保險金。假設他是一個肺病患者，他立刻可以送到一個最講究的療養病院中去，不用費他分文。假設他是神經衰弱，需要氣候的改變，及特別的醫藥手術，他也不必擔憂，一切都有人供給他。許多舊的及革命後新蓋的療養病院，都是專爲工會會員而設的。

他的工作時間，也常常在縮短。在煤礦中工作的人，現在每日工作減至六小時，普通與健康無甚關係的工業中，也由每日八小時，減至七小時。如果現在的計劃，都能實現，到一九三三年，七小時工作將成爲普通的現象。工人每年還有兩星期的假期，假中仍領工資，有時他可以到特設的別墅中去避

暑，也用不着他付錢。

不論從那一方面看，無產者從革命以後的，確有很大的收穫。他是蘇俄最特權的階級。他的生活保障，比誰都穩固，生活也一天天的變得安適。蘇俄所有最好的教育，娛樂，房屋，——尤其是社會上的尊嚴，都是屬於他的。當一個人想投身於一個工會，一個大學，或一個軍校，別人一定先問他的出身。如果是無產者，立刻就可以得到允許，否則便一年半載的擱置下去，有時更簡捷的予以拒絕。在法庭中，審判官也往往要問被告的出身，如果是貧民，或與貧民有關係的人，判決就比較輕些。在蘇俄「無產者」一字，已成爲一種最尊貴的記號了。

貧民同時還是新社會中的標準人物。有一次我問兩個土拉 (Tula) 的女孩子，爲什麼她們每日賺很多錢，而不買一頂帽子？『因爲，』她們中間的一個回答，『如果我們帶了帽子去擠在人堆裏等買東西，一定會被那些人推出來的。』這與她們事實上是否無產階級毫無關係。因爲土拉城的無產階級婦人，還只有很少的人有帶帽子的資格，她們便有被稱爲布爾喬亞的危險。又有一次我問另一個女工人，『爲什麼你不穿你母親遺留給你的皮衣呢？』

她的回答是：『因為，我如果穿皮衣，一定會失業的。我一定會被人叫作布爾喬亞。我得等着，等到無產階級的婦人，都能穿皮衣的時候。』

這是很清楚的：男子現在可以用硬領和領帶，因為無產階級的男子，已經都用它們。女子當然也可以帶帽子，穿絲襪，穿皮衣，等到貧民婦女也都着用這些的時候。在大城市中，無產者濻雜在很多的入口中，他那種侵犯別人個人興趣的暴政，還不甚顯着。但是在純粹工業的區域中，一個人最好不要把他的生活，推到超過無產者太多的程度。布爾喬亞一字仍舊有它銳利的爪牙。我想在全俄，私人的汽車，大約也不過一百輛，並且都是破舊不堪的。汽車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玩藝，雖然摩托自行車已經頗受人尊敬了，並且因為政府要鼓勵修築好的馬路，才鼓勵無產者購買摩托自行車。一個黨報的編輯告訴我，無產者很有希望將來被鼓勵着去買福特車，到那時買汽車當然不致於被人目為不光彩的事了。

有一次，我在一個工業區中遇見一個年青的新聞記者，他買了一匹馬，每天午後騎出去玩。後來有人到國家政治警探部去告發，經過一個很長時期的檢查，才宣告無罪。爲了免去麻煩，他終於又把

他的馬賣出去了。一個人在蘇俄無論做什麼事，尤其是在無產者的社會中，一定要特別小心。無產者的眼睛永遠是睜得那樣大，他的嘴永遠預備着詛咒人。

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對於社會及個人的習慣，有像蘇俄的無產階級那樣大的權力的。其結果雖然也有可取之處，然而也有使人不可樂觀的地方——不但是個人處處感到無產者的壓迫而已。在蘇俄沒有複雜的客套，祇有很簡樸的禮貌；除非是對外國人，這是他們另眼相待的。政府很努力於此，無產者倒也不是一個一竅不通的笨學生。不過他不能在一夜之間改造他的靈魂。他不能完全洗去那些像衣服上的泥跡一樣的舊習慣。他現在仍舊是缺乏那種有禮貌的行爲的基本，他仍舊喜歡說很粗野的言語和喝酒。啊，他是怎樣一個酒鬼！他對個人的人格，仍舊沒有一點尊重。他對別人仍是那樣粗魯，尤其是對待一般無產階級的人。例如：世界那一個國家有像蘇俄那樣多紛爭和口角的？在電車上，店舖中，辦公室中，無論什麼地方（除掉舊式的智識階級所住的地方）都有不斷的揮拳舞足的爭鬧。一九二八年夏天，當高爾基到蘇俄的時候，他就公開的說出我國一般人民精神之慘淡，好像無產者永遠是在一種慍怒之中一樣。這種生活的慘淡，一半固由於階級鬭爭，一半也由於無

產者處處把持着一切的原故——他究竟是一個沒有家世的人。

然而間接或直接的，他終於做了這個世界的主人，並且他非常妬視別人。他的階級意識及戰鬥的精神，無時不想暴發。他很容易憤怒和拚命。他已經得到了許多特權，他將以生命來擁護它們。在這一點上，希望讀者不致誤解。他現在在這個新社會中，已有一種既得的利益，對於一切來侵犯它的人，他將流血來和他抗爭。

生產方法的集產化，也許會把蘇俄陷入於一種經濟的危機，非恢復私營事業，不能繁榮。那時無產者因為要解救自己，也許會讓步。但是他仍不願有損他革命後所得的各種特權。即使共產黨不再執政，國家大政仍不免要和他商量。他也可以放棄他的政治主權，也許有一天農民會從他手中把政權奪去，然而要他不干涉國家的工業，就好像要把農民從田地上趕出去一樣的難了。

不管集產主義及共產黨的命運如何，無產者現在總是把握蘇俄命運的主人了。

『他的信我沒有看完，在我眼前，就現出一個粗暴的農夫，紅的山羊式的鬍子，像禽獸一樣的步伐。』這是一個農家的女孩子寫的，而她所描寫的就是她自己的父親。讀者也許要不由的問他自己，這樣一篇罵父親的話，恐怕是一個好事的作家的作偽，不見得真是一個人的感情的表現；並且不由的就會想到託爾斯泰的『安娜·卡倫尼娜』(Anna Karenina)的故事。

這個美麗的婦人爲一個很有名的紳士所愛，並且和他結了婚。她和他很安靜的同居了十多年，生了一個男小孩，她說不出的喜歡他。因爲她的兄弟和他的妻子吵鬧，她到了他們的家中在那裏她遇見了一個美男子——一個軍官。她爲愛所克服，在回家的車中，受了情感極度的激動，啊已經到了聖彼得堡！她的丈夫——仍舊是和平日一樣的樸實，大方，和深愛——在車站上等她。當她看見他時，她自己驚呼道：『啊，我的上帝，他的耳朵怎麼會生得那樣長呢！』這一句驚呼，傳遍了全世界；作者對於人類的反應的深入的觀察，得到了普遍的讚歎。安娜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在他所有求愛及結婚的時期，她從沒有看到他耳朵的大小和樣子。直等到她的感情爲另一個男子所激動後，她才看到這些，而使她感到十分的厭惡。



一個情感的激動，往往可以改變我們的思想。在蘇俄你到處都可找到這樣的兒女，他們受了革命狂瀾的激動，變得對他們的父親很厭惡，祇看見他們的『紅的山羊式的鬍子和禽獸一樣的步伐』別的便都看不見了。

我會忘記那個我在烏克蘭一個農村的合作社中所遇見的，生着一對隆起的頰骨和一雙蒙古人的眼睛的烏克蘭少年嗎？他以前是一個地主家的趕車腳夫。當革命爆發時，他加入紅軍，做了一個軍官。一個冬天的晚上，他在山中巡夜，他的手下捉了十五個農人到他面前來，他們身上都佩着鎗。他們並沒有開鎗打人，然而他們都不是紅黨。裏面有一個是他自己的叔叔。他自己承認他那個叔叔是一個很仁慈的人，並且是七個小孩子的父親。他的手下問他怎麼辦？他的回答是『鎗斃』。他繼續的說：『我的叔叔放聲大哭起來，但是我不願等他來求我。我一踢我的馬便跑開了。』他說時神色自若——一點沒有悲悼和遺恨。共產主義者賽里查 (Seryozha) 在小說『水門汀』中說：『你因我而被捕，使我特別感到快樂……我將用我的鎗親自送你走。』讀者知道這賽里查是不會畏縮的，他將言行一致的做法……在別一本俄國小說中，書中的英雄說：『我的母親到我跟前來哭，求

我搭救她被政治密探部捕去的兄弟，但是她的眼淚顯然引起了我的反感……那是資產階級的眼淚，奴隸的眼淚……她知道她的兄弟是一個投機商人，但是她說無論如何我是他的外甥，怎能眼看着他被人鎗斃？』然而他不能看別的投機商人都被鎗斃，而令他的舅父獨免於難。

這使安特列葉夫娜 (Klara Audreyevna) 不得不感到他的兒子是已經不像他的骨肉了。她還想引起他的母子之情。她到底是他的母親啊！她求他設法要還那些被官人沒收的東西，她求他搭救一個他兒童時代的朋友——他的罪名祇是爲了他是一個多數黨 (Menshevik)——并給他一點無論什麼的事情做……他知道他有這種權力。他不是一個黨員，并且在政府的地位很高嗎？但是這些話對他很覺刺耳，聽去非常乖戾。他是一個讀書的人。他很客氣。他不願故意的使他母親傷感。她現在是一個寡婦，並且生活很可憐。他教她寫一張請求書，讀者一定也可以想到他是決不會看的。他祇是把它團了擲在字紙簍裏……

在很久以前，屠格涅夫書中的虛無主義者巴查樂夫就批評他的朋友阿卡底 (Arkadij) 說『你缺乏一種大膽和很毒。』巴查樂夫在精神上就是布雪維克主義者的祖宗。大膽和很毒！一串可怕的聲

音，好像都回應着這幾個字。沒有這種特性，你在革命中就算不得英雄。你非但是革命的阻礙，并且是一種危險。你爲了情感釋放一個仇敵，他在你心中，也許可以使你個人失敗，使你的事業失敗。共產主義者發誓在戰鬥時須有大膽和很毒，這些比食物還重要，——真的和空氣一樣重要。

一個俄國人在最近的一篇小說中說道：『再生是和死一樣可怕。』我想也許比死還可怕些呢！因爲你要再生，一定要先死一回，像完全沒有活過一樣的死一回——慢慢的，遲延的，很痛苦的死。於是你成了一個新的人。你和那些沒有同你一樣經過這種生死關頭的人都已疏遠，於是你會看出你父親的紅的山羊式的鬍子，和像禽獸一樣的步伐。你能看見你的叔叔被你處死而忍心跑開。你能在你母親的傷心之淚中，看出那是資產階級的情感，奴隸的眼淚。你能眼看你的兄弟被捕而歡呼，并且幫着處死他……你能叛逆你的父親，你的母親，你的兄弟，與你同在西伯利亞的雪野中跋涉，同坐在一間牢房中的朋友。假設有像哥薩克一樣的暴烈的性格，你也許能像巴貝爾 (Babel) 的小說『信』 (The Letter) 中的遜卡 (Senka) 一樣，親自動手來處死你的父親。在另一個最近的俄國小說中，一個書中的人說：『你必須要學得看太陽和血，都同樣的不眨眼睛。你不要怕太陽會傷了你的

眼睛，血會污了你的靈魂。」不，你一定不能怕這些，不然你就會完全失敗的。你一定得有大膽和很毒。你一定要不爲任何事物所動搖，堅定你的信心，拿定你的方向，這樣在你生活中許多疑難之點，都會自行消除。你一定會出人頭地的堅強。

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即以「堅忍」勝過世界任何國家的革命者。他祇知道前面的目標，其餘無論什麼東西——如各人的幸福，生命等——他都不管。往往別的東西和主義相較，他總不令他的主義受一點損害。共產主義者脫卡千葉夫 (Tkachev) 在『巧格力』(Chocolate) 中對他的同志楮丁 (Zudin) 說：『你得明白，不是我們，而是我們的主義……：不要想我們因爲和你有什麼仇恨，才決定鎗斃你——除此以外，實在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救你。』當他離開楮丁的時候，他知道永遠不會再和他見面了，他臨別的幾句話是：『兄弟不要憤怒……：勇敢點吧！』對於死勇敢點吧，因爲我們的主義叫你死。共產主義者的堅忍，並不是因爲他缺乏感情而是正相反的，——因爲他的情感太熱烈，太高了，使他能夠不顧一切的習慣，友誼，傳統思想，一切過去的意識，而向一個簡單的目標前進。

他的確是一個奇怪的人。他已經深嘗過一切的痛苦和狂樂，所以他對任何事物都不感到恐懼。他受過血與火的洗禮，也像惡魔一樣的看輕生命，訕笑自然，覺得他自己是不能動搖不能克服的。他是世界上最富於自信的人，好像是全知全能一樣。任世上所有的人——科學家，哲學家，政治家，——都對他的思想和行爲懷疑，任他們來預言他的失敗，任他們怎樣恐嚇他，任宗教家怎樣咒罵他，他總覺得他們最後一定會屈服在他之下——他的熱情和憤怒的火燄，將使他們不得不降服。當我介紹杜威教授給一個青年共產主義者，他第一個問題，不是問我這位哥命比亞的教授以何著名於世，却問我他是不是共產黨員。我回答他杜威教授不是共產黨，他感到一種不快，也許可以說是一種侮辱。他說，一個這樣偉大的人物，怎能站在一個世界最大的潮流之外呢？布雪維克主義者覺得一個不能了解他這種真實，這種使命的人，不是呆子就是惡徒。

他祇看見他自己是在製造歷史的領袖。你告訴他，例如英美的情形，完全與古舊的俄羅斯不一樣，共產革命一定不會成功——這沒有用處。你告訴他，一個像他一樣的無產者可以有自己的汽車，吃飯時有餅吃，對棒球比賽比唯物史觀及無產專政更有興趣，——這也沒有用處。你不能使他相信還

有別種和平的方法，可以完成集產的社會。他不容忍別人的意見。他祇是深信自己。

他雖然固執，但是并不自私。在他的世界中，不容他有許多自私。因為團體與個人之間，有那麼許多相互作用，個人自私的傾向終被克服了；不然他就有傷身之禍。這也就是一般黨國領袖極力躲避公衆的理由。世界沒有再比蘇俄那樣難見政治領袖的國家。他們根本不願對公衆說話，除非在特別的日子，不得不說。新聞記者，尤其是美國的，無論他多麼敏捷，也沒有用處。他們的門永遠是關着的。蘇俄共產主義者這種自信，似乎不是個人的特性，然而又很明顯的是他人格的一部分，使他在行爲上變得更亡命，更殘忍。

他的道德標準是雙重的。他做是對的事，別人做就錯了。有一次一個黨中的秘書對我說：『當我們的人殺死一個反革命者，我們稱揚他；當你們資本主義者殺死了我們一個黨員，我們就得詛咒他了。』這是很確實的。當日耳曼社會主義者議決捐款給德國海軍添築一隻巡洋艦，他們是世界上最壞的惡徒；但當蘇俄的工人捐款爲政府製造鐵甲車時，他們就是革命的聖人了。

你對布雪維克主義者的固執還有懷疑嗎？不管偒特曼（Schiedemann）及麥克唐諾本身多麼

誠實，在他們眼中，都是惡徒，都是靈魂破滅的人，因為他們的社會行動，沒有按照布雪維克所定的範圍去做。你同他一同前進，不然你就反對他。你接受他那種人類革命的方式，不然你就是他的仇敵。你或者贊許階級鬭爭的方法。不然你祇配站在歷史的廢物堆中。假使你立在他前進的路上，他一定要把你剷除。有時不經審判，僅用行政的手續，這須看你所犯的罪名，和當時革命空氣是否緊張而定。即使你是脫洛斯基，——曾經用你的天才和人格把一個烏合之衆變成一隊常勝軍，使你的主義終於得到勝利，——假設不按他們的語去做，也不能倖免。你將被禁閉到中亞細亞的一間小屋中去。你的文字不准印行。你的生活極苦。你在孤獨中懺悔你的罪過。你一定得認錯，不然就得這樣憔悴至死。假使你反對這種待遇，并繼續起來反抗，那你就會被他們逐到國外去，任你流落，任你用你的聰明去躲避你已往許多仇人的匕首和鎗彈。

即使你有拉戴克 (Radeck) 那樣尖銳的筆，和拿破崙那樣的勇氣，祇要你偶一走錯步伐，立刻便會送到西伯利亞去，在那裏你可以讀書，可以寫作，可以回想過去，但不能批評或表示憤怒。不管你過去的成功如何，你的道德如何高超，不管這個時候是否正需要你這樣的才智的人，祇要你不從從，

便能危害這個運動和黨中的一致精神。所以就使得你離開——除非像卡門納夫 (Kamenev) 及齊奴葉夫 (Zinovyev) 那樣下顏屈膝，表示悔悟，並允許以後永遠服從。不然沒有一個人能夠倖免，無論何時主義需要對某人施以殘暴，那個人立刻就大禍臨身了。

你初和他接觸，蘇俄共產主義者，好像是一個奇怪的謎。他以無產者為他使命的基礎。他對生活整個的態度，是形成於一種提高無產者的地位，及超過其他階級的願望。蘇俄的新藝術，無論是小說，戲劇，或舞蹈，如果要想使他有價值，一定得描寫無產者流血的奮鬥和最後的勝利。誰在麥耶霍劇場 (Myerhold Theatre) 看過『中國，怒吼吧』 (Roar China) 能夠忘記那一羣汗黑的苦力的悲憤，當他們抽籤決定一個人去叫那白種人的海軍司令處死的時候。誰看過『黎亞城一婦人』 (Woman of Byzanz) 的影片，能在他的腦中消去那些俄國農民生活的恐懼和醜惡的印象。即使是託爾斯泰的『黑暗之力』 (Power of Darkness) 也沒有像這個影片一樣的給我們一個更痛苦的境。當你看見斯丹尼斯拉夫斯基 (Stanislavsky) 的『鐵甲車』 (Armored Train) 你不暇再問那是不是偉大的藝術，偉大的文學，你祇對那些泥汗的農民，感到一種同情的熱流，使你覺



得應當也加入他們那種復仇的流血的爭鬪。

你的感情被激動了。你爲那受壓迫的人感到一種熱烈的同情。但是共產主義者一點溫柔的心腸都沒有。他像一個劊子手一樣的冷酷。他永遠是那樣冷靜，那樣深思。祇有當他談起小孩子的時候他顯得溫和一點。所以有『兒童是生命之花』、『兒童是生命之快樂』等等口號。此外好像他便別無情感了。他所有的情感，不是對他所要擁護的人的一種愛戴，而是對他所要打倒的人的一種仇恨。一個俄國批評家批評小說家尼基福祿夫 (Nikiforov) 說：『他的作品是要在讀者心中產生一種大恨的大愛』(A great love for a great hate) 尼基福祿夫自己使他小說中的英雄這樣說：『我常常希望一個人用一種大恨來肅清了這個大地，讓他生出一個新的文化和新的生命來。』這些話拿來描寫一個共產主義者倒十分相宜。假設愛新的人類社會是他最終的目的，但他所用的方法就是對舊的人類社會的一種仇恨。他對他的仇人決不容讓絲毫。他沒有公平的精神麼？那資本主義者對他永遠是一個敗德的賤民。他的教堂，他的宗教，他的人道主義，都是浸在平等之中的。他根本沒有那些做人的道德，值得無產者來尊敬。

共產主義是真正俄羅斯的統治者。在國家及地方的會議中，他非但爲蘇維埃政府，並且爲一切工會，學校，報紙，工業，商業，決定了大政方針。沒有生活的一面，能夠完全或部分的逃避他的干涉。他在無論那一方面都可以決定一切，指導一切。

這樣一個地位給了他無數特權。除了無產者以外，他是蘇俄最優越的人。他也用不着憂愁職業。黨部，工會，蘇維埃政府都在他的羽翼之下，他一定很快的就可以加入一種活動。又因爲他是在蘇俄最被信任的人，不久就可以升到別人上頭去。像無產者一樣，他在教育，遊憩，旅行方面，都有優先的權利。在蘇俄他的仇人叫他新貴族——一個剝奪別人的權利而自己享受的人。共產主義者也往往有利用他的地位報復私仇，或謀私人利益的。當我寫的時候，我的腦中就現出許多黨員利用他的特權，壓迫非黨員的印象。

但是天下發光的東西，不見得都是黃金。共產主義者所享受的特權，也不是完全便宜的事。我想世界上恐怕沒有比他要受更嚴格的訓練的人了。他永遠不是他自己的主人翁。他時時得服從黨的命令。但是黨中物質的收穫是有限的。他也許身居國中最負責的地位，然而物質報酬并不見得最豐

富。他的薪金永遠是有限的。一百二十五個盧布一月，或一百十元美金，這是他最大的工資了。李脫維諾夫（Livinov）戚千林（Chicherin）都是這些錢。斯丹林也祇有這些錢，脫洛斯基，列寧，齊奴葉夫在他們最顯赫的時候，也不過是這麼多錢。最近已有例外例如，工程師，最多一月可以得到四百盧布，技藝工人有時所得更多。同樣的，文學者也可以按他作品的多少，得到國家的津貼，這種津貼並沒有個人最多的限制。所以有許多作者收入很豐。但是——

這種收入還要經過黨中一番剝削。一個月入五十盧布的黨員，每月須付黨中百分之二；五月入一百盧布者百分之二；一月入一百五十盧布者，百分之二；月入在一百五十盧布以上者，百分之三。因為文學者收入最豐，所以他們每月須付黨費百分之四。在這種黨費之外，黨員還有其他義務，如新建一個列寧紀念像，送紅軍一架飛機或一列鐵甲車；給一個農村的小學買一架鋼琴；在俱樂部中新砌一架爐灶，給育兒院買一架電影機；給外國一個殘廢的同志籌一筆津貼金；給國外某處罷工的工人一筆資助金；給那些流氓設一個收容所——不斷的要你輸捐。一個共產黨員不管他收入多高，總是弄得僅足糊口。他不能有一點儲蓄，即使是道義上許他這樣做——當然，事實上并不如此。黨中對這一

點特別嚴厲。他不能容許你有一點違戾。他對欺騙的人，絲毫不能寬容。有一個我認識的工廠經理，他因為得了委員會的同意，停止雇用他的辦公汽車，而每月多領一百盧布的車資，非但失了他的位置，並且為黨中革除黨籍；他現在是一個完全沒有希望的人了。他永遠不會再起來。他已犯了萬惡之首——為物質的享受所引誘。

一個共產黨員的工作又多麼繁重啊！別人的工作都已做完時，正是他工作開始的時候。他永遠是一個社會服務者，須把他的閒暇完全用在許多無報酬的社會工作上。他一定得讀書，教書，講演，討論，偵察，手中挾着一個皮包，整天各處奔走。他永遠有許多會議等着他去參加；他永遠不知道他明天在那裏。黨把他呼來喚去像牛一樣。今天他在這個城中，明天又在另一個了。今天他還在莫斯科，明日他也許已到西伯利亞中心的伯耶去了。他今日還在中亞的熱帶，明天也許已到歐洲或亞洲的極北去了。今日他是工廠經理，明天又變成公事房裏的小書記了。他是世界接受命令最多的人。他時時為黨中呼召，而不能拒絕。他永遠得預備服從不管他是誰；如果不服從，立刻就會被黨中革除。

他個人的生活，也須受人干涉。黨中要他的行為，永遠十分謹慎。他可以用他的特權，把一個黨外

人驅走，來安插他自己的朋友；他可以侵奪黨外人所住的房子，給他自己的朋友。但當被黨中發覺的時候，一定會受嚴重的處罰。在犯罪上，黨員所受的制裁，往往較常人爲重。黨員尤其最不能受賄。一個普通的人受賄，至多是監禁；然而黨員如果受賄，便不祇如此了。這要看受賄的多少，及結果如何了。如果在那法官及兩個陪審員的心目中，以爲情形較爲重大，往往便得處死。

在私生活方面，他也得守着嚴正的法則。他的生活不能奢侈。奢侈本身并不見得是一種罪惡。但是在這革命期間，很少人能有奢侈的生活。他不應該過求逸樂。他的時間是太可貴了——他的精力也是如此。他可以偶然喝一杯燒酒，但是不能沉溺於酒。那樣能破壞他的康健及引起黨外人的譏笑。他不能賭博。他一定得絕跡於賭場，不然，管理委員會就會彈劾他。跳舞本身也不見得是不道德的事。不過他能把他的時間用在更有用一點的事業上。他最好是不跳，即使在俱樂部中。到莫斯科飯店（*Bolskaya moskovskaya*）或列寧格勒的歐洲旅館去跳舞，也得小心。那些是「耐潑曼」及外國人的遊樂之處，不是爲共產黨員而設的。那裏的空氣都是汗濁的。他當然一定還得與一切宗教儀式及宗教會社隔絕。假設他的父母是資產階級，他一定得和他們脫離，并更改他的姓名。他一定得

和那舊的世界，和所有在舊世界中的人脫離，不管他和他們有什麼關係。一切收入及行爲，他都得十分小心，不要想逃脫管理委員會的眼光。早晚他一定會被發覺，如果犯了錯，立刻就會受到重罰……

最緊要的，他必須時時準備着應付一個國內或國際的危機。他一定得時時預備着犧牲——時時，才智，身體，及生命。我常常想，一個共產主義者與其他的革命家的根本不同之點，就在他時時準備着殺人和被人殺。他不能妥協，他知道當他的仇人捉住他時，也不會妥協的。蘇俄許多有才幹的黨員，當被黨中派到外國去做某一種工作時，往往不能預言他是否能夠生還。在國外他的仇人太多，都伏在暗處等他。在戰爭的時候，——他相信是不能避免的——他一定得估據最危險的地位，并且他知道如果他被敵人俘擄，不是立刻處死，也須受凌遲的苦楚。他知道他不是尋常的仇人，他仇敵即使是同種族的人，也會對他用極度的酷刑。在內戰時期他已得到充分的教訓了。他已經知道那些農民，哥薩克白色的軍人，怎樣對付他的同志們——吊在樹上，活埋，往往叫他們自己掘他們自己的墳墓，或把他們倒栽在沙阱中。他知道在戰爭時期這些恐懼和痛苦，都會等着他的。

雖然祇要你信仰共產主義，就可以加入共黨，然而仍有許多人——無產者及智識階級——排

個不入。他們寧願放棄那些特權，而不願來担負黨中這些繁重的義務。他們知道當一個人入黨之後，立刻變成了別的人。黨成了他的父母，他的奴僕，同時也是他的主人；干涉他的職業，他的閒暇，他的教育，他的遊樂，他整個的生活，有時甚而至於他的死……：

然而在精神上，共產主義者恐怕是世界上最滿足的人了。理論，感情，權力，勝利，佔據了他整個的生命。在這些上面他寄託了他的心，他的靈魂，他的生命，他整個的將來。他對最後的勝利，永不懷疑。世上沒有一種宗教能像共產主義那樣預知命運的。他確信他能勝過他一切的仇敵，雖然難免要受許多挫折。資本主義的國家可以在暗地裏破壞他的革命，用科學家及軍事家發明新的武器來應付他。爪哇，中國，匈牙利，奧大利亞等處的革命，也許可以在鮮血中消滅。蘇維埃政府本身也許可以打倒；它的領袖們也許可以捉來鎗殺了掛電線桿上。然而最後的勝利，像水尋找他的平面一樣，終會出現到表面上來的。關於這一點他像宗教上的根本主義者（Fundamentalist）相信最後的天國終為降臨一樣。

所以我說，共產主義者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他沒有失望，也沒有懷疑。對凡爾塞條約，波蘭走廊，

國際聯盟，英法海軍條約，國際間軍事的聯盟，法西斯蒂……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憂慮。在『新共和國』(New Republic)『國家』(Nation)及『曼却斯特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s)上所引爲極度悲觀的事，於他并不感到一點不安。一切使斯班格勒(Spangler) 凱塞林 羅素所懷疑及不解的問題，於他都很漠然。他對自由主義，及信仰自由主義的人，都沒有存什麼希望。他對他們那種依賴人類的善性及社會公道的觀念，覺得和教會勸人做禮拜和慈善事業一樣的可笑。他對資本主義者及資本主義的社會，祇有輕視，沒有憂慮。對他好像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屬於他自己的；一個是屬於與他不同的人類的。他不信有什麼中庸之道——他也不信這兩個世界間有可以妥協之處。『假使你要安心一志，』他說：『假使你要精神上愉快，——快到我這裏來，因爲你站的地方總不免時時要受到精神上的疑難和痛苦。祇有我才能担保你靈魂的安定。』

他不祇是在蘇俄的一個新人。他是那樣果敢，冷酷，大膽，有時對他自己及他的親戚，更爲嚴厲；對現社會的俠勇，美德，傳統思想，社會習慣，安樂等，一概不放在眼中。他已沒有俄國人舊日那種懷疑，自責，和忍從的精神。像奧勃樂莫夫(Obloinov) 路丁(Rudin) 拉弗萊茨基(Lavretsky) 拉斯科



利科夫 (Raskolnikov) 那樣自己鞭打自己的靈魂，使自己和別人都感到一種幻滅，痛苦，以至於死的人，現在已經不見了。像屠格涅夫的利沙斯 (Lizas) 那樣失戀之後，一個人隱居於僧院而度着苦寂的生活的人，現在也已不見了。像契柯夫的『櫻桃園』 (Cherry Orchards) 『房耶斯叔叔』 (Uncle Vanyas) 『三姊妹』 (Three Sisters) —— 那些哭得那樣美麗，痛苦得那樣高貴然而無用的人，現在也已絕跡了。

這個可怕的破壞者，蘇俄的共產主義者，祇少有一點，他可以自信——他已在俄國人民心中養成了一個新的意志，一個新的能力，一個新的智慧。他使俄國人的每個神經組織變得堅硬。他是一個魯莽的人，從不多想他已往的錯誤。他最後的目的也許不能達到，財產也許永遠不能成為社會的公有，他也許為一種更大的勢力驅出蘇俄的舞台；但這決不是一個像凱命斯基 (Kerensky) 及米約科夫 (Milyukov) 那樣的白面書生，專以文采為武器的人。那是在共產主義者的熱情，理論，權力，勝利之下所造成的一個新人，非但在思想方面，在意志及行為方面，也較他更為偉大，更能犧牲，更有建設及征服一切的能力。

## 十三 一般青年

『那是一百零七年，』在阿萊克塞託爾斯泰 (Alexey Tolstoy) 最近的小說中一個人這樣說。讀者立刻就知道，這不是指紀元前或紀元後的一百零七年，而是指十月革命後的一百零七年，這些，很有趣的，和一個俄國女孩子所說的話完全暗合——她是一個莫斯科大學的學生，當我問她怎樣可以完成一個革命青年的精神生活時，她說，『祇要我們永遠記住，對於我們，這個世界是方在開始！』

世界方在開始！除掉科學以外，其他在十月革命以前的東西，都不值得什麼。在十月革命前人類是在暗中摸索，拿些幻象及烏託邦來欺騙他自己。他沒有一點現實的觀念。科學使他對於智識有一種新的觀解，使他與自然更爲調和，但是科學的成功，更增加了人類財產及享受的不平。那唯一趨向真正的光明及真理的運動——法蘭西大革命——在血中消逝了。無產者，我們時代的英雄，仍舊是不自由，仍舊沒有把生產的方法奪到手中。所以人間充滿不平的現象；那整個的過去就好像是一個

充滿了恐懼和晦暗的歧路，偶然有一星半點的革命的光亮，在中途閃爍。

我們試想一想這樣一個人生觀的意義。試想一想蘇俄青年攻擊外面一般深入青年靈魂的精神文化的居心。外面所有的宗教，道德，家庭，民族主義，社會公平等等，對他都沒有什麼意義；不能鼓勵他，也不能指導他。那些標準，傳統思想，精神的昇華，蘇俄青年都把它們像廢物一樣的推在一邊。雖然列甯曾經說過，新人物仍不免要接收舊文化中有用的遺物，一般青年對於過去及習慣於過去的生活及思想的人，已經沒有一點尊敬。

所以，在蘇俄，一般青年與老年人的衝突——父與子的衝突，較世界任何國家皆為強烈。在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中所描寫的情形，與一般現代青年對於尊長的行爲比較，還是很溫和的呢！在歐洲或美洲所謂的『少年人的革命』與蘇俄的情形比較，也有小巫大巫之感。在蘇俄沒有兩個世界，是比青年及老年隔離的更爲遠的。兩個人也許住在一間房子裏，在一個桌上吃飯，在一個屋下睡覺——也許在同一張床上，像在蘇俄常見的一樣——然而他們中間有一條溝，沒有東西可以使他們調合。無論在鄉村裏或城市中，我從未看見過一個家庭父母和子女不在一種爭鬥的狀態中的。蘇

俄一般的青年很可以誇耀的說，這個無產者征服一切的時代，紅色的十月革命的時代，是向所謂『十誡』和『黃金法則』(Golden Rule)文化澈底的一個挑戰。

我所說的當然是那些有新信仰的青年。這樣的青年固然把持了青年生活的重要部份，但是并不能包括其全部。此外有兩種青年，我在這裏一定得提到，因為那是一個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悲劇。在社會及文化的立場上講，這兩種青年完全沒有相像之處。然而他們兩個，一個出於自願，一個出於強迫，都被同樣的封鎖到沒有人的世界中去了。他們已失掉舊文化的立足，同時又沒有抓住新的。他們覺得這個新的時代是一種不可逃脫的命運，然而在精神及社會方面，他們和它隔得很遠。兩個都飄浮着。一個是找不着一個安身之處，一個是不願意在一定的地方停住。

這後一派的青年，就是造成蘇俄街上許多無賴青年的主要分子。他們常常做些傷風敗俗的事，如在街上調戲婦女，危害社會。他唯一模仿革命青年的事，就是那合羣的生活。但是他們的舉動，像一個狼羣。他們作起惡來，總是成羣結隊的。我有很多記載這種事實的書，很污褻的叫人不忍卒讀。這種青年沒有學校，沒有家庭，沒有宗教；革命的輿論對他也失去了制裁的力量。他任着自己的衝動做去，

沒有一點責任心，也沒有一點恐懼。無論在那一個國家，當然都有這種反社會的青年，不過在蘇俄較別國更爲顯著，也許是因爲舊世界的消滅，一切平衡的力量也即消滅的原故。

這種青年因爲根本不齒於社會，他本身倒也很快樂。他用他自己的力量，並且爲他自己而生活着。至於另一派青年的命運，因爲他們過於注重外面的議論，就格外不幸了。他各處流浪着，爲找一個安身的地方。他接受了革命，他并希望做它的朋友，然而終被推在一邊。在前進的隊伍中，沒有他的地位。在革命者的眼裏，他的已往是一片黑暗。他們大部份是以前的智識階級及有財產的職業者，在革命者的眼裏，他們多少已爲他們的家庭環境所沾污及軟化了。這種說法也不見得完全沒有道理。這派青年在精神上，也和他們的尊長不同。然而他們並沒有和家庭宣告脫離；他膽太小，對於生命看得太重，不能破壞它像折一個樹枝一樣。他對尊長的仇視和懷疑，祇用溫情來應付，往往情願和他們一同受罪。他有智慧，有野心，有理想；他也想自己做些事業。他追求那更高的生活，不在一般革命者之下，但他更想發展他自己的能力。但他終於碰壁了，他知道這是與他無分的。他很願意跑到國外去，然而又沒有錢，並且出國也不是常常可以得到允許的。即使他被收容在某一種較高的文化機關裏，他也

感到像身在異邦一樣。革命機關決不會容他參加他們內部的生活。他一個人納悶，終於弄得意志消沉，勇氣全無，他變成一個失去了自信的人，他的感覺漸漸變得遲鈍，病態因而發生。結果是自殺——槍毒藥，有時很少的是自縊。

然而我在本章中所要說的是一般革命青年，唯有他們才是和革命不可分開的一部分，這是蘇俄富於創造的青年，俄羅斯將來的主人翁。事實上他們現在已經是政府中的有力分子。蘇俄今日最有趣味的現象，就是一般青年地位的升高。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即使是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青年人有像蘇俄那樣在司法，行政，及經濟機關中負着重任的。許多別的國家都重用成年的人，因為他們的經驗及判斷似乎成熟些——這種政策是蘇俄顯然反對的。他們不需要那些舊人物的『成熟的判斷』，除非在專門技藝方面。他們寧可用沒有經驗的青年，以為他們至少有一種革命的精神。

這種青年他們本身就是一個自己世界。他們有嚴密的組織，嚴格的訓練，和發展個性的機會。十六歲至二十四歲的青年，有『共產青年團』(Komsomol)，七歲至十六歲有『拓荒者』(Pioners)，在七歲以下的兒童又有『十月革命者』(Octoberists)的組織。『共產青年團』因為是

青年中較長者組成，所以就是一般青年的領袖。它的總部，圖書室，學校，俱樂部，運動場，小劇場，公園等設遍了各處；有時還有它自己的榮譽法庭。它的報紙，流通極廣。『共產青年日報』（Komsomolskaya Pravda）是他們在蘇俄最有生氣，最勇敢，最有趣的報紙。也是蘇俄唯一富有幽默意味的報紙。還有一種月刊，叫『青年衛報』（The Young Guard）也充分表現着激進的精神。它的出版部出版了許多動人的革命小說，都是描寫青年的問題及幻想的。

從這各方面，和開會時的討論中，青年們把他們的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敗，都盡量的表露了出來。他的聲音是在蘇俄最響亮，最清楚的一個——同時也是最複雜的一個。

革命青年唯一的目標，就是預備他自己怎樣到一個共產社會中去生活，所以他的一切態度和標準，都要和這個社會適合。最緊要的是努力去適應那種政治信仰。政治信仰是永遠放在生活的前面的。它是生活的領導，生活的鼓勵，同時也是生活的偉業。這就是政治教育在蘇俄超過其他教育的理由。在蘇俄的學校中，尤其是初級的，無論什麼科目都是政治的；甚至於地理，地質，和生物。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即使是法西斯蒂的意大利，像蘇俄那樣把政治的理想及熱情灌輸給一般青年的。我

想世上也沒有一個宗教運動，有像蘇俄共產黨那樣訓練一般青年的。青年人非但須使他信仰這種政治理想，并且要他把感情完全寄託在這上面，爲它戰，爲它死。

因爲蘇俄人民感情的豐富，他們已把這種信仰織進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非但已把它看作一種哲學，一種理想，并且還看作一種南針，一種鼓勵；許多已變成了社會習慣。他們覺得那不僅是一個浪頭而是海的本身，新的浪頭不斷的起來，不斷的起沒，不斷的變化，……例如世上那一個國家的青年人有像蘇俄青年那樣的世界頭腦？那烏克蘭的少年當他說烏克蘭話時，他意識到他是烏克蘭人，喬爾治亞（Georgia）的女孩子當她說喬爾治亞的土話時，她自己知道她是喬爾治亞人，但是他們所受的是養成國際頭腦的教育，他們不因爲種族及色種而歧視，任何一個人。他們和非洲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印度人握手，正像和英，美，德，任何白種人握手一樣。在日本的地震，莊納斯堡（Johanneburg）的罷工，爪哇的一個亂事中，他們都一樣的輸捐來援助，那些奮鬥及受苦的民衆……因爲他們同是民衆精神的一部份。你祇消去看一看蘇俄革命青年的遊行，你就立刻可以了解到這種強烈的國際精神。沒有民族的驕傲，也沒有國旗和國歌；沒有一點種色的歧視，所有在蘇俄的各種各



色的人，穿着他們自己不同的衣飾，男和女手拉着手，一同前進，大家都在一個紅色的旗幟之下，蹈着同一個調子，唱着同一個歌，『國際』(International)。

我不由的要懷疑，當蘇維埃主義在各國失敗後，這種國際的精神，將來會不會仍變成一種新的民族主義。種色的觀念，也許不會有，但這是因為俄國人從來沒有領略過像安格魯薩克遜人對於其他人種的一種高傲。在種族方面講，他永遠是很謙卑的，除非是對待猶太人。反猶太主義雖然有強烈的宣傳來反對，但它仍深入於一般俄國人民的心中，甚而及於一般無產階級。我們不要忘記蘇俄現在的國際精神，是建築在信仰蘇維埃主義上的。假設蘇維埃主義不能推行到蘇俄以外去，假設『蘇維埃』成爲與『俄國』同義的字，那時『俄羅斯』一字即使已經不用，而改稱『蘇維埃聯邦』，然而那總是一個地理及政治的單位。這種無產者的同情，會不會地方化，而變成一種新的國家觀念呢？共產主義者對於別人說蘇俄正在發展一種新的民族主義，一定會大笑不置。但這不是能隨便推託過去的事。蘇俄很可以變成一個最信崇民族主義的國家。特別是一般青年，他們都相信『蘇維埃聯邦』是人類的先導，是世界上從未發現過的最神聖的制度，最神聖的主義。在過去有許多國家。

雖然與蘇俄的動機不同，但也是想它自己超越其他的民族。我們知道它們這種國家民族的成見，怎樣使它們的隣邦痛苦和憤怒。歷史不會再現麼？我們現在在蘇俄偶然已聽見這種不幸的呼聲——雖然很微弱——那都是『蘇維埃聯邦』的結果。實際上那些較年長的革命者雖然宣傳他們的國際主義，像什麼新的聖經一樣，然而他們時時留心不讓這種國際主義的情感，發展到民族主義的路上去。

我們無論如何往好處說，蘇俄青年所創的國際主義，至少并不包括社會思想的寬容。事實上正相反。這種國際主義中，顯然包含着社會思想統一的意味。在這種階級鬭爭已成爲一般人民的精神及情感生活的一部分的情形之下，結果當然是那樣的。青年人從小就相信世界人類是有兩種階級：一個無產階級，一個資產階級，永遠在鬥爭着。他們在學校中所讀的歷史，不是國家的歷史，而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聖經和宗教，他們也看作是講階級鬭爭的產品。最好的作家，就是能了解階級鬥爭的意義，并且與受壓迫的民衆有深厚的同情的作家。託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葉夫斯基，法郎士，笛更斯都要受這種標準的檢討。他們受歡迎或攻擊，完全看他們對階級鬥爭同情的深淺。總之，一切文化都

是階級鬭爭的結果。常常當我告訴蘇俄青年我是一個作家時，他們立刻就要問我的政見是什麼？他們真正的意思是。我是否反對階級鬥爭。他們不能了解一個對於政治很有興味的作家，會對政治毫無成見的。對於他們，階級鬭爭是一個魔術師手中無往而不用的小棒子。

祇有在生活的純粹人情方面。蘇俄青年的確有顯著的進步。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青年人是這樣獨立，這樣不聽尊長的指導的。沒有一個國家的青年人，是這樣軍隊化，這樣習慣於兩性平等，性愛自由，廢棄宗教，服務社會，壓制個人的佔有慾，提高勞動者的地位等思想的。勞動非但是他們生活的基礎，並且已成爲他們生活的一部份。它非但是一種方法，並且本身已成爲一個目的了。你的隣近，沒有一個磨麵廠，或是魚場麼？青年人一定得知道那些行業的技術，和它對於社會的供獻。你隣近沒有一片專種棉花，穀子，菜果，或牧畜的農場麼？青年人一定得知道它的經濟及社會的價值，並且知道怎樣使這兩者增加。你隣近沒有一個紡織工廠，一個五金行，一個煤礦，或一個電氣化的計劃麼？青年人一定得知道它的政治，經濟，及社會上的意義。一切的教育，都要與勞動和建設有關。

祇有在把理論應用到實際的行爲上去時，蘇俄青年才遇到許多難解決的問題，或得到許多教

訓，有時暴露了革命的許多有趣味的方面。

一個合作社的社員自殺了。他是一個勤懇的工作者，然而他自殺了，他相信人有死的權利，然而一個革命者是祇許信有生的權利的。他怎能很光榮的安葬呢？革命者能不能認識這個人的優點，雖然他缺乏革命的本質？究竟怎麼辦呢？

一個女孩子沒有和她的同伴們商量，私自去墮胎了。墮胎當然是合法的事，但是一個革命者一定得想着他對於新社會的義務。墮胎能夠使一個女子減低她的健康，因而不能對社會盡她最大的力量，並且革命需要女人生育，這又怎麼辦呢？

一個青年和一個女孩子發生了愛情。他是一個無神論者，然而她却不是。他非常愛她。他相信在結婚之後，他一定能慢慢的感化她。但目前她却很固執。她非要經過宗教儀式，不願和他結婚。他有權利答應她麼？假設他有，並且不和他的同伴商量，他就和她到教堂中去結婚——像某一個青年所說的『祇委屈了兩個鐘點』，黨中對他怎樣呢？如果把他趕出去，黨中立刻少了一個有力的工作人員；寬恕他，又是和『黑暗的勢力』妥協了。究竟怎麼辦呢？

一個青年結婚了，然而他不常和他的妻子一同來開會。他這種態度是不是合理呢？假使讓她仍舊閉在家中料理家事，和看管小孩，那所謂兩性平等的原則，又怎樣解釋呢？在這種情形之下，黨中又怎樣辦呢？

一個前泰（Gentile）的青年，侮辱了一個猶太的女孩子，因為她不願做他的情人。這種青年，應該怎樣改造他，使他不為傳統的種族的仇視所沾染呢？

一個青年和一個『耐潑曼』的兒子做了朋友。這本身並不是一件不正當的事。一個『耐潑曼』的兒子，也許將來會變成一個激烈的革命者。一個有階級意識革命青年應該和他結交，並且把新的信仰，灌輸給他。但是這個革命青年到那個『耐潑曼』的家中去得太頻繁了，並且受了他朋友的父親許多禮物——例如一個金鍊，他拿了到『同志』面前去誇炫，引起了許多人的嫉妬和譏笑。他是不是應當接受一個『耐潑曼』的禮物呢？假使可以的話，以那一種禮物為限呢？這種限制又從何劃起呢？

在日常生活，蘇俄青年會不斷的遇見許多怎樣的問題，一定要在他自己心中去找解決

的方法，在別處是得不到的。他不能和他的尊長去商量，因為即使他們已身列革命階級，但也決不會和一切舊思想和舊標準完全分離的。許多黨中的同志，假使他們仍沒有失去他們少年時代的心情，也可以替你解決許多疑難，但是往往不能接近實際的生活，例如固執的查金（Zalkind）有一次替人解決疑難，說，一個革命家也可以和資產階級的女兒結婚，正像可以和猩猩結婚一樣。青年都願聽從年長同志的話，但常常對他們的話，不得不以一笑報之。他要解決他的問題，還是得自己去摸索；自己從經驗和痛苦中去選一個適當的解決。

然而他究竟是一個快樂的青年，也許是世界最快樂的。他有他的缺陷，很衝突，很可憐的，無論那一個人都可以看出。然而他很驕傲，很輕慢。他對於他自己的目標，理想，武斷，都太自信；他覺得其他的人都還在黑暗中生活着。他當然沒有機會來了解外面的世界。他個人沒有機會和外面接觸，而他所得到的報告，又都是經過政府的選擇，適合於它的政治作用的。他往往很野蠻，對於他的仇人，一點憐憫都沒有。他也像無產者一樣，還得教訓他，使他知道個人人格的價值，和尊重他人的人格是一種美德。世界上還有許多東西等着他去發現，羨慕，和戰勝呢。

然而在他的各種權利方面看來，他正像一個青年人所能做到的那樣快樂。內戰，災荒，黨內的分裂，國際的危機，已經使他不知道什麼叫咒責和貧困了。他養成了一種不是自責，而是輕視物質享受的美德。他和三四個甚或六七個人共住一間房子，也不會埋怨。他的破靴，也許補了好幾次，但他仍不會怨恨。他對黑麵包和菜湯已很滿意。他生活着，不是為家庭，不是為父母，不是為親長，不是為宗教，不是為過去，而是為革命和將來。他沒有像費茲前洛（Scott Fitzgerald）的『憂愁青年』（Sad Young Man）那樣的疑慮，也不是漢明衛（Ernest Hemingway）赫克斯萊（Aldous Huxley）所描寫的那樣的孤寂的人。他充滿了信心和生存及奮鬥的熱望。『你看見太陽多麼有力的照射麼？』最近俄國一個小說中人這樣說，『這都是為了我們的原故！』是的，對於一個革命青年，好像太陽和一切自然界的事物，都和他聯了起來，公同來創造這個新的世界。在同一小說中，另一個人說，『我們要生活着，用我們每一個神經，每一個筋肉，來參加這個大的鬥爭，大的創造！』這很明顯的說明了革命青年的生活的態度。

將來也許失望會使得這般青年失去了他對主義及他自己的信心。假使真有這樣的一天，蘇俄

也許會發生一種自殺的流行病，爲世界上所從未見過的。但是現在，這種信心還像圓月一樣，很高很光明的照着大地呢。

## 十四 智識階級

農民，無產者，共產主義者，青年——對於他們，革命是一種紛擾，同時也是一個希望；是幻變，同時也是一個理想的實現。最要緊的，那是一個個人人格的發展，社會地位及智識的提高。但對一般智識階級，我們說什麼呢？對於他們，革命帶來的祇是紛擾，沒有希望；祇是幻變，沒有理想的實現。那不是一個人格的擴大，而是人格的緊縮；不是社會地位的提高，而是降低。那祇是一個大的破壞。

智識階級——在布雪維克時代的俄羅斯，那是多麼空虛的一個字啊！

在舊日，它又是一個多麼高貴，多麼可尊敬的字啊！

這個字從俄羅斯創行出來，風行了全世界，但是它在沒有一個地方能得到像在它的生地那樣的顯赫。它在俄國無論什麼地方都能引起尊敬和羨慕。農民也許怕官吏，但是并不怕智識階級，無產



者也許痛恨資本家，但并不恨智識階級。沙皇對於反叛他的人也許會怒吼，但是對於智識階級，總是抱着一種愛慕，同時又有些嫉妬的態度。智識階級本身也許就是官吏，就是反叛者，就是資本家，但是祇要他是智識者，他就變成一個高貴的，超越時代，政治，制度，人格階級的精神的代表，一個對於人類生命及靈魂，都有着溫暖親切的同情的人。

智識者就是俄羅斯的靈魂。我們看見『智識階級』這個字，立刻會想起郭歌爾 (Gogol) 普錫金，契林納雪夫斯基 (Chernyshevsky)，海成 (Herzen)，拜林斯基 (Byelinsky)，多勃洛留博夫 (Dobrolubov)，屠格涅夫，託爾斯泰，陀思妥夫斯基 (Dostoyevsky) 及其他許多燦爛的文學者。他們非但是靈魂，并且是俄羅斯的正義和光榮。智識者是懷疑家和受大苦難者；是大發現家和大創造者；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和勞苦民衆的愛護人。因為他，才使外面的世界對『俄羅斯』有一點尊敬。他創造了所有俄羅斯對於人類關於文學，藝術，音樂，社會運動的供獻。像一個俄國作家在他的劇本中所說的，智識者是『理想世界的帝王，』我們可以加一句，『並且沒有一個人間的君主敢來和他爭奪皇位的。』他，假設你說他不是住在這個世界上的話，那他就是在一個夢和幻想

的世界，一個希望比失望多的世界中了。

革命的本身，大部分是他創造的。在無產者還沒有發生的很久以前，他就夢想着革命，并且真的去戰鬥，因而上了斷頭台。我們只消看一看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革命』，假使沒有智識階級給他同情，才智和靈魂，那暴躁的無產者的命運，又將怎樣呢？無論無產者現在覺得怎樣有力量，怎樣頭頭是理，但當他在俄羅斯的幕前初現時，祇是一個半開化的農民。他沒有智識，懷疑，對於外界的一切，都有一些畏懼；他對理想，革命，及新的文化并沒有一點興趣，他祇知道他自己，和他那狹小和懶惰的世界。他沒有比幾個盧布更重視的東西了；他一文兩文的帶給他家鄉的人們，爲的是積起來買一把新的犁，一頭新的馬，或是一方新的地。他知道什麼是階級鬥爭，是階級意識，是無產者專政，是蘇維埃，是自由，是文化，是人格，是科學，是技術，甚至於是馬克斯，是物質主義，——這些他常常掛在嘴邊的，使他醉心的名詞？在智識階級沒有像慈母一般的撫弄他，爲他拭去眼上的眼污，讓他看見那新的世界，新的思想，和新的刺激以前，他知道什麼——甚至於他自己？

然而在革命成功的時候，無產者征得了政權之後，他——這個教師，領導者，鼓勵者——反而被

擯到幕後和陰影中去了——他祇能旁觀，服從，但永遠不能命令。他的才智是被利用了，因為無論如何他終究是有智識和創造力的人。但是他本身永遠被人懷疑，覺得他像一個善於犯規的倔強的小孩子一樣。

下面是一個很能代表智識階級這種境遇的故事：我有一次去請一個青年的工程師和他的太太一同到莫斯科大飯店去赴一個美國人的舞宴。他搖搖頭，拒絕和我一同去。『那是一種祇有你們外國人才能享受的奢侈。』我想盡了方法來說動他，他仍舊是那樣堅決。他解釋說，『我們俄國的智識份子很知道我們自己的地位。我們一定得時時留意。』他並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所以他無需受黨中嚴格的規律的拘縛；他也不是『耐潑曼』，所以也不致於時時受到非難；他從來沒有贊許過任何反革命的運動，所以他也不會有反革命的嫌疑。他是一個很出色，工作也很勤懇的工程師，并且和黨政當局也混得很好。但是他仍舊得『知道我們自己的地位。我們得時時留意。』這些字裏實在包含着一種悲劇的意義。無疑的他是一個感覺靈敏的人，所有的智識階級都是這樣。他們常常把一件事的結果看得格外的大。我國有一句俗語說：『畏懼有一雙大的眼睛』，而俄國智識階級的眼睛是比

任何人都大。他是變態的神經過敏了。他覺得他時時立於一種被監視的地位，所以他不得不過分的小心一點。

他在政治方面也不見得是善於反抗的人。他很早以前就和這個新時代妥協了。他也并不願意看蘇維埃政府再被打倒。他對破壞已經是壓惡極了。他怕戰爭，更怕那血肉的爭鬥。他已經弄得神經衰弱了；他現在需要一個恢復的機會，讓他在和平的空氣中工作。有一次我在西伯利亞遇見一個俄國很有名的考古學家，他對我說，『我們正在重新開始，又有人說要和英國開戰了，你真會有戰爭嗎？』他說着，一壁看着他的工具，聳一聳肩，眼中閃着悲苦的淚光。智識階級是真不願再有紛擾了。他怕再有鬥爭；他願意讓時間與命運來補充那些必要的改革。

然而對於無產者，他仍是一個十月文化所遺留下的人物。無論何時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像一九二八年春天探礦工程師的審判，立刻會引起一般無產者的盛怒，要用了很大的力量，才能把他壓住。事實是，無產者對於智識階級的懷疑，祇要它存在一天，便永不會消滅。那是根深蒂固，很難改善的。那是一個有力的具歷史的因果的情感。

無產者及其產主義覺得，智識階級在十月革命中不與他們響應，便是永遠不能寬恕的罪惡。雖然革命的重要領袖們都是智識份子——現在也還是這樣——但是在羣衆中，智識份子總是和他們離得很遠，並且是反對十月革命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歷史還沒有使他成熟，能夠適應這種巨變。他在教育上及心理上都沒有一種準備，好像一個小孩子到戰場中去作戰一樣。他根本是一個富於情感的人，對於人類的個性，有着很深的尊視。他是一個所謂『軟腸人』，沒有那種兇辣和很毒。我們想一想陀思妥夫斯基的拉司科尼科夫（Raskobnikov）當他用斧斫殺了那個老而且貪的典當主人——在他眼中她祇是一個『小蟲』——他發現他已殺死了他自己。在俄國的智識階級中，很多像拉司科尼科夫一樣的人呢！

在社會革命黨中，不少行動很劇烈的智識份子，他們常常向沙皇，總督，大臣，將軍等擲炸彈及行刺，但這些都祇是例外。對於他們，恐怖祇是一種亡命的舉動，因為他們已沒有法子使那些暴君略檢他們的淫威。然而整個的說起來，世上沒有再比俄國智識階級怕流血的人了。

此外，他又是一個私產制度文化的產兒。他的精神也許在社會主義的烏託邦中飄浮，然而他的身體仍埋在私產的現實之中。雖然他也有革命的熱情，然而他終究是一個具有中產階級的氣質，貪圖安逸，謹慎，怕粗暴，善於妥協的人。

無產者在他們爭取政權的征途中，叫他也去參加，他因恐懼和厭惡而畏縮，這還不是極自然的事嗎？他也曾和無產者一同前進過，但是他覺得，在沒有流血就把沙皇打倒之後，還要革命，便是極大的愚蠢和瘋狂了。他眼前所看見的，祇是戰爭，祇是死亡——紛擾，痛苦，失望，一切所愛的人們的滅亡。無產者為奪政權的前進，對他祇是一個劫運。在他的想象中，俄羅斯的一切，都要不可收拾的毀滅了。無產者現在握着政權。那是一個沒有歷史背景，沒有教育，沒有傳統思想，沒有政治經驗的人。以前是穿着泥污的靴子，指甲縫中都滿了黑泥的齷齪的農民，現在他手中抓着五千萬人的命運。對於一個智識者，這簡直是一個笑話。他不禁的要笑罵他們。當他們真正的握了政權，他也不願和他們合作。他放棄了工廠，事務室，及實驗室中的職務；他罷工，他破壞。他不願加入這樣一個他以為是反對他，反對俄羅斯，和反對全世界的潮流中。他確信無產者是祇會用他的手來破壞，不會來建設的。他等

待着那布雪維克勢力的崩潰。他相信那是一定會來的。他希望它來；同時按歷史的法則講，它也一定會來的。但是它終於沒有來；無產者仍是俄羅斯的主人，智識階級誤信了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領袖們的戰鬥力，持久力，和精神的富力。

然而無產者已經懷恨。在他試驗的時期，智識者負了他。智識者是反叛者，是他的仇人。有一時期『智識階級』一字在蘇俄是和『資產階級』一樣的罵人的話。但是列寧，能夠撇開個人的情感，看見現實，他覺得把智識階級擠到牆上去是很危險的事。他高唱與智識階級妥協——好在無產者正需要腦子，智識者也需要麵包，於是他們講和了。他們聯『手』來建設這新興的俄羅斯——但不是同『心』。

有些共產主義者曾對世界宣言，說無產階級與智識階級間的隔閡，已經消除了。智識者在新社會中現在是一樣的快樂。但是他是真的快樂麼？他能夠快樂嗎？我這裏所說的，當然是指那些生長在舊環境和舊理想中的智識份子。

在政治方面，他是無足輕重的。他對這個新朝代很忠順。他一切行動，都十分小心。他有時甚至弄

於表示他對於已往的悔恨。然而在政治方面，他沒有參加的權利，也不常爲人想到。假使他願意加入共產黨——不然他便不要想有一點政治的勢力——一定要經過兩年的考驗時期，不像無產者那樣六個月就夠了。政府中重要的職位，他是沒有份的，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假說他沒有失去公民的資格，他能在選舉的時候投一次票——那就是說，在一個蘇維埃的代表選出時，你能舉一次手，表示你贊成或反對。但是這是一個多麼無聊的事；機械一般的動作，一點興奮都沒有。

他的生活程度顯然的降低了。許多智識職業，像教師和醫生，薪金都特別的低。在蘇俄沒有人像教師和醫生那樣強烈的不滿於他們的報酬的了。有時智識分子也有賺最高的工資的，那就是那些專門家（*Spetsy*）——機械師，建築師，化學家，經濟學家，事業組織家。然而他的工資也有一定的限制，很少有每月超過四百圓的。並且很奇怪的，他的用錢的機會，也須受到限制。他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租一所喜歡的房子，客廳，臥室，兒童遊戲室，一應俱有。因爲房屋的缺乏，這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他不能再隨意的定閱外國的雜誌和書籍，他也不能隨意的到國外旅行，去看一看新的事物，得一點新的刺激。即使他積下很充足的旅費，國家銀行因爲國內金融的緊縮，也決不會替他匯兌——著名的學者



當然不在此例——這樣，他便去不成了。他也不能再到熟的成衣店中去定做一件上等英國呢料的外套或衣服。在俄國沒有這種料子；除非是海關偷運進來的貨，那價格也就可觀了。至於像餐服及睡衣等等——他倒無須煩惱——大概他已忘記這世界中還有這些東西。他根本沒有機會再穿這些，除非赴一個最上等的外國人的宴會；有時即使是那樣大的宴會，他也會感覺到平常的衣服是較為舒服了。

最不幸的是那種不安定的心理——經濟狀況的不穩固。一個工程師，建築師，化學師，或專門家，用不着顧慮失業，國家會使他相當的安適，以便他可以努力去工作。總之，他是容易隨便為別人所排擠下來的。但是地位較次的智識份子，如藥房經理，醫院院長，合作社經理，校長等等，那些所謂從事於次等的文化事業的人，便時時在憂慮之中了。全職的新聞記者，差不多人人都在擔憂，不要觸犯了上邊，失掉他的職業。其他如在政府及工業界當小差事的，及常務的辦事人員，都是同樣的可憐，這種情形，恐怕祇有一天的壞下去，決不會變好的？

這是當然的現象。共產主義者以為，一般舊日的智識階級都太個人，太驕傲，對於社會革命沒有

的。他們說他不能適應和改進無產階級的文化。但是那些新的文化，他當然覺得還是在一種變遷的時期中。他堅持文化不是同泥娃娃一樣的能夠卽夜做成的。他堅持須等時間，努力，傳統思想，社會狀態，情感等來把它逐漸濾清；如果他胆大一點的話，他一定會對他們說，那些新的新文化是太不合他的脾胃了。它們缺乏舊文化那種美術的精細，和社會的美感。但是無論怎樣煩惱，他仍不敢說出來。

自這個新朝代之來，恐嚇便是對智識階級唯一的試驗。其中包括檢舉，紛擾，痛苦，眼淚，自責，和自卑。他沒有舊日的安樂和穩固，也沒有舊日的尊嚴。農民，無產者，共產主義者，青年——每一種人都已造成了一種新的自尊，新的尊嚴。他們發現或恢復了他們的『我』，但是智識階級得把他的『我』推到幕後，使它不爲別人所見。它在新的社會中沒有立足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價值。按心理方面講，這是一件極痛苦的工作。他得很堅決的和那些舊的習慣脫離，不然就得受那革命的輪子所壓擠。

革命雖然減少了他在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各方面表現的機會，然而也自有它的好處。那是痛苦，但同時也是一種精神上的清快。它雖然也許沒有帶來新的快樂，但至少已開了一種新的智慧，或新的理解的源泉。他以前雖然提倡人道主義，同情黑暗大眾，但實際對於勞動，並沒有什麼尊重。他從

來不肯把勞力的工作來沾汙他的手。現在他回想他以往的態度，不免會笑他自己。一個俄國最有名的科學家對我懺悔的說：『那真是寒酸！』現在假設他的隣居看見他背一包麵粉在肩上，或抱一塊木板在手中，他也不至於會感到羞慚了。他現在即便在刷洗他自己的窗戶，修補他自己的鞋子或爐灶，也不致於會感到一種矛盾或慌亂了。『是的，我今天晚了，』一個有名的文學教授對他的學生說，『因為我昨夜有客，又雇不起僱人，所以我得自己洗盤子。』學生都譁然的笑了。

同時破天荒的，智識階級開始領略到堅決和實際行動的價值。他那種古舊的漢母賴主義（*amletism*）雖然並沒有滅絕，然而已經不在他意識的前面了。生活在蘇俄，像出了閘的水一樣，很急的沖流下來，一路為人民都掃過了。智識階級立在這種急流中，不敢立住回頭觀望，或陷入幽思和躊躇之中。

最倖運的事，就是他還能住在國內。他逃過了那些流浪在外面的智識階級的殘酷的命運。他們流落在天之四方。他們雖然是熱情，真純，及過分的善於感應，但他們不能適應於隨便一個不同的文化。他不能在一個異國的土地上，安住下去，至少很少人能夠這樣做。他們握着拳呼叫，誇大恐嚇，但這

些都祇是失望和愚蠢的表現。他們隨着命運和環境旋轉。他們仍在帝俄——這個現在僅存在他們的記憶中的帝俄——的希望中生活着。他們是世人最寂寞的人；很快的就都變成無用的人了。他們的靈魂在萎滅。米萊茲各夫斯基（Merezkovsky），希比斯（Hippius），古潑林（Kuprin），安菲提洛夫（Amfiteatrov），米由各夫（Milyukov）都是一時世界的人物，現在都已在黑暗中消失，即是神仙打起火來找，怕也找不着了。

這些留在俄國的智識階級，不管他怎樣失望，怎樣悲哀，他究竟還在他的故鄉。雖然他嘗徧了一切的痛苦和侮辱——這恐怕要直到他的末日——但是他仍有他的快樂和希望。雖然他物質方面已和外面的世界隔絕，但他仍能在他的故國漫遊，他至少能舒寫，歌唱，及夢想那些他平日所喜歡的東西——農民，平原，森林，伏加河，高加索山，俄羅斯的天空，他已往的昨日，甚至俄羅斯的靈魂。俄羅斯終究是他的祖國，永遠親愛的母親。

他難免會想到他的末日已到——他的那些夢想和幻象，他整個的舊的世界和它一切的情感和美麗，它的紛擾和希望，它的悲哀和失敗，都已打破了。當他讀到契柯夫（Chekhov）的土成巴哈

(Baron Tuzenbach) 的話『非但是二三十年，即便是幾千萬年後，生命仍舊是和今日一樣。』他也許會苦笑。他知道這些話是多麼可憐的欺騙！他將大聲的叫出它的虛偽，一直到他的心裂開。人們可以一樣的飲食，睡門，像他們平常做過的一樣，但他們永遠要尋找新的目標，新的適應，新的理想，新的奮鬥，甚而至於新的愚行。他們在俄羅斯曾經這樣做過，無論是善是惡，他知道他們是不會失敗的。這個事實的證明——太現實了，是我們不能反對或誤解的——就是那些新的智識份子。

他不像那些舊的智識階級一樣有社會的背景，他是從民衆中產生的。他沒有那些靈敏，精細，和愛美的特質，他也沒有像他祖先那樣的才幹。他蓬髮垢面，生着一雙粗手，但是他有一個永不滿足的求知和征服的慾望。他身上發出塵土，煤灰，氣油，及風塵的氣味。他對南德森 (Nadson) 錫金普 (Pushkin) 雷蒙脫夫 (Lernontou) 等詩人，並沒有多少興趣，而對馬克斯，列寧，福特，愛迪生，萊 (Taylor) 等人最感興趣。當他約他的愛人去散步或划船的時候，他並不像舊式的智識階級一樣，向她唱些戀歌；他甚至不會問她是否讀過普錫金的『奧尼金』 (Onyegin)。他祇和她不斷的討論些煙囪，掣引機，發電機，城市，機械，工廠等問題；而那些女孩子也會聽得出神，像舊式的女子聽

男子向她門讀塔陽那 (Tayana) 寫給奧尼金的信一樣。

在歷史的意義上，舊智識階級也許可以用屠格涅夫的拉弗萊茲基 (Lauretsky) 的話，來向新智識階級慶祝道，『快樂一點，好好的玩吧！祝你的氣力日漸增長！生活在你的前面，你要生活是比較容易的。你不用被壓迫着起來尋找你的道路，起來奮鬥。在黑暗中升沉。我們很多人都自己替自己找了許多苦吃——不找苦吃的又有幾個呢？但是你現在一定得工作，做點事業出來。所有已老的人，像我一樣的，都要爲你祝福。』

## 十五 哥薩克

我現在是在俄羅斯南部一個有名的哥薩克人的殖民村 (Stanitsa) 中。那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很光亮，很和暖，輕風拂着樹梢。教堂的鐘聲，這是俄國特有的，很響亮的在你耳邊震動，餘韻在空氣中留得很長久，很哀沉，像一個孤獸的長號一樣。克騎番 (Kerchieted) 的婦女，無論老少，都是那麼健壯，臉晒得紅赤赤的，臂上抱着小孩，左右還跟着幾個，他們都在到教堂去的路上走着——一

個零亂的隊伍——大半都是婦女，很少男子。

我很悠閒的在街上走着，那麼闊，那麼舊，地面十分崎嶇，也沒有邊道，兩旁的小屋，都是用白灰刷的，祇有那院子裏的果樹，在這風景上添些色彩。這是一個大的殖民村，大約有三萬多居民，但是它像一所小屋一樣的安靜，在你走過的時候，連狗都沒有一隻來驚擾你。

直到我走進那個市集，我才發覺我自己已轉入一個新的世界。一大羣哥薩克聚在那裏——都是男子——消遣他們的閒暇。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啊！寬闊強大的背，直立着像俄國北部森林中無枝的松樹；真是地上的巨人，像格林姆（Grimm）及安徒生（Anderson）書中的人物轉世一樣。雖然天氣很熱，他們仍穿着羊皮和法蘭絨的衣服；無論老少，都帶一頂高羊皮帽子，使他們看起來格外高大，像隻原野的走獸一樣的可怕。他們的臉像燒紅的鐵一樣，又黑又寬，凸凹不平，額骨成了一個向上的坡，眉際的隙縫，都充分的表現了土耳其，韃靼，或其他亞細亞民族的血統；他總是有那麼厚的眉毛，鬚鬚，像水土豐肥的土地上的亂草。他們寬大的臉，經過風雨日光的侵蝕；他們的身體，不怕奮鬥，戰爭，和死傷。臉上都是堅強和自信，全無一點溫和，——除非是那些已經失去了哥薩克特性的老年

人他們都是很強大的人——沒有平胸屈背的弱漢。高大瘦削很隨和的人，臉上的深紋為鬚鬚所掩蓋，像一個大的流泉，和許多支流一樣；眼中閃出智慧的光亮，尤其是那種堅決自持的神情，使他們很驕傲，但也很可怕。一個人看過這樣一個哥薩克人的集會，也是一生不能磨滅的經驗呢。

那天早晨，在那個村中有一個村民大會——雖然不見得是革命後最重要的一次集會，也可就得到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了。許多重要的人物都來參加——克拉斯奴達（Krasnodar）這個區域中的京城）的新聞記者，黨部工作人員，農業及財政委員會派來的代表，及檢查長等等。他們來，為的是叫那般哥薩克人表示他們的疾苦和希望——甚至彈劾任何一個官吏都可以。名義上那是一個『自己批評』（Sams-Kritika）的集會，至少共產黨員這樣宣傳，這裏把許多官僚政治的內部的黑幕都揭開了。『說話啊，說話啊，』一個很高，臉很紅的女子，報紙的助理編輯，也是這個區域最善演講的人——這樣說，『沒有人會干涉你，或制止你的。這裏就是檢查長，他非但能保護你，并且你有什么委屈的事，他都要替你伸雪。』

這些哥薩克人立刻紛紛訴苦。好幾個鐘點的演說，來回的控告。大家爭論的正熱鬧，我偷偷地離



開了那個大的人羣，走到外面的一顆大的蘋果樹蔭下。我已離開那個村民大會，然而它的印象仍圍繞着我。他們現在也許願意和一個美國人談話，來探聽些一個他們所熟聞的國家的事情。於是一個老者問我是否喜歡哥薩克人，「他們簡直像野獸不是麼？」他說，「但是你還沒有看見他們發怒的時候。他們是最兇很的野獸，——真的老虎一樣。」

「是的，他們真是那樣。」一個女人的聲音，「老虎，多麼可怕的老虎啊……」她是一個中年的女人，生着一對晦暗狡猾的眼睛，一個和男子一樣的大下頰。在她的聲音之中，含着一種生氣；她的態度之中，表現着十分的自信——真是一個哥薩克的女人，她永遠是那樣毫無畏縮的和男子爭論，「噢，他們多能用他們的鞭子和刀子殺人啊！」

「我們殺了誰了？」一個飄着長鬚的老者憤怒的反駁她。

「誰？你知道，大叔——譬如學生和猶太人。」

「不要胡說，你這個婆子；這裏根本沒有猶太人。」

「我根本不是說在這裏，」那女人很快的回答。

「那你說在那裏？」他也很尖刻的追問。

「還要我來告訴你嗎？噢，你這個純潔的靈魂！在城裏——你不記得了嗎？你不要忘記了你的「

昨日」啊！」

「我從來也沒有參加過那樣的事。」

「你從來也沒有，是麼？」那女人一點都不退讓的逼迫，「別的哥薩克都這樣做。我親眼看見過他們，這些野獸！蘇維埃應該罰他們一下，他們才知道當他們用鞭子打人時，別人怎樣感覺……：……！」

「嗷，巴巴，停住吧！」那老者盛氣的呵住他，「不然這位美國先生要想你是一個傻瓜了。」

「讓他愛怎麼想便怎麼想，我說的是事實，你這個鬍子鬼知道。」

他很粗暴的拍了那女人三次，引得四周的人都笑了。於是有人問我在美國男子是不是也打他們的妻子。還沒有等我回答，就有一個頭上纏着一方手巾的女孩，燦然的開口告訴我一個她們隣居的故事——一個六十五歲的男子打他七十二歲的妻子，因為他和旁的男子調笑。她最後很嚴重的說，「他還恐嚇她，說要殺死她呢！」

『是的，你們女人都是聖人，你們永遠不打你們的丈夫的。』那老者又譏諷起來了。

『當然我們也打，』幾個女人同聲的說，『他們該打，我們爲什麼不打呢？』

『我昨天還看見一個女人打她的丈夫，』另一個人說，『那丈夫縮成一團，像一隻貓被狗逼在牆角上一樣。』

我們能聽見哥薩克人的談笑，這是很有價值的。尤其是我們能夠聽見一個他們同種的女子來提醒了他們以往的罪惡；這種罪惡是歷史上永遠不能磨滅及寬恕的。在這樣的村民大會中，聽到他們的率直熱烈的訴說，尤其令人興奮。它能給我們一個機會來了解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我可以說他們已經是被征服的人，恐怕永遠要這樣下去。假使他能從時代的壓制中逃出來，這他一定不像現在的哥薩克了。他的哥薩克王國也正像他所效忠的朝代一樣，現在已經僅僅是一種記憶了。

他在村民大會中的呼聲，就可以說是他降服的證明。你祇消想一想，一個哥薩克現在會來向你訴苦，尤其是關於租稅——在舊日他不用付一個錢，他女人所種的糧米都是他的。你再想一想，一個哥薩克爲得一點粗布得站在人羣中去等——在舊日當他走進一個店鋪時，人民都得閃開；非但是

布，即便是毛呢，綢緞，鴨絨，他要多少，就得給他。現在我們祇要看一個哥薩克的裝飾，便知道他是已經每况愈下了。即使在星期日，也再看不見他們那種奇怪的裝束——寬大的馬褲，胸前銀裝的彈藥筒，排成十字形的一口鐘，身旁照例掛着短刀，腰帶上掛着槍刺。

有一個星期日，我想請一羣哥薩克穿了他們的制服照一張像。不想全村三萬五千人中祇三個人有制服，并且他們都沒有短刀了！

這個曾經自空一切，以為他是超乎一切法律及自然的哥薩克，現在的確是為革命所征服了。他不能逃開它。革命用個許多無形的鞭子，打他的身體和靈魂。逼他放棄他的舊習慣和舊信仰，來適應這新的生活及新的世界。難怪有一次我在沙立鐵城（Tzaritzin 現為斯丹林格勒）的郊外，遇見一個哥薩克，他對我唱一個悲悼哥薩克的命運的哀歌……他的歌中這樣說：哥薩克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戰士，或世上有權力的人了，騎着一匹赤馬，像女人一樣的深思，光亮的鞍子和奪目的衣飾，口袋裏裝些買酒和買靴子的錢。』不，哥薩克現在像一個圍着圍裙的老婦人。

圍裙——這是一個勞苦，馴順，單調的記號，向來為哥薩克人所輕視的。歷史終於和哥薩克人算

賤了。它現在把他放在一個完全沒有用武的地方……

然而在歷史上，他已扮演了多麼羅曼的一部份。他多麼亡命的穿過深林和高山，淺沼和長河，把俄羅斯的旗子，插到那無邊的疆土上去。假設沒有他那種對於探險，戰鬥的慾望，誰又敢說今日的俄羅斯和歐洲又是什麼樣子呢？他單獨的征服了整個的西伯利亞——一塊面積與美國二倍相等的土地。他侵入了土耳其斯坦和中亞西亞；他越過了高加索山，他追蹤着拿破侖一直到莫斯科；在最近二百年中，俄羅斯每一個戰爭及領土的擴張，都以他爲重要的角色。他非但是擅長殺伐及征服的人，同時還是開闢疆土的人和殖民家，他往往被送去開闢一塊新的土地，在那裏他便安住下去了。祇有他，能夠付託這種工作，因爲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他總是那樣忠心不貳——壓制一切反叛的思想，打倒一切反叛的人。

他永遠是壓制革命的人。一個城市中祇要有百十個哥薩克，便能很兇狠的應付一切反叛者。那些古奔（Kuban）的哥薩克，說起來他們現在的命運是最黑暗的，然而當日他們是舊制度最熱心的擁護者。他們是哥薩克中最英雄的。他們都是沙皇的御衛。這些古奔的大漢會使外國的旅客感到

奇異和恐懼，好像是一個沙皇統治永遠不會倒場的象徵。

哥薩克！非但是在俄國，無論在那一國的文字中，這都是多麼可怕的一個字啊！它包含着無限的野蠻，專制，和恐怖。土耳其人，韃靼人，日耳曼人，波蘭人——與俄羅斯戰爭中遇見一個哥薩克人，他們就會不寒而慄。他們知道他的利害。世上沒有戰士是較他更兇狠，更野蠻的。即使是現在，每個哥薩克村中總有一兩個人能在馬上任意馳騁，一刀就能將敵人斬為兩段的。哥薩克人不做俘擄，也不收留俘擄。他沒有計較，也沒有什麼懷疑。他不耐煩等待，也不須要解釋。他的馬和刀永遠是預備好的。他喜歡嗅血的氣息。人們的將死的慘狀，永遠不會打動他的心。他的手永遠是那樣強辣；他的心永遠那樣的輕快。他能在歌唱中和他的仇人戰鬥，在歌聲中結果了他最後的一息。他從不思索與他對敵的是什麼人——異國的人，或自己的同胞，猶太人，學生，無產者或是窮苦的農民。他祇知道殺人……永遠的殺人。

然而在舊日，也不見得完全是這樣。歷史也曾和哥薩克開過玩笑。它曾經教他扮演過反抗專制的角色。在最早的時候，他是一個小孩，同時也是一個自由的代表者。他往往寧願死，不甘屈服。事實上

他是俄國最早的革命者。

他最初在歷史上出現是一個冒險者——多半是一個農民，因為地主的威權一天天的增加，他對農村的生活感到無限的厭倦。他逃到南方，那裏天氣十分溫和，野禽和魚十分豐富，菜蔬十分新鮮，森林十分深厚；最緊要的，那裏沒有統治者，也沒有法律。他釣魚，遊獵，和土耳其人，傾軋人及色加人（Circassians）戰鬥。他劫擄商人和旅客，尤其是那些不斷的從西亞到俄羅斯去的商隊。

到了十六世紀，他們的人數曾見增加。那時俄國的地主及皇族的權力，一天天的擴大。所有的財富——牛，馬，農具，穀麥，和政權都集中在他們的手中。沒有牛，馬，農具，及種子的農民，祇好給別人做長工，有時把他們自己的身體，終身的抵押出去。這種奴隸一天天的增加，然而不見得都願意屈服。所以他們一有機會便逃了。起初大都逃到別一個地主家中去，後來法律禁止地主們收容出逃的農奴，他們便祇好逃到南方那些尚未開闢的原野中去；在那裏，法律的力量不會再達到他們了。他們逃向那有叢林和水草的地方。他們分兩支向南進展——一支到了唐河（Donk），就是現在的唐哥薩克，他們大部份是大俄羅斯人；別一支到了特尼潑河（DniaperR.）他們大部份是烏克蘭人，他們自稱爲

『沙波羅利』(Saporozhitsui)。但是，不論他是誰，不論他原來是做什麼的——商人，強盜，皇子，甚至於教士——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從專制下解放出來。自由 (Volintza) 就是哥薩克人生命的資料，唯一的女神。

森林裏便是哥薩克人的國度。那是一個很有趣的共和國，武力很強盛，然而仍很自由，那是一個小的世界，有它自己的風俗和習慣，雖然和外界隔絕，但仍有抵禦外侮的能力。那裏沒有成文的法律。哥薩克用不着這些。他怕它會限制他的自由。並且，他終日奔馳於林河草野之間，實在沒有時間來訂什麼法律。但是他的習慣有和法律一樣的力量。他舉出長老來，如果他們濫用他們的權力，或處置失當，他就能罷免他，並且很殘虐的懲罰他，往往是把他和沙士一同沉入水中，四周圍着許多人給他喝采。女人是不准到森林中去的。他覺得她們太富於誘惑，會減少他的勇氣。假使族中有一個男子爲女色所惑。他一定得離開那個森林，並且失去了他同伴的尊敬。

他雖然是強盜，但對他的哥薩克弟兄們，最爲仗義。他祇對非哥薩克的人仇視。假設一個哥薩克欠了他弟兄們一筆債不能還，他就得被人用鏈子鎖在一個大砲上，一直等到他的朋友來替他償還。



假設他偷一個弟兄的東西被人發覺了，他就得被綁在柱子上，在公共的地方示衆三天，或更長久些，也要等到有他的朋友來替他解釋才能。在那柱子旁就放着一根木棒，走過的人可以拿起來任意的打他。有時給他一點燒酒，這不過是要使他變得更野蠻些，棒子打在他身上，更有興趣。往往一個犯人在第一天就死了，鞭打之兇很，於此也可想見了。往往一個犯人手腳都被打斷，這也不是什麼不常見的事。最可怕的就是哥薩克人的死刑。用一個鈎子穿進他的前胸掛在樹上，一直到他的身體裂成幾塊。假使一個哥薩克殺了他一個弟兄，他就得被活埋在那個人的棺下。

當一個哥薩克練完武功時，他便在森林中漫遊。他輕視勞動，更看不起商業。無論那一個人如果不同他過一樣的生活——那種懶惰捨掠的生活——就會被他目爲一個賤民。他無論做什麼事都十分猛烈——戰鬥，探險，喫東西，跳舞，尤其是喝酒。他是多麼一個善飲的人啊！他在空閒的時候，總是醉的，往往把他的短衫及靴子換了酒喫。賭酒已成了他唯一寄託情感的遊戲。比猜拳還要盛行，雖然這兩者是分不開的。

就因爲哥薩克那種愛自由的天性，使他在歷史上造成了許多流血的變亂。我們祇消看一看一

六六九年斯登卡雷辛 (Stenka Razin) 的革命。他派人到各大農場中去通消息，說他將解放所有的農奴，將田地和自由交還他們，祇要他們肯到他的旗幟下來，和地主階級及官吏決一死戰。農民於是都起來響應了。斯登卡開始屠殺他的仇人。許多村莊都被他屠平了。他不費一兵一卒就佔據了很富的阿思脫拉干城 (Astrakhan)，因為裏面的居民為他的宣傳所動，同情於他和他的主義。當他進城時，紛亂立刻開始。當時的無產階級——僱人和奴隸——把他們的主人的家都佔了，將所有的東西都據為己有——衣服，食物，傢具，甚至於那些貴族的太太和小姐。斯登卡已經征服了唐河及伏加河流域，於是往莫斯科進發。

他的軍隊一天天的增加，紀律也一天天的變壞。同時他缺乏軍火和可靠的將士。最後他終被征服，他的弟兄們也被俘虜了。這些人都用很重的枷鎖，壓着載在車上在街市上遊行，為的是使那些想反叛的人，得一個教訓。政府想要騙斯登卡寫一張懺悔書，但他們失敗了。他無論如何也不肯承認他是一個叛國的人。他受盡痛苦最後終於照例的凌遲了。

一世紀以後另外一個哥薩克——普加契夫，(Yemelyan Pugatchev)，詩人普錫金曾用他

的事蹟，織成一個很動人的『羅曼思』——又起來領導農民革命。他號召了很多軍士，打了無數次的勝仗，但像斯登卡一樣，因為組織不嚴密，缺乏軍火及有能力的同志，終於他也被征服和凌遲了。

這樣一個以自由為口號的善於反叛的人，後來怎樣又變成世上最野蠻的壓迫自由思想的人呢？差不多有兩個世紀，他爲了保持一個與他的宗旨、感情及傳統思想絕對相反的制度而奮戰。這好像是歷史上的一個矛盾。其實并不見得是這樣，哥薩克人根本沒有一種社會的觀念。他從來沒有把自由看做一種理想或社會的目標。

這真是哥薩克人的一個悲劇，他們缺乏一個有些先見和社會意識的領袖，來把這種追求個人自由的熱心，變成一種政治哲學，或一種改造社會的方案，並且鼓勵他的信徒去逐步的實現。因為缺乏這樣一個領袖，他很好的傳統思想，於是終於變壞了。他永遠沒有想一個安定的社會，從來沒有顧到明天。他祇顧他目前的自己，和急切的慾望。他從不想到社會人類，他的同胞，或整個的世界。他更不知顧恤別人的需要及情感；往往爲了一點極小的事，有時簡直沒有原因，他就任意的燒殺搶擄。哥薩克那種未經訓練的粗野的衝動是不受物質的限制的；日子一久，它就變成一種單純的破壞的慾望。

了。

因為缺乏一種社會的責任心，他自然很容易就和俄羅斯的統治階級妥協，並且為他們効忠。沙皇給他許多特權，讓他充分滿足他的慾望。要一個哥薩克滿意，須有三件事——第一，讓他自由地過他那種部落的生活；第二，身體及物質的滿足；第三，經濟的穩固。這些俄羅斯的統治者都能充分的給與。哥薩克的自由思想及民治的風尚，並不是根據於什麼危險的政治理論或事實的，所以對於專制政體並沒有什麼危險。至於物質的滿足——軍役，不斷的國內及國外的戰爭——壓迫弱小民族，工人，農人，學生的革命運動，這已經能夠滿足他那種強烈的慾望了。經濟穩固，沙皇也不難辦到。好在土地很豐富，哥薩克的女人又是最勤苦的工作者；他們又無需納稅，有時還有恩賞，這些都使一個哥薩克完全免去了經濟的恐慌。

所以俄國的哥薩克就是這樣以一個反叛者開始他的事業，而終於做了一個最殘暴的壓迫者。但是他那種外表的堂皇威武，祇是表面的。在環境，社會，及文化方面，他都和外界隔絕，自然免不了掉要退化了。這個科學及開明的時代對他並沒有發生什麼影響。他能夠暴虐和恐嚇，但是他像他所

擁護的政權一樣，內部是空虛的，與這個流遍世界的科學的時代精神，完全不能相合。

這個曾經最有權威的哥薩克，現在他是多麼落伍啊！在哥薩克的殖民村中，隨處你都能看見文化落後的現象。在我所到過的村落中，沒有一個有一個公共的浴室的！全古奔根本就沒有一個浴室，除非是在那些非哥薩克的居民之間。那裏的哥薩克從來不沐浴，除非在夏天的河裏。除掉房屋較農民住的較大，並且內外總是用石灰塗過的，此外哥薩克的村莊外表也和其他的農村一樣的破舊——沒有邊道，沒有階石，沒有陰溝。沒有自來水，街上一場大雨之後，立刻變成一個泥塘。在一個村中，那些少年人告訴我，他們曾經和那些老長的人打鬧了幾個月，他們才肯答應開一口自流井，免得大家喝穢水。哥薩克住在那樣理想的氣候中，佔了全國最優越的土地——肥沃的黑土，不用肥料，便能耕種——又有很充足的雨量 and 日光，然而他每年生產的穀麥，會使一個愛奧華 (Iowa) 的農人失望而大哭的。同時，迷信也仍舊牢牢的縛住他，讓下面的故事自己來說明吧：

一個青年的農家發現了在古奔的平原上種棉的方法。在某一個村中一個哥薩克特別對這種新的植物感到興趣。他十分小心的去採他的棉花。好像命運之神致意要作弄他，恰巧那年那個區

域中便發生了旱災。村中老年人都發了慌。他們請了一個牧師拿着神像在村中遍洒聖水，向上天求雨，終於沒有一點効驗。穀麥都要乾死了，天仍不下雨。他們從來沒有經過那樣的旱災；他們簡直是急得瘋了。他們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旱災呢？顯然是上帝在懲罰他們了。但是爲了什麼原因呢？他們並沒有像別處的人民那樣反對他呀！他們仍舊向神像鞠躬，燒蠟燭，和節食呀！那麼他究竟爲什麼懲罰他們呢？這祇有一個可能的理由——那就是違反了他的意志。然而誰是這個違反他的意志的人呢？那一定，就是那個做了別人從來未做過的事情的人——就是那個種棉花的哥薩克人！上帝一定不喜歡這種行爲。如果他願意在他們的地上種棉花，他早就自己種了。於是那些老年人開了一個秘密會議，他們決定不讓別人在他們附近的土地上種棉，不然上帝是不會對他們息怒的。後來有一天晚上，他們就跑到那棉田裏去，把那些棉花都一顆顆的拔了起來！

但是一種新的精神也在哥薩克的郊原上醞釀。每一個村落裏差不多總有幾個青年人，醉心於新的生活和新的世界。在每一個村中都有像梯（Т）——那樣的人——我有一次在一個報館裏遇見他。他是一個很高大的人——雖然祇有二十三歲——兩肩很寬，額頸很粗，胸前高高的挺起兩

塊筋肉。他已經結婚，並且已經是三個小孩的父親了；他到城裏來考大學。他晚間在家裏很刻苦的讀書，預備應試。他告訴我，如果他能及第，他一定要讀完大學，——那樣他自己可以有點學問，並且還可以有力量到草野間去教化他那些哥薩克的同胞們。

他不是共產主義者。他並且相信永遠不會變成一個共產黨員。但是哥薩克的生活是那樣黑暗，重重的爲迷信，野蠻，卑賤所包圍。哥薩克簡直是一個有權力的野獸，——除掉本能的慾望以外，他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管；他祇知道鬥毆，燒酒和拳戰。舊政府曾經給他土地，免他租稅，給他許多特權，並且拿很光耀奪目的制服，軍器，勳章來滿足他的光榮，但是將他與科學隔離得很遠。而現代沒有科學智識的人，就得滅亡，不是嗎？

但是那革命——我要繼續的往下說——給了哥薩克科學的智識。這也是它成功及有意義的地方。任共產黨員怎樣苛捐重稅，任他們像去年春天一樣的來徵發糧食，任他們用什麼方法來防止哥薩克積聚資本——一切在科學給他們的利益之前，都變成無足輕重了。舊日在整個的古奔祇有十三個農業顧問。他們也從不住在鄉村裏。他實際是官僚，而不是顧問。現在這樣顧問有五百人，他們

都住在村莊裏，並且很努力的教導那些哥薩克人，怎樣用現代的方法種麥，種苜蓿，種棉花，種甘蔗，和建造美國式的地坑。許多在舊日聞所未聞的新意思，都引起了哥薩克人的興趣——水力，陰溝，浴室，育兒所，新的耕種方法，小劇院，博物院。是的，科學已經降臨到哥薩克人了，在許久以後，它將使他脫盡了古舊的習慣，變成一個開化文明的公民。

現在他不過是名義上的哥薩克。他所有舊日的特權和光榮，都已失去。他咬牙切齒的終於離開了俄羅斯歷史的舞台。年老的哥薩克永遠不會忘記他舊日的生活和光榮。他爲已往嘆息，哭泣，和詛咒，但是得不到一點回應。他是一個無助的人，沒有一點力量來抵抗那爲革命的工具的科學的勢力。集產農場的運動，更使他許多舊的利益受到打擊。它叫他去服從一個完全與他的思想習慣相反的制度，這是當然很痛苦的事。它使他成爲社會組織的一部分，整天在田間，木廠及麵粉廠中工作，同普通的農民完全一樣。他的仇人——他有很多仇人——假使是善於報復的話，對於他的命運儘可以大聲的笑他。

這個可怕的哥薩克，他失敗之後是決不甘心的。他真是可憐，像一切強者失敗了以後一樣。除去



他的罪惡，他的過去究竟是一個英雄的事業。這個世界將永遠不忘记他那種特性——他那種充滿了羅曼風味的勇敢。他永不知道恐懼。在戰爭中他從不知道退縮。東，南，西，北，——在西伯利亞的叢林（Taiga）中，烏克蘭的濕原中，亞西亞的沙漠及高加索山中，他敢和一切的人獸，甚至於自然，奮鬥，並且他像是永不會失敗的。他那種大無畏的精神，仍能使詩人及藝術家迴腸蕩氣，和在舊日一樣，俄國沒有比郭哥爾（Gogol）的『塔拉巴』（Taras Bulba）或普錫金的『隊長的女兒』（The Captain, s Daughter）或託爾斯泰的『哥薩克』更有趣的故事。在他那些虐殺的罪惡完全被人們忘記時，他那些英雄的事跡，仍將爲人在詩歌中抒寫不已呢！

## 十六 猶太人

在俄羅斯沒有人像那三千萬猶太人一樣受到革命破壞勢力的影響的。他們較其他民族不同者，因爲差不多完全是城市裏的人。而革命也對城市破壞最烈。在農村中農民可以耕種他自己的土地，拿一雙赤手來和革命的勢力奮鬥。他曾經這樣做過好幾次。他也曾許多次戰勝了革命的力量。但

是城市中的人沒有農民一樣堅固的基礎。他已經失去了所有抵抗的力量。他對於革命專政者的命令，祇有服從。

猶太人，工人，智識階級，和青年人中也有曾經加入這個革命運動，並且得到了很高的領袖地位的。然而他們終究是少數。大部分的猶太人，對於這布雪維克的革命，並沒有參加；——事實上也不容他們參加，因為在舊日他們是不准住在列寧格勒及莫斯科的，而那兩個城市，恰好是革命的發源地。並且他們大部分是商人，他們所理想的，是一個能夠讓他們很平安，很繁榮的從事於職業的社會。但是雪維克革命的目的，正和這相反——正要打倒這樣一個社會。它在經濟，及精神各方面，都是一個正與那商人階級，及猶太人的世界相對的革命。

這就是革命對於猶太人的個人及社會生活破壞最烈的原因。在歷史上我從不看見猶太人在生活及思想方面，有過比蘇俄革命以後更大的變化。個人及階級的目標，希望，理想，及行爲的習慣，這些是他們日常生活相沿成習的一部分，現在都得很痛苦的去改過。他們不能再保守着他們的習慣和理想。革命已經完全把他們壓破，現在方慢慢的再將他們收拾起來。它使他們減少他們的階級

意識，變得更強硬些，更接近實際些。它想逐漸地把他們同化，不讓他們成爲一個獨立的民族。

幾年前當我自小離開俄羅斯後第一次到那裏重遊，許多事情深深的印在我的腦子上；在這些事上，我們可以看出猶太人在革命後的內心的變化。我到了我舊日上學的那個鄉村，我住的房子的對面，隔一條街，有一片很大的園地，早晨無論我起得多早，從窗中總可以看見一個女孩子在那裏工作。她總是赤着腳，像普通的農人一樣；在日光不很熱烈的時候，她也露着頭，她那金黃色的頭髮，也用一个紅的綢帶結起，像一個共產黨青年女黨員（Komsomolka）一樣。她的年齡最多不過十七八歲，雖然她臉上也具有俄國一般女孩子——尤其是工作的女子——那種莊嚴及成熟的神氣。當她掘土，割草，及從木桶中向那乾枯的胡瓜床中倒水時，她常常輕曼的歌唱，像一個慣於歌唱的人一樣。她工作得那樣勤懇，我很奇怪的不知她究竟是誰。從她的裝束上，我知道她決不是一個農家的女子；因爲那些女子決不會剪髮，并且也決不會在工作的時候，穿着城市中的衣服和唱着現代的歌曲的。經我探聽以後，才知道她是從前一個很富的猶太人的女兒，并且是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她因爲暑假，才回到家中來；她自己願意在假中照顧家中廣大的田園。

這樣一個猶太的大學生在田園中工作，對於一個生長在以工作爲宗教的傳統思想中的美國人，並不覺得怎樣奇異。但是對於我——戰前的階級觀念及傳統習慣仍在我兒時的記憶中活躍——真覺得這是太可驚了。在舊日，無論在城市或鄉間，你能遇見一個猶太的大學生肯屈尊的來做普通的勞工嗎？更不用說女學生了？

那種中世紀的輕視勞動，及主奴貴賤有分的觀念——在美國雖然沒有流行過，但對其他的國家是極普遍的——在東歐的猶太人的腦中，深深的印着。他們那種重視書香，崇拜學問的風氣，更加深了他們輕視勞動的觀念。在東歐的猶太人的社會中——除掉蘇俄現在的例外——醫生，律師，法師（Rabbi），教員，學者等最爲人尊敬，有時可以娶到很富的妻子。母親罵他們的女子時，總是說他們的行爲像皮匠，打鐵的，剝馬皮的，趕脚的等等。她們有時因爲子女不肯讀書，便恐嚇他們，說要送他們去學藝了——他們以爲小孩子是怕這種命運的。在戰前，俄國的猶太人總想盡了方法，不叫他們的子女降爲無產工人，這非但是因爲別種職業可以賺較多的錢，並且因爲在社會上可以得到較高的尊嚴。

這是一個多麼重大的變遷啊！現在一個猶太少年，無論性別，去做一種無產的職業，已經變成一種美德。在許多鄉村中我都看見猶太的大學生——男和女——赤着足在田間和平常的農民一樣的工作。我曾經到許多所謂中產階級或智識階級的猶太人家中去過，他們的子女雖然有時因為革命對於他們及他們家庭的不利，對它往往不能十分同情，然而都很快樂的覺得革命祇少教給了他們一件可貴的事情——對於勞動的重視和尊敬。任一個猶太的母親怎樣輕視無產者，怎樣拿他來規勸她的子女，然而他一定會反駁她，雖然他仍舊很愛她。革命已經把猶太人那種輕視勞動的心理完全打破了。

不但是如此。有一次我在烏克蘭見着一個青年的猶太女子，她是當地一個猶太法庭的推事長。我報告她當地一個軍人，反對猶太人的言論。我問她革命當局對於反猶運動——尤其是在一般無產工人間的反猶太運動，如何處置。她主張用宣傳的方法，使一般人，尤其是工人間，不要有種族的歧視，而以資本及無產為階級的分野。她更坐近我些，用一個指頭向上指着說，『我們不會因為反猶太主義，就停住的。我們加入的革命家，決不如此。你會想到猶太人會有什麼反異教的主義嗎？』猶太人，

她很熱烈的解釋說，永遠把他們自己放在一個超乎其他人類的立場上的。他們把他們自己看作一種上帝特別垂青的民族，這種優越的觀念，在他們的思想及行為染上了很重的彩色。她說，外界對於他們的輕視，事實上是增加了他們對於自己重視。她的父親，一個研究猶太法的學者，從小就教她相信一個猶太人無論如何，總比一個異端的人優秀。她從小就把『異端』(Goy) 這個字看作一種可恥的名稱。當她小時做錯了事，她的母親就會告訴她，說她的行為像一個『異端的女人』(Goye)。她繼續的說，她在法庭中，常常遇見一種猶太商人，他們覺得對待農民壞一點，並不算什麼，因為他們都是異端！但是我們猶太的革命者，』她勝利的說：『決定要把這種猶太人優越的觀念打破，如能做到這一點，至少已把一個很重要的反猶太主義的原因去掉了。

當然，即使是在東歐，也並不見得所有的猶太人，都有這種優越的觀念。現代的智識及社會主義的思想，使猶太人改變了許多舊的觀念及習慣；對於這種思想，自也不能毫無影響。然而俄國大部分在戰前沒有受過現代的智識及道德的熏染的猶太人，仍舊保持着他們那種古舊的思想。不過他們的子女，并不如此。他們從小就知道這種思想是智識低下，精神落伍的表現。革命教他們這樣相信，同

時那般在猶太人的精神生活上勢力日漸增加的猶太革命家，更是這樣相信。

革命的一個驚人的結果。就是猶太宗教的沒落，這在打破一切舊社會的思想及習慣的進行上，有許多便利。許多農村中的猶太教堂，都因為沒有人去而關閉了。即便是在很小的鄉村中——以前是猶太教的大本營——現在也很難看見一個青年的猶太人去做禮拜了。青年的女人也像男子一樣的容易爲無神主義的潮流所征服。他們覺得就是社會的娛樂，也不能作爲宗教存在的理由——像俄國許多猶太的教徒所想的那樣。許多猶太教徒告訴我，不久的將來，如果俄國的猶太人要想請一個法師，也得到波蘭羅馬尼亞，或美國去了。革命使得青年的猶太人都沒有心再去研究猶太教的法則，尤其不容易得到那種法師的訓練。『我們將要和異端的人一樣，』一個明思克（Minsk）的猶太學者這樣悲痛的說，『就等着我們連耶穌都不信了。』

父母們雖然有極誠的信心，也無法制止那反宗教的狂瀾。在舊日，差不多每個猶太的男孩子或女孩子，除掉在家庭中受很繁重的宗教訓練以外，還得到猶太的學校中去讀書。在那裏他們讀舊約及許多純粹猶太人的課目。這些課目給他們許多關於猶太教及古猶太的歷史的智識，在他們的心

中，養成一種猶太人的意識。在這些學校中，他們的腦中已印下許多不能磨滅的印象和記憶，使他們在將來的一生中，即使是不再信猶太的宗教，然而對於猶太民族，總有一種忠心；對於猶太教，在回信中總覺得是一種神聖及美麗的信仰。

但是現在那些猶太的教會學校，都已停閉了。猶太人的父母當然還想把宗教教育傳給他們的子女。但是那些年青的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家庭以外生活——在那蘇維埃無神主義的環境中生活，這是恰與他的家庭教育相反的。假使現在還有猶太的青年在學校中研究那些宗教的經典，那他一定是想找出些反對它們的材料，或是想用共產的觀念，來解釋它們；這同樣是對於宗教不利的事。

那些深信宗教，以排除異己為驕傲的舊式的猶太人，在今日的俄羅斯自然會感到一種幻滅的痛苦，這是無足驚異的事。他們對於那離開一般青年人的異端的思想，極度的悲憤。他們很憂愁，很憤怒，然而沒有什麼辦法。他不能恐嚇他們的子女，叫他們保持他們舊有的宗教，和舊有的團結的精神。那宗教信仰的崩潰，也沒有像經濟組織的破壞那樣有力的使猶太人撇去那些古舊的思想，習慣，而熱烈的去追求一種新的理想。帝俄時代，對他們的經濟活動的範圍，限制得極嚴。除掉少數第一



流的商人，大學畢業生，及專門技藝家以外——這些祇佔了猶太人的極一小部分——大多數的猶太人都得住在一個劃定的區域中（The Pale of Settlement）——約包括白俄羅斯，舊俄國波蘭，和烏克蘭。及大俄羅斯的一部分。在這個區域中，他也祇許住在城市或市鎮上。農村中是沒有他的立足之地的——除非他生長在那裏。他不許買田地，不許在政府中做事，也不許入軍隊服役。他大部分是一個『居間人』（Middleman）——商人，小販，掮客——東跑跑，西做做，全憑他的機智，混一口飯喫。

革命嚴禁私商，對於這種猶太人影響是最深了。它使他們失去了生活的憑藉。新經濟政策雖然已經允許了小商人的存在，但是他前途沒有一點光明的希望。正相反的，它使猶太人更清楚的了解，在蘇維埃的統治之下，一個『居間人』的生活，在經濟方面是危險的，在政治方面是孤獨的。

俄國的猶太人陷入於這樣的境地，他們一定得設法逃出來。在他們的面前，祇有兩條大道：——變成無產的工人，或是到外邊去耕田。

在舊日俄國工業中也有猶太的工人，但是數目非常小。在冶金工業中的人更少。唯一的原因，就

是政府不准他們在烏拉唐河流域，及中俄羅斯居住，而那些重要的工業，都集中在那幾個地方。現在猶太人都紛紛的往這些工業中心投去，人數一天天的增加。現在差不多沒有一種工業，沒有猶太人的足跡。我遇見過很多中產的猶太人，他們都不再顧慮什麼『體面』，而很快樂的到工廠中去做工。現在猶太的工人至少有十五萬人。現在猶太人唯一的呼聲——尤其是在許多小城市中——就是工廠中沒有充分的地位，來安置他們。我常聽見許多猶太的『耐潑曼』說，他們很願意把他們那些小事業停閉了，去做一個無產工人，祇是可惜沒有那樣的機會。蘇俄工業一天天的發達，猶太人做工的也將一天天的增加。他們為什麼不那樣做呢？當他做了工人之後，立刻就會被人目為社會的英雄，并且就可享受許多利益——最重要的，就是子女有求學的機會，這是一個猶太人永遠以為很重要的事。

『到田間去』在猶太人社會中所引起糾紛，實較『到工廠中去』的還多。那是一件極端痛苦，同時也是極端有趣的事，叫這些過慣城市生活的猶太人，他們的腦子和一雙手，要在這個世界中去征服一片新的土地，和他向來不甚了解的自然的力去奮鬥。

無疑的，許多沒有看慣猶太人在田間工作的農民，都要問怎麼回事了。他們好像對於競爭，并不懷恨；不歡喜，也不恐懼。他們祇覺得有趣。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在烏克蘭的一個鄉村的農民集會中，他們就討論到這個猶太人殖民的問題。出席的農民，沒有一個不說它會失敗的。一個年老人拿一句很苛刻的話來比喻說：『你不能叫一條狼離開森林，正像你不能叫一個猶太人離開他的買賣一樣。』』

然而已經有二萬個猶太人的家庭，約近十萬的人口，在鄉間住下了。有一次我在蘇俄鄉間旅行，到了白俄羅斯一個猶太人的農區中。那裏的居民雖然不見得極端的快樂，然而也比那些城市中的猶太居民，整天在憂慮將來，憂慮新的壓榨，較為滿足，較為有希望些。這個農區裏的男女，能夠工作，喫睡，計劃他們的將來，不用恐怕有新的法律來打破他們的希望。兒童們則尤其快樂。他們有小狗，小牛，小馬和他們一起玩；他們在田間及穀場上跑跳，這種自由是城市中的猶太兒童從不知道的。他長大起來都變成很強壯，很獨立的男子或女子，沒有那種畏懼官吏，哥薩克，及農民的心理，像戰前一般猶太兒童一樣。田野的生活，給了俄羅斯的猶太人一種新生命，使他目光變得安定，手脚變得準確，心靈變得勇敢。

每年到外面去殖民的猶太人，平均有六千家，或三萬人。假使不是爲了財政的困難，每年一定有兩倍以上移民。蘇維埃政府及猶太人的計劃，是要把移民率提高到每年一萬家，一直到至少有五十萬猶太人移居到田間去的時候。現在爲猶太移民開闢的土地都在克里米 (Crimea)，北高加索，烏克蘭，白俄羅斯一帶。尤其是在白俄羅斯的伏希尼亞 (Volhynia)，那裏有許多低源，可以變成生產極富的土地。自己沒有錢移殖，及不願意離開故鄉的猶太人，都可以去耕種這樣的低地。當我看見他們很多人在烈日下工作；赤着的腳，陷在泥中一直到膝蓋以上；年青的人，赤着上半個身體——這是蘇俄一般青年人的風氣——他們那紫銅色的皮膚，汗珠在上面發亮；叫我不得不驚異那革命改變猶太人的力量之偉大。

在舊日那一個猶太人——不管他多麼低下，——不肯用他自己的手來耕種那荒蕪的溼地。但是現在，這些青年的猶太人都在那裏耕種，很勤懇，很安靜的，不在任何地方的農人以下，并且一面工作，一面還要歌唱！

最近又開闢了一塊猶太人的殖民地，離開俄羅斯猶太人的生活中心，較美國還遠。這塊土地叫

做皮拉皮茲漢 (Peera Beazhan) 較美國新周山 (New Jersey) 的面積略大。那是在俄羅斯的極東。一片極肥的土地，四周有很好的河流，西伯利亞鐵路也經過那裏，居民祇有二萬七千人，多半都是哥薩克。祇有猶太人才許移殖到那裏去，然而真是奇怪極了，竟真有那麼多猶太人要請求移到那個遠在亞細亞中心的地方去。那裏至少可以容納一百萬猶太人。

常常有猶太人或非猶太人問我，這樣硬把許多猶太人化成無產工人及農人，是不是過於勉強了呢？他那樣有機智及野心的人，對於身體的勞動及微小的收入，會不會就滿足了呢？我所能回答的是：猶太人并不能自己做主。事實上沒有更合適更有利的職業給他做。向外移殖嗎？到那裏去呢？美洲的門已經關閉了，像歐洲其他的國家一樣。祇有南美可去，但是它并不能吸引猶太人。他一定得留在蘇俄，並且在現在的情況之下，他祇有到田間或工廠中去做工，不然就得挨餓。此外除掉自殺，更沒有別的方法了。

實際，蘇俄三千萬猶太人中，僅有三分之一已被吸進工、農及其他所謂合法的事業，如各種職業及集產合作的組織中。其他的二千萬人中，祇有有手藝的匠人，最近得到了經濟的穩固和獨立。政府

特許他招收三個工徒，不取消他們的公民權，也不必繳納特別的捐稅。差不多還有一千萬猶太人仍以買賣爲生。有的人祇是東飄西蕩的混飯吃，過着極慘淡的生活。也有生活較爲安適的人，但是他們的腦子和心情都得不到安靜，因爲政府、共黨，及社會一般的輿論，都把他看做一個社會的蠹賊。

也就是這些較爲成功的猶太商人，使得俄國的反猶太運動，更爲高漲。他們大都在大城市中很露頭角。他們是私商中最成功的，這決逃不過蘇俄無產階級及那些不幸的商人的眼光。他們以爲猶太商人是革命中真正的收穫者，他把全國的痛苦，都變成了他個人的利益和快樂。他們不能完全脫離舊時代的種族的武斷之見，把猶太的商人，看做一種革命的意外的結果，像共產主義者所說的一樣。個人間的憎恨及嫉妬，超過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對於工人及俄籍商人，猶太的商人無論如何總是猶太人。他們祇看見他外表的安適，而沒有看見他內心的痛苦。他們共同的用手指着猶太人，罵他貪錢，罵他倖運。

然而除掉這種反猶太的情感——蘇俄政府曾經用了無數方法來打破這種觀念——猶太人在種族、政治，及人道方面已經得到了從未夢想到的平等待遇。他現在在政治方面的地位，給了他一

切蘇維埃其他民族所能享受的權利。

猶太民族已不是社會及政治中歧視的名稱，也不再是入宦或從軍的阻礙了。舊日那種居住的限制，已經取消；他現在可以在國內無論什麼地方漫遊，無論什麼城市或鄉村裏居住。他現在可以隨意的進大學，不必像舊日一樣須受數目的限制，與其他民族完全立於平等的地位。假使他被拒絕了，那一定是因為社會的關係，而不是因為種族的偏見。猶太的商人，是處處要吃虧的，然而其他如俄國，烏克蘭，韃靼的商人，也莫不如此——在共產主義者的眼中，他們同樣都是使人不快的動物。在蘇維埃的統治之下，政府對於正式的反猶太運動，及社會一般的仇視，曾對猶太人加以有效的保護，現在在蘇維埃領土中，已看不見虐待猶太人的事了。許多反革命者曾經組織反猶太的運動來和新政府為難，但都被先後的撲滅，并予以懲罰了。讓一個反猶太的志士去演說他反猶太的情感，他立刻就會被拘捕的。我曾看見過警察捕一個人，因為他和一個猶太小販爭一頂帽子的價錢，叫了他一聲『賊光頭』（Proklyyata Zhid）。就像已故的名詩人愛斯雷（Eseinin）對於猶太人有些不敬的文字，也不免要受檢舉。在政治及經濟方面，猶太人也不因他是猶太人而特別吃虧。即使是一般猶太教

士，他們對於革命攻擊，我們的信仰和制度，感到極度的痛苦，但仍不能不承認舊日一般人對於猶太人的卑視，現在已被革命打破。革命把『猶太人』一字在俄國多少年來所包含的侮辱的意義，逐漸消滅了。

因為這種種族解放，及革命的附帶的結果，使一般猶太人在生活的各方面，發生了文化的自覺。他們像其他有自己的文字語言的民族一樣，被鼓勵着去建設他們自己的學校和大學，儘量發展他們固有的文化生活，祇要與蘇維埃政府的目標不相抵觸。

在一般革命領袖的言論中，也有組織一個猶太人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可能的暗示。假使蘇俄有一個地方，猶太人能佔人口的多數，這樣一個共和國，也許早已成立了。但目前還沒有一個區域中，猶太人能佔人口的多數。將來他們也許一天天的集中在一個相近的地方，而人口達到了他們所希望的數目，蘇維埃共和國便可成立了。現在看去最可能的地方就是皮拉皮茲漢。

當一個人想起今日俄國猶太人政治文化的新生活，和他們多方面的團體活動，也就不得不想一想，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想促進猶太人那種很深的分裂主義，而在精神及政治方面教他們



自成一個民族的單位，像古代的巴萊斯丁一樣嗎？這好像是對的，其實并不如此。今日蘇俄一般猶太人的活動的目標，并不是民族的。那些領導猶太青年思想的猶太革命家，覺得民族主義是一種爲世所棄的資產社會的觀念。許多猶太的革命領袖對我說過，所謂『猶太人的驕傲，』『猶太人的光榮』『猶太人的命運』等等，不過是些空虛，有毒的名詞。最使他們憤怒的，就是那些猶太人所說的，猶太民族在這世界中有一個使命——把人類思想提高到像那些古代希伯來的先知，和其他的猶太的大師一樣——的話。他們覺得路易萊（Ludwig Lewisohn）那些讚美猶太人的和平精神的話，祇是些感情的偏論。他們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願意再唱猶太人優秀的老調。他們以爲那些猶太人的使命及命運的論調，祇是猶太軍國主義的表現，這是和任何民族的軍國主義一樣腐敗的。他們說，這種論調最後所能引起的，祇是一般猶太工人的虛偽的擁護，而使他們的階級意識和革命的熱心，都會減少，他們以爲，恢復耶路撒冷，祇是資產階級的強盜思想，並沒有什麼羅曼斯或美的成分在內。恢復耶路撒冷的思想；現在在蘇俄是爲法律所不許的。他們要把猶太的理想主義，從人們心中驅出，把它所有精神上的羅曼和偉大的色彩都去掉，使它成爲一個僅僅的社會現象，一個歷史上的

意外事實。

在這裏，我不願爲在蘇俄的猶太人的將來的命運，做一個預言。但是有一件事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了——在城市及小市鎮中，與猶太人通婚，已經變成極普通的事了。一個猶太人與一個非猶太人結婚，也無須像舊日一樣一定得改信基督教。現在的猶太教與基督教，都在日暮窮途之中，對於通婚的影響很小。祇是因爲一般猶太人及非猶太人——尤其是一般青年——一種新的精神和觀念的改變，才有今日這樣的結果。革命的目的就在打倒那些舊日的種族的歧視，而養成一種新的一致的精神，把那種擁護蘇維埃理想，和蘇維埃國家的信心，提高變成一種超民族的理想，把所有舊日的種族間的武斷和忠心，一概消除。猶太的兒童，可以到猶太的學校中去讀書，他們可以用猶太的語言和教師。但是這種教育，並沒有引起明顯的猶太人的情感的性質。非猶太人的兒童，也是這樣。大家都在蘇維埃的理想中教育着，以勞動階級的目標和命運爲前提，種族間的差異，自然逐漸的減少了。這種階級的目標和命運，不是拿美國人的傳統思想或標準可以來批評的。不管它們的好歹，它們現在在蘇俄的存在，總是事實。這種事實，在每一個學童和其他的少年人心中深深的印着。

當然，一種新的反猶太主義仍舊存在，這使猶太人不得不對外面的世界，抱着疑懼。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在蘇俄一天天的擴大。與這種種族觀念的勢力對立的，則有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工會，公立學校，報紙等。

猶太的殖民運動，將來也許會養成一種新的團體精神；種族的驕傲，可以增加猶太人拒絕通婚的力量。但是這種力量在蘇維埃的統治之下，很難變成像舊日一樣的宗教觀念和種族的禁條。并且猶太人向鄉村移殖者，充其量也不過四分之一。大多數仍住在猶太人的殖民地以外。他們在國內各逐漸的和外面的世界混合起來。他們還有什麼力量可以堅拒通婚呢？據我個人看，他們是沒有這種力量了。像美國的猶太人那種以和其他民族通婚爲恥的觀念，在蘇俄一天天的失去它的勢力。所以我的結論是：除非蘇維埃政府瓦解，或者反猶太運動到了全國一致的程度，在蘇俄大部分的猶太人，恐怕難逃那同化的命運。

## 十七 婦女

那是一張放在一個舊的黑木架中的小照，與其他革命先烈的照像，同掛在所有的博物院的革命歷史陳列室中，一直到深入西比利亞的赤塔，都是如此。當我讀到『瑪麗亞』(Maria Volkonskaya) 這個名字，我的心靈忽然一動，不覺的便停住了。一個皎小面貌，放在平整的肩上，黑的頭髮，向後飄拂着；一雙大而圓的眼睛，襯着勻稱的黛眉，不顰不蹙，真是恰到好處。一張俊俏的臉，不瘦不胖，充滿了溫柔和靜宓，初看也沒有什麼，但是看過幾眼之後，便永遠在你心頭，磨滅不去。

假使你在蘇俄問一個現代的革命家，他對於瑪麗亞的感想如何，他一定會做出一種不屑談論的神氣。以階級鬥爭的急先鋒自居的他，自然看不出她有什麼奇特，或英雄的地方。雖然她生活在歷史上一個最可怕的尼古拉斯一世的時代，在那時代中流行了一百五十年的奴隸制度，已經在俄國社會中造成一個裂縫，那是一個郭哥爾在『巡閱使』(Inspector General) 及『幽魂』(Dead Soul) 中時而冷諷，時而熱嘲的一個時代——但她並沒有直接的加入階級鬥爭。她是一個大地主的女兒，她父親是拿破侖戰爭中的英雄，她從來沒有和俄國一般人民生活的現實接觸過。她的丈夫——也是一個拿破侖戰爭中的英雄，——從未讓她窺見他的內生活，他和其他軍人在秘密中

進行的革命立憲運動，她一點都不知道。一直等到革命——所謂『十二月革命』——失敗，她也被捕之後，她才知道他反叛的事。許多反叛者都被縊死——內中有詩人萊利夫（Rylcev）等——其他的九十個人——都是在社會及軍隊中有很高的地位的人，瑪麗亞的丈夫伏鋼斯基（Volkonsky）也在內——都被發配到遼遠的西伯利亞去，這樣非但想消滅他們在國內的勢力，並且要他們的名字，永遠被人忘記——提起他們，尼古拉斯便會頓然大怒的。

但是一個真實的歷史家，一定會在俄國的社會革命史中，給瑪麗亞一個相當的地位。她是俄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一塊界石。她才二十歲，身體很弱，已經做了母親。她的丈夫已經在不幸之中。那時如果她肯也起來反對他，社會及政府都會一致的來贊揚她的。他不是已經沾污了他自己的名譽，和破壞了社會及政治的道德嗎？他不是已經侮辱了皇帝，宮廷，社會，和他自己嗎？但是瑪麗亞並不這樣想。他的丈夫是一個應該吃苦的人——一個殉難的義士——他應該到那為人想做『活人的墳墓』的地方，去過那痛苦和孤獨的生活。所以她決定和他去接受那同樣的命運；她願意隨他一同到西伯利亞。

社會及政府都驚異她這種決心，想設法阻止它的實現。是的，在我看的那張照像的旁邊，還有一個黑鏡架，中就陳列着一封一個俄皇的親信寫給她的信，信內很生動的告訴她那旅途的痛苦。但是她絲毫不爲所動，所以她也像易卜生的娜拉（*Nora*）一樣，離開了她自小就尊敬的社會，和安適的生活而投到一個較易卜生的女英雄所能遭遇的更可怕，更無定的世界中去。并且她並不是想去找什麼神跡，她祇是想表現她自己——按着她自己的思想去生活。當她找到他時，見他蓬首垢面，穿着那身醜惡的囚衣，手脚都帶着鎖鑄，她不禁跪在他面前，去吻他的鎖鏈。因爲這一吻——也許是因爲尼克拉蘇夫（*Nekrasov*）在他的『俄國女子』（*Russian Women*）中的藝術的描寫——就使她成了那個時代特出的女英雄。但是此外還有七個女人，都是十二月革命者的妻子或姊妹，也和瑪麗亞一樣的歷盡了艱辛，到那遼遠的西伯利亞，去和她們所愛的人同過那流配的生活。

無論如何，瑪麗亞及那幾個女子的行爲，在俄國的歷史上已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從此女子在那奴隸和半家族制度的俄國，不再盲目的依從那冷酷的社會制裁，她們開始疑問，開始反抗，開始自己來決定一切，并與一切男子和自然給她們的阻礙她們實現理想的勢力來奮鬥。她們是那個屠洛

涅夫筆下那樣哀歌纏綿的女性的時代的先導——那個時代中的婦女，往往能夠爲了一個偉大的愛，或偉大的主義，完全犧牲了她們自己。並且她們也是五十年後那些光耀一世的革命女性的先鋒。無怪那俄國最多淚的詩人尼克拉蘇夫要爲瑪麗亞及其他十二月革命中的女性悲歌贊揚了。那種獨立的精神，也不見得是常常與俄國的婦女隔離的，尤其是在那男女在法律和習慣上完全平等的異端時代。那時男子管理地產，貴族婦女便接待外國的來使及辦理外交的事務。曾有許多公主，自己訓練軍隊，居然成爲一個獨立的社會。寡婦的母親，便是一家的主人。在結婚中，女子也不是完全依着父母的意思，她們能夠自己選擇她們的丈夫，而在烏克蘭，根據法國作家布潑郎（Beauplan）的話，『正與各國的風俗相反：丈夫并不能選擇妻子，而是妻子選擇她的丈夫。』結婚之後，女子也許要失去她們一部分女兒時代的權利，但是她們永遠不會變成男子的奴隸。她仍有參加會議的權利。她在戰爭方面，也是光榮的戰士。有許多地方，仍流行着一種詩歌，描寫在異端時代的俄國女子怎樣勇猛的和男子戰鬥。在那些詩歌中阿梅宋（Amazon）的女子，寫得尤其出色。即使俄國最有名的戰士莫洛梅茲（Murmetz）有一次也爲一個女子所敗——這個女子，後來才知道就是他的女兒。女子對

於戰爭也毫不畏縮。

所以在異端時代的俄國，女子無論貴賤，無論已嫁未嫁，都和男子立在平等的地位，她們沒有多少不自由的束縛。她們在社會上，往往佔了很高的位置。她們被人看做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的人，她們是最好的醫生和術士。

但是不久，各種新的勢力發生，把舊日的自由平等都掃個乾淨。家族制度的興起，增加了男子的權威；新的宗教——希臘教——以為女子具有破壞道德的性質；韃靼人將近二百年的侵入，破壞了一切的人道；專制政體的盛行，將個人的自由完全壓制；——這所有的一切，成了一種新的社會道德，所有婦女在舊日享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了。教育，社會生活，政治，她們都沒有份。她們變成了男子的玩物——比洩慾的機器也許要高尙一點，但決不是互助的伴侶。同外面的生活隔離，關在一間後面的屋子裏，一天天的吃得胖了。她們整天閒空着，談談別人的事，賣賣自己的風騷，身體一天天的發胖，這樣可以使她們對男子的誘惑力更大。她們變成了禽獸一般的動物，並且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過了好幾個世紀。



從彼得大帝登基以後，婦女的命運，才有轉機。他因為想把俄國變成一個現代的國家，打破了那小屋的門，把婦女解放出來。他強迫她們出來和男子社交，並且為社會服務。當時莫斯科一般貴族，對於這種新鮮辦法，都感到不安。他們的心中都詛咒那個『反基督』的君主。但他們并不敢起來反對他，因為那樣就會得到罪名。彼得之後，跟着伊利沙白女皇（Elizabeth），她一生最著名的事，就是廢除死刑。她雖然不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同時又迷信，又無智識——她甚至於不知道英國是一個島國——但是她很能鼓勵彼得大帝所倡導的解放婦女的新精神，替加太林的婦女教育運動，預備了一個基礎。婦女開始讀書，開始學習各種新的禮貌。事實上那些婦女學校中所注重的，祇是外面的舉止，客廳中的規矩，社交的藝術，取得男子歡心的方法，和接待外國貴賓的禮節。一直到十二月革命之後，各種新的思想，潮湧流漲，瑪麗亞等女子也已跟着她們的丈夫或兄弟到了西伯利亞，在俄國的幕前，才出現了一個新的女性——一個具有創造和自信的女性，她不顧一切傳統思想，和法律的束縛，投身到那大的世界中，按照她自己的意思，去做她自己的事業。

在俄羅斯婦女解放的歷史上，有一個特點，很為重要。她們不像在別的國家一樣，完全要自己去

奮鬥。男子，讀書人，文學者，總而言之，所有俄國的智識階級，都替她們搖旗吶喊；事實上時常熱烈的刺激她們，使她們對於現狀不滿，而起來奮鬥。當婦女的高等教育問題在俄國發生時，這些智識份子也都在裏面熱心贊助。年輕的婦女因為不能進國內的大學，便設法到外國去讀書，這些男子往往又極力幫助她們，有時爲了便利，不惜裝做假的夫婦。當俄國婦女在前一世紀的六十年左右，因爲反抗政府及社會給她們的低能的批評，開始剪髮，穿簡單的衣服，和短統的鞋子時，這些人又爲她們大聲的喝采。

最後革命運動成功時，婦女乃一躍而上了與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而她們也很能盡她們的責任。她們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不推諉；祇要爲了人類的解放，她們無論多麼危險的地方都肯去。這不止是一兩個人；幾百個幾千個都是這樣。她們不希望榮譽，也不希望什麼特別的利益。她們什麼事都肯去做，甚至於死，也沒有什麼畏縮。她們是信徒，也是領袖。她們和男子一同生活，一同計劃，一同奮鬥，一同到西伯利亞去，一同上斷頭台。

我想，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革命運動中，男女能這樣親密的生活在一起；大家爲了一個共同的

目標而奮鬥，相敬相信，完全忘去了自我。他們之間并設一點性別的歧視。婦女非但是這個運動中重要的份子，并且佔據了很高的地位。我們看一看莎菲亞 (Sofya Perovskaya) 一個貴族的女兒，經過好幾次的嘗試，終於實現了行刺亞列山大第二的偉舉。她臨刑前寫給她母親的一封信，至今留為一種純粹為主義而犧牲的情感的代表。再看一看革命中其他的女性——培絲克芙 (Beshkova-kaya)，芬尼哀 (Finger)，莎蘇立 (Zassulitch)，斯皮利桃奴伐 (Spiridonova) ——這些俄國革命運動中神聖的名字，現在都是世界聞名人了。

所以俄國婦女運動的形式，并不像其他各國那樣狹窄——并不是一個完全與男子爭地位的爭鬥。俄國的婦女，并不是僅僅爲了選舉權，教育，職業等而奮鬥。男子和女子立在一條戰線上，爲解放被壓迫的大衆而奮鬥，權利是一樣的。這種平等的觀念，并不是因襲來的，而是發於男女間一種真正的感情。在革命成功後，男子和女子所享受的權利也完全一樣；不多一點，也不少一點。無論當政者是那一個政黨——曼雪維克，社會革命黨，甚而至於共和立憲黨——對於這個革命原則的實現，總是絕對尊重的。

是的，現在革命已經成功了。我們現在不必討論現在執政的政黨是否與西方的文化相容。我們也不必討論那不是一個可怕的獨裁政治。就算是在一種殘暴的獨裁政治之下，但男女在統治及被治的階級中，都已有一樣的權利，一樣的機會。究竟那革命所遺留下來的男女平等的原則，已經實現至何程度？蘇俄的婦女在社會上地位如何？她在生活中的新地位，對於社會及道德有什麼意義？這點我在前面幾章中，雖然已經很詳細的討論過，但我還想更詳細的來批評一番，因為新俄今日的婦女地位，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社會革命。

可是有一點——在外表上看，俄國婦女比歐洲任何一國的婦女都可憐，在波蘭和日耳曼，我們已經覺得婦女的衣服穿得太濫褻了。但是在那些穿着粗布衣服的婦女的身旁，就走着穿絲織及天鵝絨衣服的婦女。在俄國便不是這樣。服飾時髦的女子，事實上已經不見。在婦女的衣飾上，決找不出一點所謂漂亮的地方。它們都是那樣灰黯，在西方人的目中看去，簡直是近於穢污了。就在今日，俄國婦女仍不帶帽子；便是在列寧格勒及莫斯科的大街上，也都是露着頭。帽子已經被頭巾代替了；最近大學女生都帶一頂男子的便帽。在歌場舞榭中，決看不見一點珠寶的光芒，或一件奪目的衫子，像在

其他的國家一樣。各種登載時髦衣式的雜誌，雖然又在慢慢的恢復生命，但那服飾入時的女子已成過去的回憶了。

在別的方面，蘇俄婦女又有幾件特別的事情。她內心裏起了一個革命——這個革命是那樣猛烈，如果在別的國家，一定已引起了很強烈的反應了。她要改過她的命運，使她在智識及日常生活方面，都要追上歐美的婦女。她所失的很少，而所得的很多。現在她如果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那并不是因為她是一個女子，而是因為她和其他社會上的人一樣，也許和獨裁者有些什麼不合適的地方。武斷，兩性間的『搭布』(Taboo)，舊的習慣——尤其是在鄉村及亞細亞的人民之間——仍舊沒有完全失去它的勢力，但是新的勢力，也隨處都在增長，希望最後可以把那些舊的勢力完全撲滅。在俄國的婦女革命運動中，有許多偉大，勇進，和紛擾的地方，很值得我們誠意和細心地去探討。

最重要的一個事實，就是俄國婦女從革命中得到了與男子完全平等的政治權利。她非但有權投票，并且還有權在政府中擔任一切她能力所能做的職務。我并不是說蘇俄選權的運用，也像在美國一樣自由。那顯然并不是這樣，除非是在少數的鄉村中。在蘇維埃工會，或其他政府的選舉時，政府

時常公然或秘密的用壓力來叫人民贊成他們的候選人。但是這種壓力是男女一致的，性別並沒有什麼重要的影響。關於在政府中服務一層，這種權利更不僅是一種法律上的原則。在這一點上，美國——在那裏婦女在公共機關服務，已獲得相當的名譽和成功——與蘇俄的比較，仍舊值得我們的注意。美國一共出了兩個女州長，和九個女議員，她們現在都已經是國內的名人了。因為她們的當選，是破天荒的盛舉，所以報紙都在第一頁上刊登她們的消息。但是在蘇俄，在政府中担任要職的婦女是太普通了，報紙也不暇一一刊載。

無論在什麼機關裏，我們都可以看見重要的女職員。在全俄蘇維埃（蘇俄最高的政治機關）的會員中，女性佔了百分之八。很多婦女被選為城市蘇維埃的主席——與美國的市長相等。美國至今有二十餘邦仍不准婦女參陪審。在蘇俄並沒有這種現象。蘇俄婦女在司法界中的地位也一天天的變得重要。

一九二六年，在舊日稱爲大俄羅斯的區域中，有一百四十六個女法官和二十個女檢查官，在前一世紀中，第一個俄國婦女做了駐外的公使；現在又有一個名叫高伐萊斯夫人（*Sofya Kovale-*

Yakovleva)的女數學家在挪威做了大學教授，雖然現在還沒有婦女做過人民委員——蘇俄的內閣官員——但婦女在各人民委員會中，地位已經很高。在人民教育委員會中有兩個女性，耶庫夫萊伐 (Yakovleva)和克魯波絲夫人 (Krupskaya)地位僅次於冷那斯基 (Lunacharsky)而在事業方面說，也許已超過他了。

蘇俄政治等中最重要的，是一般男子的態度。羅斯福夫人 (Mrs. Franklin Roosevelt)說：『在美國，婦女是被擯在政黨勢力以外的……在那些對於女性客氣的禮貌的下面，那由來已久的對於女性歧視，仍舊存在——從來不給她們一點實際的權力……在那些解決國家重要問題的場合，婦女沒有意見，也沒有權力。』反之，在蘇俄，除掉少數鄉村中的老年人以外，從來沒有人覺得婦女參政是要男子加以寬容的事。也沒有人故意的向她們表示客氣。當然俄國祇有一個政黨，但是在黨中婦女一樣的有勢力——有時是很重要的勢力。這個新社會是正在用它的全力來鼓起婦女的政治的自覺，出來在政府中尋找重要的職務。那種以女子參政為一種反動，以為長此以往男子一定將為女子所統治的流行思想，在蘇俄并不能引起男子的憂慮。他們根本想不到有什麼一性優

勝之說。這也許是因為那舊的革命思想，以為婦女并不是男子的競爭者，而是在奮鬥中的伴侶。

蘇俄婦女在革命中得到了在法律上和男子完全的平等。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女子都和男子一樣。例如，一個男子不能強迫他的妻子姓他的姓，或入他的國籍。她假設不願意的話，仍舊可以保持她的姓名。男子也不能強迫妻子和他一塊住。她如果不願意的話，儘可以不跟他一同到外面去移殖。當她離開他的住所時，他也不能就宣告，所有她的債務關係概不負責，除非他和她正式離婚。在財產權方面，法律也不徧袒男子。但也并不認女子為弱者，而加以特別的保護。被男子玩弄的女子，不能到法庭中去告那個男子；更不能因為感情的破裂，而要求賠償。女強盜和反革命者，也和男子一樣的槍決，沒有一點差別。

蘇俄婦女在革命中又得到了在社會上與男子完全的平等。在蘇俄，沒有純粹男子的俱樂部，除非是關於那些女子不願加入的生活的組織。也沒有純粹的男子學校或女子學校。即便是那些體育會，大都也是男女兼收的。在蘇俄沒有專為男子或女子而設的旅館，也沒有外面貼着『特設女子雅座』的酒樓。在工會及共產黨部中，女子和男子一樣的受歡迎，也和男子一樣的負守法的責任。社會



對各種職業——即便是教書——也沒有特別的偏向。女教師也和其他的女子一樣可以自由的開會結社，決不會因此引起當局的疑忌，或被當局免去職務。

婦女也可以在街上，大學的廣場上，火車的吸煙室，及劇場的走廊中吸煙，和男子一樣。吸煙當然不是一個健康和尊嚴的舉動，但是男女是一樣的，不見得女子吸煙就比男子更壞。在旅行上，女子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和限制。我從來沒有在蘇俄看見一個地方，像我們一個最進步的大學的學生會一樣，女子是不准從正門進去的；也沒有一個地方像哈佛的圖書館一樣，是祇許女子於某一規定的時間內進去的。社會上沒有一個地方會使婦女感到她們需要一種特別的待遇。她們可以一個人到旅館，舞場，飯店，及酒樓中去，和男子一樣的自由，也不會引起某種的嫌疑或批評。女子的行爲，和男子一樣，由她們自己去負責。俄國人也許把這種社會平等的觀念，過分的誇張了——他們在臥車上不相識的男女可以住一個房間，從一個美國人的眼光看來，這種舉動是有傷道德與風雅的事情，但是蘇俄一般輿論，對於這件事并不怎樣強烈的反對。

蘇俄婦女在革命中又得到了在教育上與男子完全的平等。教育的機會，無論在學校以內或學

校以外，都是男女均等的。素來被稱爲男子的職業，如醫藥、工程及法律，也一律皆許女子學習。女子從事於這幾種職業的人，數目一天天在增加。醫校的學生差不多一半以上都是女子。在工程學校的學生也有五分之一是女子，這非但包括土木工程，並且還包括採礦和電機工程。

在軍事學校中也有女子——雖然並不很多，那是因爲生理的原因。但是自從英俄斷交以後，戰備的空氣瀰漫了全俄，女子也常見參加游行或操演了。我相信如果真要一旦有事，婦女們一定也會上前線作戰，也許比在內戰時期她們在軍隊中担任軍需委員和放射機關槍和毒氣砲還要踴躍呢。現在紅軍中已有幾個婦女升到司令的地位了。

關於兩性教育的平等，蘇俄男子的態度，又與其他各國的男子不同。關於這個問題，我這裏有從報上剪下來的一個歐洲城市中的通訊。照這個通訊上說，有五個醫院拒絕招收女生。許多男生都反對她們去入學，因爲「兩性是不能在一塊研究醫學的……她們會干涉大家的活動……她們會使人分心，不能專心讀書……女子學醫是不會成功的……」這樣的不平，在今日的蘇俄，簡直是不可能的事。由男生出來這樣請求，更是根本不會有的事；如果真有其事，那他們也一定要被人

目爲革命精神及革命傳統觀念的反叛者了。

蘇俄婦女在革命中，又得到與男子在經濟上完全的平等。共產主義者以爲婦女歷來的低能，其唯一的原因就在經濟上依賴男子。一般共產主義者及馬克斯的書中都說，如要達到婦女解放的目的，非要先有經濟的解放不可。她們一定得工作。她們一定得在經濟方面對國家有些供獻，而獲得她們經濟的自立。那種以工作爲羞恥的舊觀念，已失去了它的力量。而代之而興的是那種男女以懶惰爲卑賤的新精神。

新的法律，對於不利於女性的各種習慣、道德及經濟政策，都不肯輕易放過。無論在工業、教育及政府的職業中，男女做一樣的工作，拿一樣的報酬。在工會及各種行業的合同上，並沒有提起『女工』這樣一個字。所有的條件，都是男女一律通行的。那種以女子從事職業爲賺零錢，或侵犯男子的活動範圍的舊思想，已經沒有人贊助了。像美國一九二四年理髮工會反對女子爲理髮匠那樣的事，在今日的蘇俄，也不至於發生。像英美現在許多技藝工會，仍舊不許女子工作的事，也是不可想象的。蘇俄有許多所謂重工業，至今仍不雇用女子，那是因爲她們在生理上不能做那樣的事。

對於已婚的女子，也沒有什麼差別的待遇。祇要她們有那種能力，她們可以在教育，醫藥，工程，及工業界中，担任一切的職務。沒有一個學校的董事會，或工廠的經理，能夠因為一個女子已經結婚，或已經懷孕，便拒絕她。各種事業都與做母親的責任，不相衝突。事實上，工廠的管理法及保險法中，規定孕婦在產前和產後，可以請假一兩個月，仍舊發給工資，目的就在鼓勵已婚的婦女，出來謀經濟的獨立。在許多工業中——如紡織業，多數工人都是女子，所以設有很多的育兒所，使婦女在工作時間，不必再看管她們的嬰兒；並且每天有一定的時間可以去探望他們，不扣她們的工資。

整個的說起來，婦女在各種工業中似乎工資都是很低，但這并非因為她們是女子，而是因為她們在有專門技藝的職業中還不像男子那樣進步。而沒有專門技藝的工人，在蘇俄，工資是一律較低的。

蘇俄婦女從革命中，在生活的另一方面，又得到了她們從未夢想到的平等。我所指的是兩性關係。在這一點上，蘇俄和其他西方的國家是一個很好的對照；一個外國人如果在蘇俄住了一個較長的時期，並且又因為會俄國的語言，與蘇俄一般人民的生活很接近，一旦他如果再到一個西方的國

家，他一定會感到驚異和紛擾的。至少我個人的經驗是這樣。我曾從西伯利亞到哈爾濱，因為急於要讀一點美國的作品，我匆匆地在書店裏買了一本從美國剛寄到的雜誌，裏面有特萊舍（Theodore Preiser）的一篇小說，『她吃虧了』（The Woman Pays）這個故事，也和它的標題一樣普通。一個小鄉村的女孩，愛了一個男子，這個男子達到了他的慾望之後，便不理她了。她想將來如果這樣生下一個小孩，她和她家庭的名譽，都要破壞了，所以當他拒絕與她結婚的時候，她便拿鎗把他打死，隨後自己跳在河中自溺了。蘇俄的印象，還在我腦中活躍，使我覺得這個故事分外的不真實。我不禁要問我自己，這樣一個悲劇，真會在這個世界中發生麼？這與蘇俄的社會情形，真是格格不入的。一個失戀的女子，也許會這樣報復，但是除掉在極小的鄉村中，她的動機決不會是怕社會的批評。在今日的蘇俄，一個女子有了私生子，並不能成爲社會詛咒的目標。隣居和朋友不一定會笑她；法律對她也和對其他可尊敬的女子一樣。所生的小孩，在法律上享有和其他的小孩一樣的權利。『私生子』一字，在法律的辭書上，已經塗去了。父親就是父親，母親就是母親——雙方彼此間和對子女，都要共同負責的。

當然我們談這個問題，也像談蘇俄其他的事情一樣，不能不留相當的地步。那裏仍有許多舊的思想和習慣，是與那些新的道德標準根本衝突的。但是它們的勢力很小，不能阻攔新思想的蔓延。事實上『她吃虧了』這一句話，在蘇俄是會引起反感的。蘇俄的婦女，在生理上也許是較男子吃虧多了，但是在社會上，祇要是男子的力量所能辦到的，她和他完全一樣。

這種婦女地位的重大的變化，自然對於婚姻，家庭，政府，工業，甚至於國際的關係——蘇俄在戰時較其他國家的婦女更為重要——都有極大的影響。我這裏所說的，當然是指那些新制度下對於女子個人的生活，可能產生的結果。有一點特別顯著的——那就是在蘇俄的制度之下，她不能忍受那僅僅為『女性』的，或純粹『性慾的』生活，像真實大胆的託爾斯泰有一次所說的一樣。她不能繼續再做男子的裝飾品，或把她整個的生命，寄託在誘惑男子的上面。當然，女人終究是女人，在許多合理及情感的生活，中，男子總是在前面的。不管有沒有革命，俄國的婦女也不是例外。她總不能完全放棄裝飾，即便她是共產黨員，有時也未能免俗。我有許多次聽見所謂革命女性詛咒政府，沒有讓外國的化粧品充量的進口；因為她們以為外國的化粧品比國貨品質好得多。然而社會上一般人對

於這種以個人的愛美爲主要情感的女人，有一種極深的反感。社會對於她是多麼嚴厲呵！好像她對社會及個人做了一件最惡的事情一樣。

并且她在那種經濟獨立的制度下，精力大半多用在許多生產的事業上了，她被壓迫着到工廠中去工作，在那裏她不得不養成許多新的興趣，許多新的娛樂方法，代替了她舊日那種純粹女性的生活。她永遠不會忘記她是一個女子；但是她同時也是一個公民，一個工作者，對於社會，國家，都有逃不開的責任。

在蘇俄的新社會中，女子得到了她從未享受過的身體的自由。她雖然不能逃免獨裁者的壓制，但這是每個人都一樣的，甚至一般革命者及政府人員，也難逃此例。但是在這種政治的範圍以外，她便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人。我在蘇俄各處旅行，從來沒有聽見女人說：『我希望我是男子，那樣我就可以愛做什麼便做，愛去什麼地方便去了。』女子當然希望更多得一點自由，或像男子一樣的隨便。

在蘇俄的新社會中，婦女雖然仍富於家庭的觀念，但是因爲有機會發展她們的人格和智慧，生活已經較舊日合理得多了。不管結果是好是壞，『女子，宗教，廚房，』已經不是她們生活的口號了。她

們教育和經濟的障礙，都已破除；她已經離開了爐灶，投向生活的其他方面去。

新性道德給了婦女一種向來被男子認為獨有的情感的自由。新性道德的推行——雖然還沒  
有十分普遍——免去了她生活中許多恐懼和煩惱。她現在能夠像男子一樣公開的表露她的情感，  
沒有一點拘束。

在這裏有一個問題自然的會發生——婦女在那些新的特權和新的責任之下，會不會變得太  
獨立，太積極，太野心，太智慧，而減少了羅曼的意味？但是像我在前面一章書中所說的一樣，根據俄國  
的歷史和文學，這個疑問便解決了。從普錫金的塔蒂耶娜 (Tatyana) 到色夫令那 (Seifina)  
的范俗尼亞 (Virineya)，每一個小說家的理想女性，都是又獨立，又羅曼，對於愛情的熱烈，不在  
西方任何國家的女子之下。我在這裏還用再把那些婦女在革命中花一般的羅曼故事，再一一重說  
嗎？

然而蘇俄的新婦女，是不是真的較為快樂的人，按照愛麗耐 (Elly Ney) 奇爾門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或山額爾 (Margaret Sanger) 等婦女運動者的理論和預言，她一定是較



快樂的人。但是事實是這樣麼？羅曼諾夫（Panteleimon Romanov）俄國一個至今還存在的小說家，在他的『新誠條』（The New Table of Commandments）中，無意間回答了這個問題。書中的女主角是一個受過教育和已經脫離了一切舊思想的人，當她發覺她的愛人——一個農人，但是很愛讀書，很有靈感，並且也最愛她——因為對於新的生活和目標太熱烈，不能把整個的精神寄託給她，她對他說：『你知道最近幾個晚上當你睡着時，我想些什麼？我想的是，假設我們真有上帝，那我死後一定會到他的面前；那時我一定是沒有靈魂的。他一定會問我：『爲什麼你沒有靈魂？』我那時便要很驕傲，很快樂的對他說：『我已經把它交給那個人了。』』

她的愛人的回答是：『我一定也會沒有靈魂的到他面前的；如果他也問我，我一定會指着地下說，『我把它放在土中了，它在土中，有一點就可以使一個人生活……它在土中，較在你手中還要安全……』』

這裏面的意義是很清楚的——一個男子比女子容易把他的內心寄託在社會的事業上，他的精神也較女子容易深入於一種社會的目標。我不願說這個作者有沒有錯誤。很多蘇俄的婦女在事

實上證明，也像男子一樣肯爲主義犧牲。但是革命不過是一個夢，一個力量很大，很富於誘惑的夢。雖然她們得了許多新的自由，但會不會在那個夢還未實現之前，她們就發生一種社會對她們要求過分，犧牲過多的感覺？我在這裏祇願提出這個問題。雖然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無疑的說——因爲那些新的權利，新社會在最後一定可以給婦女一個大的快樂，但是這種快樂，決不會是沒有痛苦的代價的。

版權所有  
(11)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掀天動地的蘇俄革命

一册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陳樂橋  
發行人 吳秉常  
發行所 正中書局  
印刷者 正中書局  
總店南京太平路 分店南京鼓樓